



目 录

大国关系研究

- 3 吴大辉, 王 洋 / 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
预见苏联解体——基于认知相符理
论的解析
- 38 曲文轶 / 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
演进——以“全俄中心” 民调数据
为依据
- 72 柳丰华 / 中美俄在亚太: 政策演变与博
弈趋势

欧亚国家转型研究

- 105 郇 菁, 张 昕 / 从“转型推手”到“政
治疏离”——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
理论与实践批判
- 136 毕洪业, 江 博 / 寡头干政何时了? ——
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
- 165 王林兵, 雷 琳 / 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
——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编辑:《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刘 军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0 年 12 月 28 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20 年第 6 期 (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Бу Дахуэй, Ван Ян

Почем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е круги США не смогли предвидеть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анный на теории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3)

Цюй Вэньи

Когнитивная эволюц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По данным опроса ВЦИОМ..... (38)

Лю Фэнхуа

Китай, США 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эволюция политики и тенденции игры (72)

Ли Цзин, Чжан Синь

От «сторонник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отчуждению»: Критика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05)

Би Хунье, Цзян Бо

Когда эпоха олигархов закончится? О дилемме и корнях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136)

Ван Линьбин, Лэй Линь

От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изменениям: Кризис демократии западного образц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165)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20 年第 6 期 (双月刊)

Contents

Wu Dahui, Wang Yang

Why the U.S. Strategic Circle Cannot Forese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ory of Cognitive Consistency (3)

Qu Wenyi

Evolution of Russian Public Opinions towa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Based on
Data of 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38)

Liu Fenghua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e Asia-Pacific: Policy Evolution and
Future Trends..... (72)

Li Jing, Zhang Xin

From Transition Promoter to Political Alienation: a Critiqu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vil Society in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105)

Bi Hongye, Jiang Bo

When will be the End of Oligarch Interference in Politics? On Dilemma and
Root Causes of Governance in Ukraine (136)

Wang Linbing, Lei Lin

From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o Political Changes: The Crisis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in Kyrgyzstan (165)

大国关系研究

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 ——基于认知相符理论的解析*

吴大辉 王 洋**

【内容提要】美国拥有最庞大的苏联研究机构和最强大的情报系统，但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本文借用国际政治认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错误知觉研究中的认知相符理论，解析美国战略界集体预测中对苏联解体的全方位误判。在经济方面，美国经济学家基于苏联1950年开始的20年间经济整体向好的历史经验认知，对苏联未来经济走势判断持过分乐观态度。在军事方面，他们高估了苏联军队在政权稳定中守护者的作用，低估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坚信戈尔巴乔夫可以在最后关头动用武力来保卫苏联。在外交方面，他们认为东欧的和平剧变对苏联而言是一种解脱，忽视了东欧政治进程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的“影响循环流”，以及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鼓舞作用。在意识形态领域，苏联末期社会意识形态的衰落被错误解读，意识形态构成苏联政权主要合法性的事实被忽视。有鉴于以上对苏联判断中全面的认知相符，最终导致美国战略界未能预见苏联解体。

【关键词】苏联解体 美国苏联学 战略预测 美苏关系 认知相符理论

【中图分类号】D7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003(35)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际秩序重构中俄罗斯转型的作用与影响”（项目批准号：12JJD81002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议！

** 吴大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王洋，清华大学欧亚战略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美国战略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但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创始人、被称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John Galtung）却预见到了。他早在1980年就曾预测“作为帝国最薄弱点的柏林墙将在十年内倒塌，紧随其后苏联帝国将崩溃”，因为苏联精英对“苏联和卫星国”“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城市与农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资金流动性和商品匮乏现象”“共产主义乌托邦神话和苏联现实”之间的六大矛盾，无能为力。^①1980年苏联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盛时期，加尔通在此时断言苏联即将崩溃，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事实上，在苏联骤然解体之前，人们对强盛帝国可能会突然崩溃这一假设，实在缺乏想象力。美国冷战战略的主要设计师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将苏联“突然而彻底”的解体，称为“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最为奇怪、令人震惊、使人费解的事件”。^②美国保守主义杂志《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在1993年推出过一期探讨苏联解体的文章，而这一特辑被冠名“苏联共产主义的离奇死亡”。^③

所谓“离奇”有两层含义，即苏联解体的时间和方式。“离奇”的时间层面含义在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之时，苏联依然具有强大的全球影响力，但为何在短短六年之后就分崩离析？一般而言，庞大帝国的衰亡总是漫长的。在凯末尔推翻奥斯曼帝国之前，它被改造成“欧洲病夫”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的拼凑帝国受到1848年革命的剧烈摇动后，又延续了80年；而中国的王朝在度过兴盛期之后，一般还要残喘度过百年才会最终崩溃。^④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前，西方战略界对苏联面临的各种顽疾了然于胸：经济长期停滞，外债高筑，生活用品奇缺，物价不合理，黑市猖獗，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加剧，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尤为严重……早在苏联解体前就创刊的《共产主义问题》（Problems of Communism，苏联解体后改

① [挪]约翰·加尔通：《美帝国的崩溃：过去、现在与未来》，阮岳湘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页。

② Owen Harries, “A Special Issue”,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3.

③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The Special Issue of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capsule-review/1993-06-01/strange-death-soviet-communism-special-issue-national-interest-no>

④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为：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长期全面探讨苏联面临的经济、社会及民族等问题。但是，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问题会危及苏联的生存，至少不会立即导致苏联解体。苏联为什么不像其他帝国一样，在经历权力顶峰期之后，在诸多经济、社会、民族问题的消耗下，慢慢衰亡，而是以如此“离奇”的方式迅速地突然解体？

所谓“离奇”的方式层面含义在于，苏联为什么以如此平静的方式解体？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越改越乱、苏联颓势渐渐明显时，美国战略界开始预测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并列出了这种可能性的四种走势：其一，苏联完全充分解体，但过程和平，解体后转向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最优）；其二，苏联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拥有一个形式上的中央，以保持控制核武器，同时放松对加盟共和国的管制（次优）；其三，苏联以血腥暴力的方式解体，战争和冲突蔓延到边界之外（不利）；其四，苏联避免了解体，经济止跌回升，实现中兴，并再次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①在苏联后期，美国一直将次优选择即第二种走势作为政策目标，却意外地得到了最优结果。苏联的各种政治力量没有刀兵相见，民族冲突也并未失控蔓延，苏联平静解体，庞大帝国的崩塌没有引起剧烈余震。

美苏两国冷战缠斗数十年，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彼此，以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估计，美国的苏联问题研究机构在顶峰时期达到 40 余家，专门研究人员最多时达 3000 余人，有 80 多所大学进行有关苏联的教学和研究。^②在政府、军方、情报、学界的努力下，苏联研究界已成为美国最庞大的“国别/地区研究体系”。如此规模庞大、投入甚巨的研究工程，最终仍以预测失败告终，让“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在“美国衰落或崩溃”成为热门研究话题的当下，通过对“美国战略界为何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解析，我们可以吸取美国战略界的教训，避免在“美国衰落或崩溃”的研究中产生错误知觉，出现类似的认知相符。

① 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第388页。

② 于滨：“从X到Z：西方‘苏联学’的兴与衰”，《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1期，第69-86页。

一、对美国战略界的既有批评反思与本文解析的理论范式

由于未能预测到苏联解体，美国苏联学界（Sovietology）和情报界都受到了广泛批评，其自身也进行了反思。这些批评和反思是对美国战略界^①自身预测失败原因的解释性总结。

（一）对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之批评反思

苏联轰然倒塌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的苏联学界-政策界——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到分析视角，甚至包括研究者个人的政治倾向，都被严格而彻底地审视。

其一，反思社会科学预测的可行性。如此规模庞大、投入甚巨的研究工程，最终仍以预测失败告终，这不禁让人怀疑：社会科学究竟能否有预测能力？约翰·李维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否认社会科学预测的可行性。^②他认为当少数变量在可控或已知条件下相互作用时，预测是可能的，但只要变量数量有些许增长，或操作条件变得复杂，预测将变得不可进行。兰道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态度较为温和，认为宏观、中观、微观三种社会事件的可预测性不同。^③一般来说，对宏观历史进行预测是可能的，学者可以同时提供理论和实证信息。但对于国家的建构和消亡这样的“中观事件”，地缘政治理论能够提供的可预测时段是三十至五十年，而且学者只能提供发展方向，无法判断事件的爆发节点。

其二，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约翰·李维斯·加迪斯在其影响甚广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终结”一文中宣告：“冷战的突然终结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失败”。^④而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失败，是

① 本文的“美国战略界”主要包括学术界、政策界和情报界。三者之间都存在交集，但学术界与政策界的交集最大。在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的苏联学界与政策界联系紧密，不仅仅是学术界的成果常常转化为政策界决策的基础性依据，而且政策界常常向学术界提出研究要求，甚至杰出的学术界人士直接被吸纳进政策界。因此本文也使用“苏联学界-政策界”的概念。

②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2, Vol.17, No.3, pp.5-58.

③ Randall Collins, “Prediction in Macrosociology: The Case of Soviet Collap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5, Vol.100, No.6, pp.1552-1593.

④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因为其使用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当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模仿自然科学，追求理论的客观（objectivity）和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时，殊不知绝对确定的科学从 20 世纪之初就开始褪色，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正在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隔阂而担忧，试图将不确定性、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纳入其研究方法中。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对美国高校博士候选人于 1976 年至 1986 年间，以苏联政治为主题写就的毕业论文进行了调查，发现其中大多数人都“不掌握俄语”“不具备研究苏联的资质”。^①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一直存有一些程序化的研究和分析模式。苏联解体的突如其来，显示了这些分析模式的局限性。

其三，反思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的分析视角。康纳（W. R. Connor）认为在经济理性假设当道的西方学界，传统与观念——这些对人类行为具有塑造作用的因素——几乎没有生存空间。^②长久以来，西方的苏联学家所依赖的分析视角都太过局限，他们总是着眼于可量化的因素，例如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农业产值等。这种模式化的研究忽略了苏联社会以及东欧国家当时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民众的民族情绪，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渴望，或对当局的不满心理，认为政府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这些因素被认为“太软”（Soft）、“不够科学”，而被选择性地屏蔽和忽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苏联历史学教授马丁·马里亚（Martin Malia），曾化名“Z 先生”发表长文“通向斯大林的墓地”，指责美国的苏联学界关注社会和经济等“底层问题”研究，却忽视了对集团模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高层问题”的专注，以“社会研究”取代了“政权研究”。^③

其四，反思美国苏联学界-政策界研究者的政治倾向。彼得·拉特兰认为，美国的苏联研究者持有的政治偏见（Political Bias），是他们产生误判的原因。^④活跃于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的苏联研究者成长于 60 至 70 年代，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s），怀有强烈的左翼政治同

① 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Notes for a Post-Mortem”,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p.109-122.

② W. R. Connor, “Why Were We Surprised?” *The American Scholar*, 1991, Vol.60, No.2, pp.175-184.

③ Z, “To the Stalin Mausoleum”, *Daedalus*, 1990, Vol.119, No.1, pp.295-344.

④ Peter Rutland, “Sovietology: Notes for a Post-Mortem”.

情 (Left-Wing Political Sympathies) 和左翼偏见 (Left-Wing Bias), 不同于经历过二战、对美国怀有深切自豪感的老一代研究者。这些新一代研究者经历了越战、经济滞胀, 见证了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 对资本主义怀有强烈的怀疑, 对苏联心怀好感。他们将 1917 年革命定性为“由有觉悟和理性的工人及农民发起的大众革命”, 这说明了他们的政治倾向。美国研究者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可, 使他们无法准确评估苏联的实际历史进程。

(二) 对美国情报界之批评反思

苏联骤然解体之后, 美国情报界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主流媒体, 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外交事务》等, 都猛烈攻击中央情报局, 批评它是“最愚蠢无能的政府机构”, “从没对二战后的世界形势做出过正确判断, 在苏联解体上尤其无能”, “让国民为他们愚蠢而昂贵的错误买单”, “未能完成既定使命”。参议员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甚至提议将中央情报局解散, 将其并入国防部的情报部门中。^① 具体而言, 对美国情报界的批评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批评情报界在信息搜集方面的不足。美国知名政治记者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对中情局的评价是: 优质的政治情报, 如反映克里姆林宫情况的政治情报, 基本不存在。1991 年 8 月 18 日,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行使国家全部权力”的时候,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于当天晚上 11 点播报了这一消息, 国家安全顾问斯科克罗夫特 (Brent Scowcroft) 看到新闻后转告了老布什, 而中情局的报告第二天才送达白宫。^② 中情局的信息搜集能力到底如何? 其工作失误源于何因? 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驻美国华盛顿事务部主管阿尔贝尔 (David Arbel) 给出如下评价: 中情局的技术情报来源十分先进可靠, 但缺乏可靠、充足的人力情报来源。^③ 人力情报来源的缺乏, 导致无法洞察苏联政治进程。中情局依靠卫星等获得丰富的技术情报来源, 可以对定量问题——例如苏联军事设备全方位和精准的细节——

① Bruce D. Berkowitz, Jeffrey T. Richelson, “The CIA vindicated: the Soviet collapse was predic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5, Issue 41, pp.36-47.

② [美]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科克罗夫特: 《重组的世界——1989-1991 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 胡发贵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472 页。

③ [美] 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 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 (1980-1990)》, 孙成昊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第 261 页。

做出判断，但人力情报来源，尤其是对苏联身居高位者的人力情报信息，却非常缺乏。这就导致美国对苏联的基本生活状况以及高层政治进展，缺乏系统性的感知，而且极容易下“肯定性的结论”。这种认知相符基于以下判断：与修改或推翻现有信念相比，人们更倾向于坚持它或证实它；一旦情报界对其既定框架充满信心，那么在这种框架下形成的结论，注定是被不加批判地认作“已证实”。^①这是当时美国情报界普遍存在的现象。

其二，批评情报界在信息处理上的问题。伯科维茨（Bruce Berkowitz）认为，中情局的“预测无能”并非是其机构本身的错误，因为中情局“所做的预测是分领域的，但苏联的崩溃是一个整体现象”。阿尔贝尔也认为，尽管中情局和情报机构紧盯着苏联，但始终未能理解苏联变化的重要性。^②事实上，美国情报界始终强调结构性论证（structured argumentation），即对问题的定义总是始于分解问题，然后对问题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系统分析。^③但在对苏联是否会崩溃问题的预测上，美国情报界并未将各个分领域的预测有机地整合起来。情报搜集人员、处理人员、分析人员和用户之间的屏障仍然牢固，门户之见制约了合作。^④

（三）本文的理论解析范式：认知相符理论

本文尝试使用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的认知相符理论，解析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的误判。杰维斯是认知学派国际政治理论的领衔学者。“错误知觉”是杰维斯引入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心理学术语，指由于决策者对接收到的信息做出了误判，其决策和行为随之偏离了实际，导致的结果与决策者的原本意愿不相符。意即，由于决策者对形势和对方意图做出了错误判断，并且往往是夸大对方敌意的判断，所以他们会采取过分的行为。这实际上形成了螺旋逻辑，即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那么即使有很多

① Matthew Herbert, “The Intelligence Analyst as Epistemologi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2006, No.19, p.678.

② [美]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51页。

③ Jill Jermano,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d Argumentation”, *Project Genoa Technical Report*,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002.

④ [美]罗伯特·克拉克：《情报分析：以目标为中心的方法》，马忠元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印象仍然得以维系。杰维斯认为，导致错误知觉生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认知相符（cognitive consistency）在认识过程中的呈现。所谓“认知相符”，是指人们在理解和认识客观世界时会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接收信息时，总是下意识地使新获得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而回避、抵制与原有认识不一致的信息。简言之，相符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认知取向，即人们趋于看见他们预期看见的事物，趋于将接收到的信息归入自己原有的认识之中。^①

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着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记忆之中，形成了在接收新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都有保持自己原有认识的趋向，当他们接收到新信息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使新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如果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不一致，他们就可能对新的信息视而不见，或是曲解误断，使其能够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一致起来。这其中还包括诱发定式（evoked set），即人们接收到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式，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一个人会根据即时的联想去认识和解读刺激因素，所以要推断一个人从某种证据之中得出什么推论，我们往往要知道这个人正在关注的问题和他刚刚接收到的信息。^②

二、美国战略界对苏联经济增速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苏联解体是由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经济增速放缓、军费负担过重、政治改革以及领导人特质都值得追溯。这一事件跨越多个领域，指责某个领域的学者未能预见苏联解体并不公平。然而，即便仅考虑经济领域，美国的苏联学领域经济学家们也仍然难辞其咎。他们忽视了一些重要的现象，包括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军费在国民经济中的畸形地位、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经济后果，以及 1980 年后的货币性不均衡，这些现象构成了“苏联解体的经济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27 页。

② 同上，第 223 页。

因素”。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停滞，是戈尔巴乔夫急于推行改革的重要原因，尽管后期因为经济改革不顺而转向政治体制改革。然而，美国经济学家并没有预见到苏联经济在 70 年代急转直下的趋势，对苏联经济持普遍的乐观态度。因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苏联经济有近 20 年的较快增长期，使得美欧战略界已经对苏联经济形成固定认知，即苏联计划经济具有强大的可持续力和自我修复调整的能力。^①美国战略界由此形成了“苏联经济发展向好”的固定认知，甚至认为，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苏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都能与美国匹敌，因此与西方国家市场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苏联计划经济似乎是可行的经济选择。^②这导致对 1970-1990 年苏联经济的危机因子认识不足，认为危机症候尚不会转化为导致国家解体的经济崩溃。例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在 1982 年推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1979-1982 年苏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明显低于五年计划制定的指标趋势，1979 年创下经济增长新低（0.8%）。但该委员会在分析这种经济颓势的原因时指出，是恶劣的气候周期导致农业发展差强人意，是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苏联外贸收入减少。该报告相信这些消极因素都是可以逆转的。^③这种基于历史类比而产生的认知相符带来了误导作用，将一些实质上不相同的现实事件和历史事件牵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重大的知觉错误。英国历史学家 A.J.P·泰勒说：“人们利用过去的经验来支持自己的偏见。”斯坦利·霍夫曼同意费正清的观点，认为美国人往往把历史当作“杂货袋，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找出‘经验’来证实自己的观点。”这说明，人们只是利用历史上的类似现象支持自己已有的认识和偏好。^④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基础数据的预测失误，就是一个此类认知相符的典型案例。

有学者统计了美国经济学家对 1970 年至 1990 年苏联经济数据的预测，发现无论是以中情局测量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与工业增长，还是以苏联

① Michael Ray, “Why Did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story/why-did-the-soviet-union-collapse>

② Rand/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International Behavior, “Soviet Economic Grow: 1928-1985”, <https://apps.dtic.mil/dtic/tr/fulltext/u2/a220336.pdf>

③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viet Economy in the 1980’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Part 1, December 31, 198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 239 页。

官方发布的净物质产值（Net Material Product，即NMP）为预测指标，高估苏联经济增速是美国苏联研究界犯的普遍错误。例如，孔托罗维奇（Vladimir Kontorovich）对1970–1990年发表的关于苏联GNP增速的文章进行了统计。他发现，在27篇增速预测文章中，有25篇高估了苏联的经济增速，高估比例高达93%。在这些研究中，既有针对特定年份的增速估计，也有三年或五年的平均估计。而所谓的“高估”或者“低估”，是将预测数据与中情局公布的实际数据比较得出的。在27份预测研究中，仅有斯坦利·科恩（Stanley H. Cohn）于1970年对1971–1975年经济增速所做的预测（3.5%）略低于实际增长值（3.7%），以及亨利·罗文（Henry Rowen）于1982年对1973–1988年经济增速所做的预测（1.0%–2.0%）低于实际增长值（2.2%）。^①

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预测中的集体错误，归根结底是基于历史类比的认知相符。本文认为，可以从研究者使用的预测方法、数据来源，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社会环境中探寻原因。对于苏联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失误，是美国战略界没能预见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忽视苏联的特殊性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未能意识到苏联经济制度的特殊性。从1970年到1990年，美国经济学界的集体预测失误可谓旷日持久。当1970年到1980年的实际增长值揭晓之后，经济学家们理应意识到此前的高估倾向，并及时调整预测方法。^②然而，理论上的及时纠偏并没有发生，1980年到1990年的增速预测仍然整体偏高，经济学家们重蹈70年代的覆辙。这场集体误判之所以出现，与美国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制度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有重大关系。纵观西方经济史，自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经济增速均呈现周期性波动，这一现象得到现实的反复印证，成为西方经济学家的普遍共识和基本信条。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和指令式经济在经济活动的组织中占据着两个极端。^③用市场

① Vladimir Kontorovich, “Economists, Soviet Growth Slowdown and the Collapse”, *Europe-Asia Studies*, 2001, Vol.53, No.5, pp.675-695.

② Rand/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viet International Behavior,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③ Leslie Kramer, “Market Economy vs. Command Economy: What’s the difference?” *Investopedia*,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sk/answers/100314/whats-difference-between-market-economy-and-command-economy.asp>

经济的共识与信条审视计划经济时难免出现严重纰漏。

基于历史类比的经济预测固然以客观数据和预测模型为基础，但学者所持的个人观点和信念仍对预测结果具有重大影响，否则诸多研究者的预测数据也不会呈现出如此强的多元性，毕竟他们使用同样的数据，以及近乎雷同的预测模型。由于将西方市场经济增长规律应用于苏联经济增速预测，保留了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强烈信念，而未能注意到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性。^①美国的经济学家无法想象苏联经济会出现 20 年以上的持续下滑，这种信念让他们在预测模型使用和数据诠释中，有意无意地对苏联经济增速进行高估，并选择性地忽视 70 年代的预测失败，在 80 年代继续一路狂飙。可以说，对研究对象（苏联经济体制）的认识不足，是经济增速预测失败的重要原因。延伸来看，研究者的预测和判断均以历史经验和常识为基础，而历史经验和常识源于研究者的过往经历和所见所闻。加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苏联是一种崭新的存在，亦是美国社会科学家既有知识边界之外的全新领域，这也增大了预测难度。

（二）长期存在的高估倾向加剧认知相符

在美国，当时存在着大众对苏联经济高增长的预期，美国战略界对苏联的研究有意无意地在此问题上形成认知相符。当两个国家处于持续且激烈对抗时，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失败要低得多。因此，在国家间对抗中，低估对手的实力绝非明智之举。“宁可高估，绝不低估”的竞争心理在美苏冷战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早在 1984 年，约瑟夫·奈（Joseph Nye）就提出美国学术界和政界有“高估苏联的习惯”，这导致美国丧失谈判优势，即使是在“美国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②对于美国战略界的这一心理，以色列摩萨德驻美国华盛顿事务部主管阿尔贝尔做过十分精辟的总结：美国有一种看法，或者是“理念”，一直存在到苏联帝国崩溃前的最后一天，那就是苏联对西方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无论是苏联的疲态尽显，还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悲伤哀求，都无法削弱这种理

^① Matthew Johnston, “Why the USSR Collapsed Economically?” *Investopedia*,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investing/021716/why-ussr-collapsed-economically.asp>

^② Joseph Nye, “Can America Manage Its Soviet Policy?” *Foreign Affairs*, 1984, Vol.62, pp. 857-878.

念的影响；这种“理念”使得华盛顿直到苏联崩溃前都把它当作平起平坐的强国，指出当局过于夸大形势的情报官员，都被认为是“扫兴的人”。^①1982年，美国参议员Y·普罗克斯迈尔在概括中情局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工作报告时曾说：“可以从这类研究得出三个关键性的结论：第一，苏联的经济增长逐渐减缓，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经济增长仍将继续；第二，经济成果并不令人满意，经济效益欠佳，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经济已丧失活力和动力；第三，虽然苏联经济发展的成果与计划之间存在着差距，但即便从长远看，苏联经济也未必会崩溃。”^②

从情报人员所受的质疑，可以看出，当时美国民众、学者及政府官员都倾向于相信苏联前途光明，坚不可摧。只有极少数美国的苏联学界经济学家，在苏联解体前夕清醒地指出了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苏联的资源可能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工业界的经理人缺乏运作市场所必需的知识、长期的国家命令限制了工厂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的生产能力。^③但多数美国的苏联研究者在苏联解体前，仍然认为其经济形势远未达到导致国家解体的境地。处于这样的舆论氛围和情感倾向之下，如果经济学家对苏联经济前景做出悲观判断，其个人要承担舆论压力甚至利益风险，还有可能被指责因为低估竞争对手而误导政策的重大风险。因此，无论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出发，还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考量，对苏联经济增速做乐观判断，都是合乎时宜、符合“战略清醒”原则的明智选择。

（三）苏联的数据虚高加剧认知相符

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经济数据预测的第一步，是获取并处理数据源。经济生产活动的衡量与统计是极为复杂的国家内部事务，需要专门的政府部门进行信息搜集和数据统计，除主权国家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要获得翔实可靠的经济数据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处在冷战状态下的美苏两国而言，获取对方经济数据的唯一可靠渠道，便是彼此发布的官方数据，而苏联的官方数据收

① 《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51页。

② 转引自[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6页。

③ Robert D. Grey, Lauri A. Jennisch, Alanna S. Tyler, “Soviet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orbachev Reforms”, *Slavic Review*, 1990, Vol.49, Issue 2, pp.261-271.

录于每年发布的《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之中。然而，美苏两国在经济统计指标、价格计量方法等方面均不相同，这给双方学者造成了新的挑战。在经济统计指标上，苏联采用国民收入，该概念基于马克思对劳动和经济生产活动的定义，被社会主义国家广泛采用。1960年以后，苏联经济部门又开始采用社会生产总值作为经济衡量指标。^①美国方面则采用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即GNP。在价格计量上，苏联所采用的可比价格（Comparable Prices）未能有效排除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一步整理。美国经济学家固然可以在不同的经济统计指标之间实现符合经济规律的转换，也可以有效排除可比价格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然而，由于经济预测依赖于苏联官方公布的经济年鉴，一旦数据源本身的质量存疑，即使数据经过纠偏和格式化，也无法产生可靠的预测结果。美国的苏联学界专家甚至这样为自己的预测失误辩护：如果我们弄错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不这样做，要预测苏联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事。这个专家群体中广泛流行的看法是：所发生之事的原因具有主观性质，是由1985年之后苏联领导人所犯的种种错误所决定的。^②言外之意，不是美国的苏联研究界预测错误，而是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导致预测失败。苏联的统计数据失实到什么程度？以美国战略界最为关注的经济增长数据为例，经济学家库尔茨威格（Laurie Kurtzweg）在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递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直言：西方自己着手对苏联经济增长进行测量，本身就是出于对苏联官方所公布数据的怀疑。^③英国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是麦迪森数据库（Maddison Database）的创建人、《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作者，是苏联经济增长测算领域大有权威的西方学者之一，其对苏联数据的评价是：总是低估通货膨胀因素，而夸大增长水平。^④事实上，对于统计数据虚高的情况，苏联国内的学者和官员

① 金飞：“前苏联经济增长的TFP讨论——苏俄与西方序列的比较”，《俄罗斯研究》，2014年第4期，第165-191页。

② [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第147页。

③ Laurie Rogers Kurtzweg, “Measures of Sovie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1982 Prices: A Study for the Use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④ Angus Maddison, “Meas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Communist Command Economy: An Assessment of the CIA Estimates for USSR”, *Th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8, Vol.44, No.3, pp.307-323.

是承认的。1987年7月1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关于根本改善国家统计工作的措施》的决定，强调“运用经济杠杆和法制杠杆开展反虚报和瞒报的斗争”，“对虚报瞒报及其他歪曲国家报表行为的责任者追究纪律上、物质上、刑事上的责任”。^①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的认知相符，在于始终相信苏共对苏联军队牢靠的掌控力，始终相信军队是苏联政权最后的守护者，过滤掉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美国著名苏联问题专家、杜克大学教授杰里·霍夫1992年的观点，代表了美国战略界在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认知相符的严重程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军方会让苏联解体，甚至没有严重的流血事件。我至今仍然不相信。”他不认为苏联应该崩溃。按照他的认知，只有苏联军队先行崩溃，或者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苏联才会崩溃。他认为军队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是最令人费解的因素。^②戈尔巴乔夫宣布单方面裁军之后，美国战略界密切关注军方的反应，就苏共对军队的掌控力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认为，苏联军队服从文官统治，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会影响国家政治进程，苏共牢牢掌控着苏联的军事决策权。然而，苏联国内对军事政变的担忧情绪，以及在“8·19”事件中执行控制叶利钦支持者的军事人员，其不作为甚至倒戈，都说明苏联军队并非政治家的“牵线木偶”。在综合考虑法律传统、政治风险之后，相当数量的军人在“8·19”事件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选择，苏联军队事实上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由于多次违法、违背传统地使用军队充当灭火器，事后又推卸责任，戈尔巴乔夫与军队的关系走向破裂，军政关系不断恶化。美国战略界对苏共掌控军队能力的高估、对苏联军队自主性的低估，使得他们始终将苏联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视作苏共保存苏联的政治资本。

① 王毓贤：“苏联成立国家统计委员会”，《经济与管理研究》，1988年第1期，第62页。

② Brian D. Taylor, *Politics and the Russian Army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1689-200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06-208.

（一）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的固有判断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军事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戈尔巴乔夫试图在军事安全和民生经济之间寻找平衡，并为内部改革营造缓和的外部环境。在“黄油与火炮”的困境之下，苏联的海外利益迅速收缩，相继从阿富汗和蒙古国撤军，武力不再被作为首要的冲突解决手段。在美苏缓和的大氛围下，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裁撤，并逐年缩减军费和军备生产，资源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资源分配上，苏联舍弃了传统的“最坏情况假定”（Worst-Case），转向“合理充足论”（Reasonable Sufficiency）、“防卫性国防”，试图降低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①在人员方面，苏联进行了规模庞大的军队人员调动和裁减。1988年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冷战结束，并宣布单方面裁减军队人数50万。^②中高层军官同样经历了大规模的裁减，据估计，将近1400位将军被裁，11000位上校及以上军衔的军官被裁。高层军官中，15位国防委员会成员（共17位）、15个军区司令（共16位）被替换。被替换的军队高层人员中，只有少数被调任新职，多数失去职位，从此隐退。^③如此大范围地替换军队高层人员，这在前戈尔巴乔夫时代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自公开化政策实行以来，不仅党和政府受到了猛烈攻击，军队亦未能幸免，被冠以“腐败之军”的名号。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愤怒谴责媒体“错误地使用公开化原则来诋毁军队”，陆军大将利济切夫愤慨地指责“鼓动者只看到黑暗面，诋毁军队和军人，损害军队在民众中的声誉”。^④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裁军计划、军费缩减以及声誉损失，苏联军队的利益受到了从上至下的严重损害。美国战略界对此非常敏感，密切关注军队高层

^① 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 *Current History*, 1989, Vol.88, No.540, pp.337-353.

^② 殷卫国：“对苏联亚洲裁军的初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9期，第45-47页。

^③ United States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to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ics Subcommittee of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The Soviet Economy in 1988: Gorbachev Changes Course”, April 1989, DDB-1900-155-89, p.15, https://www.cia.gov/library/readingroom/docs/DOC_0000292349.pdf

^④ 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89, <https://www.rand.org/pubs/notes/N2771.html>

人员的动向和表态，预测苏联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考量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布朗大学对外政策发展中心研究员马克·克莱默（Mark Kramer）发现，没有高级将领在戈尔巴乔夫宣布和实行裁军计划之后公开表示反对，亚佐夫甚至声称裁军计划“得到了军队的允许”，“经过了深思熟虑”。^①克莱默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全面掌控苏联国防议程的体现。由此，他做出判断：苏联不可能发生军事政变，长久以来共产党对军队实行严密的政治领导，军队根本不构成实际意义上的威胁，军界甚至无法达成统一共识。美国前国务卿、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的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认为，苏联军人不会卷入政治斗争，而是服从于政治。她引用朱可夫元帅的例子来说明苏联军方的政治态度：朱可夫元帅——苏联最伟大的战争英雄——所遭遇的不公且悲惨的经历，时时刻刻提醒着苏联的高级将领：卷入政治斗争者，不得善终。现有制约手段足以把军方势力排除在政治斗争之外。共产党稳握最后王牌，随时可以把野心勃勃的军人清出场。因此，当政治家对军方意见不予理睬的时候，军队别无他法，只能咕哝抱怨而已。^②兰德公司研究员爱德华·华纳（Edward L. Warner）也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毋庸置疑：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但军队的强大并没有提高军方在苏联国内政治中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对军队高层的大规模撤换则清楚地说明，他对军队享有绝对控制力。从建国之日起，苏联军队就在共产党严密的政治领导之下，这一点至今没有变化。^③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队是否会在大规模裁撤之后发动军事政变的判断，本质上探讨的是苏联的军政关系、决策机制，以及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队的掌控能力。总体而言，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做出了正面评价，认为苏联军队实现了政治中立化，服从于文官统治，并不构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来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换言之，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共牢牢掌控着苏联军事决策权，其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毋庸置疑，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① 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

② Condoleezza Rice, “The Party, the Military, and Decision Authority in the Soviet Union”, *World Politics*, 1987, Vol.40, No.1, pp.55-81.

③ 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二）与美国战略界认知不符的真实苏联军政关系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状况的误判，在于高估了戈氏领导的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方人员在政治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影响力。

首先，苏联军事政变并非没有可能。相较于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局势的乐观情绪，苏联国内的气氛显得紧张许多。在 1989 年最高苏维埃国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几位代表提议该委员会应该完全由文官组成，将现有的军方人员排除在外，以确保“军队或克格勃永远无法发动军事政变”。亚佐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被问道，“我们的国家是否有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亚佐夫当即否认，说“绝无可能”。^①以上例子均表明苏联国内对可能发生军事政变有很强的担忧，当自身利益受损时，苏联军方并不像表面上那般平静顺从，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和政治稳定的判断过于乐观了。

另外，更重要的是，在“8·19”事件中许多被派去镇压叶利钦支持者的军方人员都临阵倒戈。当“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犹豫踌躇许久，终于下定决心动用武力围攻白宫时，负责执行任务的军官却拒不听从从亚佐夫的命令。几千名首都群众赶到白宫门口搭起防护栏，自发保卫白宫。^②面对这一形势，被派去打头阵的空降兵师长列别德认定“行动没有任何意义，会导致大量流血，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这个罪责”；卡尔普辛将军负责这次围剿行动，当部下表示“如果上面下达强攻白宫的命令，我们将拒绝执行”时，他默许并表态“我不准备参加行动”。^③军令无人执行，攻打白宫的计划不了了之，亚佐夫最终只能下令撤军，以武力挽救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最后一次努力宣告失败。用亲历苏联解体的中国原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杨恕的话说，“不开枪，就是苏联军队的情绪和政治选择。”^④

党和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掌控力并非外界以为的那般严密，苏联军队在“8·19”事件中的不作为甚至倒戈说明了这一点。戈氏因何失去了军队？

① Mark Kramer, “Soviet Military Policy”.

② 王国杰：“‘八·一九事件’的透视与剖析”，《东欧中亚研究》，2000 年第 1 期，第 43-52 页。

③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06 页。

④ 张鹏：“试析军队为何未能挽救苏联”，《理论与当代》，2014 年第 11 期，第 27 页。

首先，卷入政治斗争不符合苏联宪法对苏军行动范围的限制。苏联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为保卫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就与和平劳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建立苏联武装力量，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苏联武装力量对人民的职责是可靠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经常保持战斗准备以保证立即反击任何侵略者。总之，苏联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外御强敌，而非在国内维稳、镇压起义。这就意味着，从法律角度看，戈尔巴乔夫其实无权调动军队来镇压国内叛乱、维持政治稳定。传统的军事教育也强调军队负有守卫人民的光荣职责，将枪口对准民众、造成流血冲突更是有损军队的荣誉。^①

另外，戈尔巴乔夫多次将流血事件的责任推到军队头上，造成关系破裂。尽管苏联宪法对苏军行动范围有明确规定，但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军队经常被用作灭火器，前往各地镇压政变和起义：1986年12月的阿拉木图事件、1989年4月的第比利斯事件、1990年1月的巴库事件、1991年1月的波罗的海事件。^②在这些事件中，均有军队出动，且造成人员伤亡。频繁的军队调动和流血事件，不仅有违苏联宪法对军队使用的限制，也严重破坏了苏联军人的荣誉感。更加严重的是，每每发生流血事件，戈尔巴乔夫都将责任推到军队头上。事实上，在以上每次事件中，戈尔巴乔夫都亲自批准了进行军队部署的决议，但他的命令总是含糊其辞：不要造成对抗局面，忽视抗议中的过火行为，重点是制止抢劫和占领政府机关的现象发生。他给自己留了充足的余地，一旦镇压失败或发生流血事件，从未承担过责任，而是默许人民代表大会对军队高层进行质询，放任新闻报刊对军队进行口诛笔伐。^③开赴加盟共和国进行武力镇压，本就不合宪法，也有违苏联的传统军事教育。戈尔巴乔夫的推卸责任，更使得军队对其彻底失望。1989年的第比利斯事件，被视为“军队信任丧失的分水岭”。^④在此次事件中，军队武

① Julian Copper, “The Military and High Education in the USSR”,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89, Vol.502, No.1, pp.108-119.

② 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第260页。

③ 刘振：“苏联军队的心理是怎样崩溃的？——从群体视角看苏军的瓦解”，《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11-12期，第51-56页。

④ 刘向文：“苏军的非政治化与苏共的崩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2期，第46-49页。

力驱散示威群众造成了重大伤亡，国内外舆论哗然，要求严惩凶手。戈尔巴乔夫选择高级军官罗季奥诺夫作替罪羊，当即解除了他的职务。^①罗季奥诺夫是南高加索地区的军区司令，在军中声望甚高，戈尔巴乔夫推卸责任的行为引起军队的极大愤慨，时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十分失望地说：“这是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②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认知相符产生的原因

美国战略界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苏联军队的异动，以致对苏联的军政关系做出误判？本文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忽视单元主体属性。美国战略界之所以认为军队可以成为保卫苏联的最后底牌、能在最后关头镇压挑战者、保障苏联的政体安全，是因忽视了苏联军队在对国内起义进行武力镇压时所承担的法律风险。^③然而，如果政治学家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独立的国家单元，而宪法法律、军队传统、军政关系，均是国家单元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进而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

第二，忽视政治领导人的个人角色。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他在处理与军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逃避和推卸责任，深受其过往经历与价值观的影响。费尔班克斯（Edward H. Fairbanks）认为戈尔巴乔夫缺乏军事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决策。^④利加乔夫则认为“戈尔巴乔夫被开明君主的光环所吸引”。^⑤作为一个颇具新貌的苏联领导人，戈氏成了西方媒体的宠儿，所到之处鲜花掌声不断，收获各类奖项和荣誉。^⑥醉心外交成就的直接后果，是将外交日程置于国内问题之上，关心国际评价甚

① 左凤荣：“第比利斯事件的前因后果”，《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第122-127页。

② 张鹏：“试析军队为何未能挽救苏联”。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66页。

④ Edward L. Warner, *The Defense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⑤ [苏]叶戈尔·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王廷玉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⑥ 包括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获评《时代周刊》“十年风云人物”，同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于国内舆论。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阿尔泰边疆区区委书记在发言时呼吁总书记埋头国内事务，少到国外周游。更严重的是，在西方受到的赞誉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亦是一种牵制，维护自身和平声誉的个人需求，是他在流血事件发生之后极力推卸责任的重要原因。

总之，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判断中存在严重的认知相符，充分相信苏联军队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令行禁止的统一整体，是苏联政权最后的守护者。这种认知相符产生的原因，在于对苏联宪法关于苏军行动范围的限制、苏联军人不针对平民的信念、戈尔巴乔夫与军队关系的破裂等政治规制与现实，缺乏足够系统的了解。因此，他们始终将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视作拱卫苏联政权的政治资本。^①戈尔巴乔夫经常被颂扬或被指责“未使用军队镇压挑战者”^②，殊不知宪法并未赋予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权力。“未使用军队镇压挑战者”既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仁慈，也不是他的政治失误，而是法律、传统、情势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由于多次违法、违背传统地使用军队充当“灭火器”，事后又推卸责任，军队早已经对政权高层失去信任。苏联军队并不能、也不愿挽救苏联的存在。这并非像美国战略界有人后来在为自己辩护时所言的，“苏联军队未竭尽全力挽救政权，主要是由其高度的职业精神决定的”。^③对以上事实的忽略，使美国战略界无法想象包括手握兵权的国防部长在内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为何会败给无一兵一卒的叶利钦。

四、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外交最严重的认知相符，在于将东欧国家视作苏联沉重且危险的负担，而东欧和平剧变则是苏联的一种解脱。诚然，以上判断并非没有依据，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美苏关系的缓和，让东欧国家作为苏联安全和意识形态屏障的地位有所下降，而此起彼伏的政治动乱又让以往的安全地

① John W. R. Lepingwell, “Sovie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August Coup”, *World Politics*, 1992, Vol.44, Issue 4, pp.539-552.

② 左凤荣：“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2期，第22-24页。

③ John W. R. Lepingwell, “Soviet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August Coup”, pp.564-572.

带变成了潜在的祸乱发源地，苏联对东欧共产党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让苏联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东欧之于苏联，可谓地位下降，而维系成本骤升。

然而，这种认知相符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在进行精明的收益-成本分析时，忽视了东欧政治剧变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东欧政治进程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的“影响循环流”（circular flow of influence）^①，以及东欧成功脱离苏东集团对苏联国内民族分离主义的鼓舞作用，未能预见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和分离主义将被催化加速，最终也未能成功预测苏联因此解体的可能性。

（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内在逻辑

若以世界主义的眼光看待东欧剧变的历史，八个国家和平地实现政权更迭、几乎没有流血冲突，实在是一大幸事。

但对苏联而言，后来的局势证明：拱手出让东欧是一个巨大的战略失误，东欧剧变吹响了苏联解体的前哨。

其一，东欧剧变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苏联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意识形态是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②而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需要被证明、可能被证伪的。当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发展无法为社会经济提供有力支持，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吸引力时，苏联模式就被证伪了。^③东欧各国脱离苏联、重归欧洲的强烈愿望，固然受与苏关系历史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是对苏联模式的失望所致。但细观剧变，可总结为“民主化”“市场化”“欧洲化”，与苏联体制下的“一党执政”“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大家庭”几乎完全对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东欧的政治进程仍是一场意识形态抉择，是对苏联模式的极大否定。^④

其二，东欧剧变与苏联国内改革之间存在“影响循环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推行的“新思维”实践，对东欧国家剧变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

①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转引自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7期，第57-75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页。

③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09页。

④ 郑智超：“东欧的苏联模式化与苏联模式化的东欧——东欧剧变根源的历史再考察”，《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1期，第13-20页。

他的自由化政策对欧洲共产主义政权覆灭的时间和节奏至关重要。^①东欧剧变也同样鼓励了苏联国内的改革派。马克·克莱默曾发表三篇系列文章说明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的关系，他认为东欧与苏联的改革具有“双向引导效应”：东欧国家最初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引导，在苏联的允许、指引、鼓励下探索改革；但在后期，引导方向发生了调转，东欧“以一种示范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导致苏联走向解体”。^②阿奇·布朗（Archie Brown）则以“影响循环流”来形容东欧改革浪潮向苏联的回流。^③在东欧如火如荼的改革事业影响下，改革气氛笼罩整个苏东集团，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改革派受到鼓舞，传统派则成为不合时宜的守旧势力。失去传统力量的牵绊，也意味着失去传统政治智慧的约束和谨慎审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呈现出急躁轻率的势头。从政治技术上说，改革从来都是一项高度精密且危险的事业，急躁和轻率向来是改革大忌，频繁且大量地调换高级官员、撤销重组政治机构，必然会影响政治运作的稳定和效率。

其三，东欧剧变鼓舞了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处理东欧事务的基本原则是“不使用武力进行干涉”。此外，戈尔巴乔夫也多次强调“民族自决权”，例如在两德统一前声明“德国人有权决定他们本民族的命运”。^④这一温和的处理方式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让他们有理由相信，戈尔巴乔夫不会用武力镇压自己的分离行动，甚至会理解他们的分离诉求。受此影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运动几乎

① 例如，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在布加勒斯特演讲中鼓励罗马尼亚人走上苏联已开始落实的民主化道路，几个月后的12月25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被处决。1990年2月26日，戈尔巴乔夫答应捷克斯洛伐克新当选的非共产党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要求，加速苏军的撤离。这导致该国全面的去苏联化。几天之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访问莫斯科，戈尔巴乔夫与其共同宣布“只有德国人民有权决定是否想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参见[美]戴威·阿尔贝尔、兰·埃德利：《西方情报机构与苏联解体：未能撼动世界的十年（1980-1990）》，第220-221页。

② Mark Kramer, “The Collapse of East European Communism and the Repercussions within the Soviet Union(Part 1)”,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3, Vol.5, No.4, pp.178-256.

③ Archie Brown,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London: Bodley Head, 2009. 转引自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第57-75页。

④ “戈尔巴乔夫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件：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中的一些迫切的问题”，1986年6月28日。转引自崔海智：“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385-410页。

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剧变同步展开，从 1990 年开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将苏联官员驱逐出境。^①作为苏联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俄罗斯的独立事实上宣告了苏联的终结。

总之，苏联的解体，首先源于其帝国外部的叛离。因为东欧国家的政治进程是对苏联模式的彻底否定，在意识形态层面对苏联造成极大挫伤。在实践层面，东欧的改革浪潮向苏联回流，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东欧国家的和平分离，则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均是造成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东欧剧变是苏联解体的前哨战。^②

（二）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的误判

东欧剧变给苏联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对于苏联自身而言十分隐蔽。在剧变的酝酿和进行之时，苏联高层并没有意识到东欧政治进程的示范效应和鼓动作用，而是以“甩包袱”般轻快的心情默许并支持这一系列变革。对于美国来说，东欧剧变给苏联带来的种种微妙反应，更难以察觉。美国战略界并未预见到东欧会如此迅速地、出现如此规模的剧变。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办公室的网站上，至今仍保留着关于东欧剧变的这样表述：当 1987 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乐观地呼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倒这堵墙”时，也未曾想到两年后的东欧共产主义政权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崩溃。^③事实上，在苏联解体后的十余年内，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直到 2000 年后，这一问题才引起了重视。^④与苏联的“甩包袱”心理类似，美国也认为东欧对于苏联而言是一个沉重负担，东欧剧变对苏联来说有利而无害。^⑤美国战略界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东欧的地缘战略地位有所下降。美国战略界存在的一种固有观

① 左凤荣：“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的失误与苏联解体”，《探索与争鸣》，2015 年第 1 期，第 85-90 页。

② Johnson M Sesa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https://www.academia.edu/11257342/The_Collapse_of_Communism_in_Eastern_Europe_and_the_Soviet_Union

③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1989”,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89-1992/fall-of-communism>

④ 郭洁：“冷战与东欧——近二十年国外学界相关代表性研究及述评”。

⑤ Johnson M Sesan, “The Collapse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Soviet Union”.

点认为，二战之后，斯大林在苏联西部构筑起缓冲地带，将东欧国家变为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屏障区域，是出于地缘战略考虑。^①但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领土的战略地位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当苏联对东欧进行取舍选择之时，其成本收益分析已经发生显著变化。^②此外，从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力促缓和，而非对抗。冷战与苏联解体并不等同，欧美学者认为，美苏两极对抗的历史在1986年雷克雅未克会晤或1987年华盛顿会晤之后便已结束。^③苏联不再同美国展开竞赛和对抗，更多地强调合作，甚至向美国请求援助以支持其国内的改革事业。如果中心地带无意开战，对抗的前沿阵地也就失去了战略意义。莫戈莫洛夫向苏共中央所提的建议清晰地说明了苏联对东欧战略地位的新定义：中东欧国家只需成为苏联“西部边界地带存在的友好国家”，而非“缓冲国”或“免疫地带”。^④

另一方面，政治动乱使东欧从安全屏障变为祸乱发源地。当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面临反对派和群众的挑战时，苏联便成为它们求助的对象。执政当局寄希望于苏联，希望苏联能够动用驻扎在当地的军队来帮助他们镇压游行示威，甚至清剿反对派，一如它过去所做的那样。^⑤然而，彼时已不同于往日，且不论东欧之于苏联的战略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东欧政治动乱所涉及的范围已然不同：以往的政治动乱属于偶发事件，在单个国家零星爆发，而1989年前后的政治动乱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在东欧八国均有发生。可以说，东欧已经从苏联的安全屏障，变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如果苏联进行干预，就只能把军队如同救火队一样派去各地灭火。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种强力措施的巨大成本。在戈尔巴乔夫急于修复与西方关系的关键时刻，武力镇压所带来的成本

① 郭春生：“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改革浪潮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2期，第64-69页。

② 高歌：“东欧剧变与冷战结束”，《俄罗斯学刊》，2019年第3期，第5-25页。

③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4页。

④ “莫戈莫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新构想”，1990年1月。转引自崔海智：“俄国解密档案：苏联对东欧剧变的反应和思考”，《冷战国际史研究》，2016年第2期，第385-410页。

⑤ 郭洁：“东欧剧变的‘苏联因素’探析”，《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0年第9期，第41-53页。

更是难以承受的。^①正如莫戈莫洛夫所指出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动荡使得“以前的安全地带”变成了“不稳定的地带”“潜在的危險源泉”；而中东欧共产党政权希望苏联出兵镇压，这种潜在的维稳义务与苏联的缓和政策背道而驰。^②

作为与苏联缠斗了数十年的对手，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布局和考量了如指掌，能够感知东欧之于苏联的战略地位下降、而维系成本攀升，因此同苏联高层一样，将东欧视作“包袱”和“火药桶”，认为东欧的和平剧变对苏联而言不失为一种可喜的解脱。美国战略界从而忽视了东欧政治进程的示范效应和鼓动作用，未能预见到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和分离主义将被催化加速，进而导致苏联的解体。

（三）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产生误判的原因

美国战略界对东欧剧变判断中的认知相符，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忽视戈尔巴乔夫个人的作用。对于戈尔巴乔夫拱手让出东欧的行为，评价呈明显的两极分化。他将新思维应用于苏联的外交中，认为全人类的生存是最重要的，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国家间竞争应该让位于全人类利益。^③上述思想被赞为国际主义，也被贬为空想主义。赞誉者列举戈尔巴乔夫为推动冷战终结做出了巨大贡献，获得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实至名归。批评者则认为戈尔巴乔夫应该为苏联解体负责。例如，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认为，“如果我们要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归结为某一个人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④维护自身和平声誉的个人需求，是否会影响他的东欧政策？允许东欧和平剧变，或许并非出自对民族自决权的尊重，而是爱惜羽毛使然。无论戈尔巴乔夫在东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克制是出于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⑤，抑或“对

① 田少颖：“戈尔巴乔夫的‘共同欧洲家园’外交构想研究”，《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76页。

② “莫戈莫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关于苏联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新构想”。

③ Peter Zwick, “New Thinking and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89, Vol.22, Issue 2, pp.215-224.

④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第766页。

⑤ 左凤荣：“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中政治与道德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4期，第42-46页。

自身声誉的渴求”^①，东欧剧变都是苏联解体的第一声丧钟，由戈尔巴乔夫本人敲响。对戈尔巴乔夫个人角色的忽视，使美国战略界无法理解苏联在东欧剧变过程中所做出的反应。

其二，选择性漠视东欧剧变的影响力。从现有的关于东欧剧变的研究分析，苏联在放弃东欧时尚未充分认识到东欧剧变会助推苏联的解体。美国战略界也有一种与此相关的认知：既然苏联对东欧共产主义政权所负的“道义责任”正在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那么戈尔巴乔夫放弃东欧就是客观上为苏联帝国减负；如果过多推演东欧剧变是苏联帝国外部崩溃的起点这一显见的事实，那么将诱使苏联重拾对东欧的控制；^②仅仅专注于东欧剧变后的“民主化”“市场化”和“西化”，就已经完全契合美国的利益与期待。这让美国忽视了苏东关系破裂对苏联政体安全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陷入将有大批国家加入“第四波民主浪潮”^③的盲目乐观之中。东欧演化方向符合理论期待所导致的盲目乐观，是美国战略界在东欧问题上产生认知相符的重要原因。

五、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判断中的认知相符

苏联解体以来，当人们试图总结这一庞大帝国轰然坍塌的原因时，经济崩溃、民族问题出现的频率最高：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经济，美国的石油价格阻击导致苏联经济崩溃，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等等，都是经常被列举的原因。^④经济困难和民族问题固然是苏联后期的顽疾所在，也是最终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然而，近些年来，意识形态这一长期被忽略的因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

① [苏]叶戈尔·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04页。

② Rey Koslowski, Friedrich V. Kratochwil, “Understanding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Soviet Empire’s Demise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4, Vol.48, Issue 2, pp.215-247.

③ Archie Brown, *Seven Year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Perestroika in Perspective*,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18. 转引自封帅：“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3期，第87-99页。

④ 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Policy*, 2011, Vol.187, pp.64-70.

注。^①意识形态这一隐蔽却又极为重要的问题，在反思苏联解体原因时容易被忽视。当国家尚存之时，要准确识别意识形态的崩坏程度及其对国家肌理造成的腐蚀，更是难上加难。另外，苏联末期百病丛生，经济、民生、民族、军事等显性问题不断浮现，美国战略界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此，这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因素的隐蔽性。意识形态问题固然难以察觉，但在苏联解体前，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迹象，例如新闻审查制度的放松，以及报刊新闻对政府的公开批评。^②美国战略界并非没有看到这些变化，但却对其作选择性的解释，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后果。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新举措，对苏联政体而言是一种危险尝试，但在美国的价值体系下，则是朝着“新闻自由”前进。当苏联意识形态的新变化与美国战略界既有的认识贴合之后，即形成了如此“离奇”的认知相符：对美国战略界而言，苏联的意识形态动向非但不构成问题，不会带来崩溃，反而是增强苏联活力的一个变化。

（一）苏联意识形态衰退的事实

苏联意识形态的衰退始于什么时候？列宁之后的每任领导人也许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斯大林极致的个人独裁和残酷的政治清洗，让共产主义蒙上一层血腥的恐怖色彩；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破坏了党的权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引起极大的混乱。^③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经济衰退，则让“社会主义的劳动生产水平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期待无法实现，人们开始怀疑共产主义作为历

① 如[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I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p.64-70; Francis Fukuyama, “The Modernizing Imperative: The USSR as an Ordinary Count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93, No.31(Special Issue: The Strange Death of Soviet Communism: An Autopsy), pp.10-18; 薛小荣、郭沈青：“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1期，第74-81页；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6-25页；郭艳：“意识形态、国家认同与苏联解体”，《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4期，第80-84页。

② 贾乐蓉：“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传媒体制的变迁——从改革工具到‘第四权力’”，《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5期，第53-66页。

③ 徐海燕：“步入歧途：苏联解体进程中的意识形态蜕变”。

史发展必然方向的论断是否成立。^①然而，对意识形态造成最直接严重冲击的，还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新思维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将“新思维”转化为新政策实践方面，遇到了内部政治抵抗、系统性惯性和意识形态障碍；而且“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新思维，在国际上广受怀疑。戈尔巴乔夫必须通过苏联的国家行为，使西方世界相信新思维不仅仅是声明性政策，而是可以落地的实践政策，同时还必须使苏共党内同志也认同新思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致。^②

首先，戈尔巴乔夫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苏联的每位领导人都有一位可长期依靠的意识形态主管，例如勃列日涅夫拥有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意识形态参谋部”，而列宁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③但戈尔巴乔夫没有这样的依靠，1985-1991年间，他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叶戈尔·利加乔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瓦季姆·梅德韦杰夫先后主管过意识形态工作。频繁更换意识形态主管的直接后果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政策极不稳定，而舆论和人心一旦被搅乱则很难平复。

其次，戈尔巴乔夫将“公开性原则”应用于舆论管理。戈尔巴乔夫的第二任意识形态主管雅科夫列夫被称为“改革的头脑”，属于共产党内“激进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是“公开性”和“民主性”最主要的导演者。^④由于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激进改革，雅科夫列夫甚至被称为“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⑤担任宣传部门的负责人之后，雅科夫列夫挑选了一批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各个重要新闻媒介任职，舆论氛围突然“宽松”，攻击社会主义、攻击联盟成为时髦。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本身，对苏联意识形态造成了最严重的打击。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共产党的政治自杀来实现苏联的政

① 陆南泉：“走近衰亡——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研究”，《世界知识》，2012年第4期，第69页。

② Peter Zwick, “New Thinking and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Gorbachev”.

③ 李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及管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1月，第139-143页。

④ 韩克敌：《美国与苏联解体》，第87页。

⑤ 孙铭：“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红旗文稿》，2014年第11期，第35-36页。

治民主：1988 年宣布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取代政治局，作为苏联政治生活的中心，一党制开始动摇。^①1990 年 3 月，修改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维埃社会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而是变成众多政党中的普通一员，通过“当选为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以及其他方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苏联共产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就此终结。^②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政治自杀行为，是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最大否定。^③

意识形态对苏联政权稳定究竟有多大作用？意识形态的崩溃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起了多大影响？2011 年，在苏联解体二十周年之际，美国企业研究所俄罗斯研究部主任列昂·阿伦（Leon Aron）在《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上发表题为“关于苏联解体：你以为知道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一文，探究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④作者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视为一场“思想和道德追求”，认为这场改革的本质是“建立一个更有道德的苏联”，改革掀起了整个社会对国家历史的批判、冲破道德虚伪的浪潮；这种批判和精神追求，使得苏联的存在变得“不道德”，最后在人人厌弃中悄然消亡。

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尤尔查克（Alexei Yurchak）曾对 20 世纪 50-70 年代出生的苏联人进行专访，问他们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他发现，苏联人都知道几十年来苏联政府进行的宣传有多么荒谬，于是培养出两套意识形态，一套是显性意识形态，习惯性地拥护党和共产主义；一套是隐形意识形态，对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及一党执政心怀不满。^⑤当戈尔巴乔夫和众多政府喉舌开始提倡民主、公开、选举、无记名投票之后，民众的隐形意识形态就彻底翻涌而出，对党和政府多年的积怨集体爆发，党的合法性岌岌可危。

① 吴大英、任允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苏联宪法（基本法）修改和补充的法律”，《环球法律评论》，1989 年第 2 期，第 59-66 页。

② 伍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修改补充苏联宪法（根本法）的法律”，《环球法律评论》，1990 年第 3 期，第 56-62 页。

③ 门洪华、肖晔：“国际战略惯性与苏联的命运（1979-1989）”，《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第 184-192 页。

④ 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⑤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I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回顾“8·19”事件的事发始末，并反思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麦德维杰夫是苏联著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亦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同时投身政界，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具有通畅的信息渠道。在他看来，意识形态衰败是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因为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治合法性的全部来源，苏联的建立不是依靠民族纽带、历史传统，也不是依靠君主政体，或者宗教思想，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统一。对苏共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它的核心，正统思想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党的威信不断下降，苏联大厦必然要倒塌。^①

（二）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问题的固有判断

回看美国战略界的苏联研究，经济和民族问题始终是关注焦点。当戈尔巴乔夫宣布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作为政治改革目标之初，苏联的报纸杂志开始公开批评政府，诸多政治家公开宣布退党时，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却始终没有注意到这场毅然决然的政治倒戈背后，蕴藏着意识形态的彻底转向，也未曾意识到对于苏联这样一个依靠意识形态立命的帝国，意识形态的崩溃有何致命影响。

首先，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问题的忽略。自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频频有大动作、大变化。苏联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让美国这个缠斗了数十年的老对手错愕不已，吸引了战略界人士的注意力。纵览此期间的学术论文、智库报告、政府文件，或有担忧苏联命运者，但大多从经济和民族问题出发，期待经济崩溃导致的民怨沸腾、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终结苏联。在这些显性议题面前，意识形态因素过于隐蔽，难以引起关注。^②意识形态的衰落是一种慢性疾病，它起作用的方式是让民众对国家逐渐失去信心，但不会导致其猝死。^③苏联意识形态走向衰落、失去吸引力，也许能够令美国战略界确信苏联终有一天会解体，但无法预测会在1991年。

诚然，意识形态问题并非完全被忽视，苏联突然活跃的政论氛围的确引起了部分美国人的注意。然而，由于价值体系的不同，观察人士无法将“言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页。

② Aron Leon, “Everything You Think You Know abou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③ Ronald H. Linden, “Reflections on 1989-and After”,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9, Vol.56, No.5, pp.3-10.

论自由”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反而以赞赏的眼光看待苏联的这一新变化。美国战略界并非全然没有注意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新动向，但由于这一新变化与其信奉的价值观——公开、自由、民主——完全相符，与其所期待的“和平演变”也基本契合，因此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①这一基本事实，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如此一来，即使有识之士观察到苏联意识形态的松动，也难以预见这一问题的灾难性后果。^②

（三）美国战略界对苏联意识形态产生误判的原因

苏联是一个依靠共产主义信仰建立起来的国家，民众对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党国精英的政治忠诚的合法性皆源于意识形态。美国战略界之所以会忽略和误读这一重大现象，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对“软因素”的忽视。意识形态问题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加上苏联时值多事之秋，意识形态的衰落成为“房间里的大象”，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除此之外，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集中关注经济、军事等可量化因素，而忽视意识形态等难以量化的“软因素”，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康纳（W. R. Connor）所言，西方的苏联学家所依赖的分析视角太过局限，他们总是着眼于可量化的因素（Quantifiables），例如经济发展、军事力量、农业产值等。这种模式化的研究，忽略了苏联社会以及东欧国家当下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民众的民族情绪，他们对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渴望，或对当局的不满情绪，认为政府已经丧失执政合法性……这些因素被认为“太软”（Soft）、“不够科学”（Unscientific），而被选择性地屏蔽和忽略。^③

其二，美国战略界犯了“由己推人”的错误。美国战略界未能认识到苏联意识形态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对苏联的社会状态做出误判，也是因为这种变化符合美国的期待，由此产生认知相符。在苏联解体前夕，意识形态衰退已经有十分明显的迹象，美国战略界看到了这些变化，但却不以为意，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会给苏联带来灾难性后果。美国战略界忽视了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第206页。

② Sajjad Ali Khan,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fall of a state or the fall of an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2008, Vol.5, Issue 2, pp.81-99.

③ W. R. Connor, “Why Were We Surprised?” pp.175-184.

苏联是一个“现代”的后帝国主义国家，而保持后帝国状态的“水泥”就是意识形态的复合体，包括讲等级和纪律的政党、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者以及对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水泥”开始崩溃。^①究其原因，意识形态方面的新举措，对苏联政体而言是一种危险尝试，但美国战略界在对其判断中产生了基于本国价值体系的认知相符，认为这是朝着“新闻自由”前进，是增强活力的体现。美国战略界当时无法将“言论自由”“取消书报审查”与“亡党亡国”联系起来。

六、结语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的认知相符，呈现出全面性的特征，并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

在经济方面，苏联经济于 20 世纪 70 年代达到峰值，从此之后陷入漫长的停滞。美国经济学家意识到苏联经济增速的放缓，但将其与“苏联经济发展整体向好”的固有认知挂钩，对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在军事方面，借用技术情报手段，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事实力有准确和翔实的认知。但对于苏联的军政关系，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与军队的关系，美国战略界却始终缺乏了解。美国战略界忽视了苏联军政关系的恶化，高估了苏共对苏联军队的掌控力、低估了苏联军队在政治进程中的自主性，认为军队是保卫苏联制度最后的守护者。

在外交方面，美国战略界低估了东欧剧变对苏联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将东欧视为苏联的“包袱”，认为东欧剧变事实上帮苏联减轻了负担，是为苏联帝国减负。然而，东欧剧变在本质上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弥漫于苏东阵营的改革氛围加速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进程，同时极大地鼓舞了苏联国内的分离主义。

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战略界忽略了“苏联是一个意识形态帝国”这一重要事实。意识形态问题本身不易被察觉，苏联末期经济、政治、社会的种

^① Chaim Shinar, “The Role of the National Problem in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European Review*, 2013, Vol.21, Issue 1, pp.56-69.

种剧变吸引了观察者的注意力，在这些显性议题面前，意识形态因素过于隐蔽而被忽略。即使有人注意到苏联社会的意识形态变化，但也相信这种变化是苏联政府掌控下的变化，意在增加苏维埃国家的政治活力，因为这与西方国家通过“公开”“自由”“民主”保持政治价值活力的做法基本相符，因此无法准确理解意识形态对于苏联政权安危的极端重要性。

美国战略界对苏联解体预测中出现了全面的认知相符，这导致对苏联解体预测的集体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基于固有思维的研究方法催生认知相符。苏联学界的研究方法过于强调抽象性而忽略单元主体特性，过于强调科学性而忽略苏联领导人的个人角色。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重视体系研究，认为国家个性将服从于体系结构。美国战略界对苏联军政关系的误判，就是出自对国家特性的忽略。如果美国战略界的研究者们将镜头拉近，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视角转向国家具体的独立单元，便会注意到苏联宪法对军队行动范围的约束、苏联军队的荣誉观，以及戈氏与军队的龃龉，从而对军队维护苏联政权的意志与能力持谨慎态度，对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多一份想象。如果对俄国路标转换陡然性规律有所认识，美国战略界在面对苏联解体时也许不会如此错愕困惑。

其二，苏美互动中的国家信号与传递不畅催生认知相符。苏联政治过程的黑箱特质极大地压缩了外界对于苏联的可观测空间，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而且时常有意误导，统计数据的失实给美国战略界评估苏联真实状况设置了很大的障碍。这导致对苏联“宁可高估、不可低估”成为美国战略界普遍持有的心理，因高估对手而加紧防备带来的额外代价，远比因轻视对手而惨遭覆灭要低得多。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尽管苏联疲态尽显，美国仍然把它视为最具实力的对手，无法客观准确地评估其实际状况。加之苏联演化方向符合期待，这一事实也加剧了美国的乐观态度。

其三，在美国的苏联学界，对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缺失，催生了认知相符。当冷战时期的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追求理论的科学性时，意识形态这一“不那么科学的”“软因素”被彻底忽略了，而意识形态崩溃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为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

【Abstract】 The U.S. has the most institutes on Soviet studies and the most powerful intelligence system, but why did it still fail to predict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Based on the “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 of Robert Jervis, a prominent schola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st known for his theories on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all-round misjudgment of predictions of the U.S. strategic circle regarding the Soviet Union. As far as economy is concerned,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s economic upturn from 1970 to 1990, American economists are overly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economic trends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erms of military affairs, they overestimated Gorbachev’s control over the Soviet army and underestimated the autonomy of Soviet military personnel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They firmly believed that Gorbachev could adopt forces to defend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last minute. As to diplomacy, they held that the peaceful upheaval in Eastern Europe was a relief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ignored the “circular flow of influen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Eastern Europe and internal reforms of the Soviet Union. Besides, they also ignored effects of the upheaval in Eastern Europe on the domestic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the decline of ideology at the end of the Soviet Union was misinterpreted, and the fact that ideology constituted the main legitimacy of the Soviet regime was ignored.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mprehensiv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merican strategic community ultimately failed to forese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ey Words】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merican Sovietology, Strategic Forecast, U.S.-Soviet Relationship, Cognitive Consistency Theory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обладали крупнейшим институтом совет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самой мощной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ой системой, но почему они не смогли предвидеть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заимствует теорию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из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лож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бертом Джервисо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шко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ознания, для анализ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го неправильн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о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коллективных прогнозах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кругов США.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опыт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дъём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1970 по 1990 год,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экономисты чрезмерно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 предсказали будущие тенден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енной сферы, они переоценили контроль Горбачёва над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ей и недооценили автономию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они твёрдо верили, что Горбачёв может применить силу для защит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оследнюю минуту.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они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мирные потрясения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были облегчением дл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игнорировали «круговой поток влияния» меж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процессами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и внутренними реформам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 также обнадёживающее влияние потрясений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епаратизм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В области идеологии упадок социальн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конце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был неправильно истолкован, и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идеология являлась главной легитимностью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ежима, игнорировался. Ввиду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ой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не смогло предвидеть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аспад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прогноз, американско-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еория когнитивн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责任编辑 崔珩)

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 ——以“全俄中心” 民调数据为依据*

曲文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以俄罗斯知名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民调为依据,分析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20世纪末、21世纪初,尽管总体上俄罗斯社会已经形成了对华友好认知,但“威胁论”也有一定的市场,并且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前还有所增强。乌克兰危机则成为分水岭,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格局得以形成,消极认知大幅下降。(2)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也因乌克兰危机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者,转变为取代西方的优先经济伙伴。但俄罗斯人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和劳工移民仍心怀疑虑,对中国商品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还广泛存在。(3)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与角色定位,受制于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这两个变量,前者作为一阶约束条件存在,后者的影响取决于俄与西方关系这一外在环境的性质。(4)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大大减弱,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却继承了衣钵,成为新的传播中心,需要加以关注。

【关键词】俄罗斯民意 中俄关系 对华认知 俄罗斯远东 乌克兰危机

【中图分类号】D829**【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038(34)

* 非常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但文责自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国际经济权力转移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20&ZD143)的阶段性成果。

** 曲文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教授。

自 1922 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出版《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起，舆论和观念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是我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在我国对外战略中占据特殊地位。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不仅关涉俄方对中国的角色认知，而且对俄罗斯人认知自我与判断其国家的未来发展，包括对外政策的制定，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厘清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意图和期待，了解俄方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倾向和发展趋势，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自己、进行理性的自我定位和表达，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有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变迁，专门的研究比较少，一些相关的讨论多散落在有关“在俄中国形象”的文章和著作中。“在俄中国形象”是个广泛的概念，主要涉及俄罗斯人对中国内政和治理经验、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知，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评价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并非研究重点。换言之，关于他者形象的研究，主要关注他者本体或其内部事务在外部世界的投射，较少涉及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对他者与自我关系的评价，尽管与对他者本体的看法相关，但并不完全受后者支配，因为后者更多受评价者的主观偏好影响，而前者主要由评价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所决定。俄罗斯学者拉琳娜的研究发现，俄太平洋沿岸居民对太平洋邻国与俄罗斯关系的评价，与他们对邻国本身的评价和喜好程度，并不完全一致。^①

梳理文献可知，早在 17 世纪就有俄国人发表著作，描述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但很长时间里并无专门著作研究俄国人中俄关系的认知问题。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一话题并未受到学界关注，直到 90 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发表。截至目前，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三个紧密相关的主题展开。

^① 拉琳娜：“公众舆论认知中的现代中国和俄罗斯——中俄关系：太平洋沿岸俄罗斯居民的观点”，《西伯利亚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94-95 页。

（一）对中俄政治关系的认知及影响因素

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和帕拉多恩·朗西马彭（Paradorn Rangsimaporn）对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关于中俄关系的认知进行了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现代俄罗斯人中间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华友好认知，但“中国威胁论”也大有市场。朗西马彭指出，俄罗斯精英对中俄关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因素影响，俄中“战略伙伴关系”是在打“中国牌”，以对抗美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许多外交政策精英仍对中国抱有疑虑和恐惧。^①卢金指出俄罗斯社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有人将中国视为平衡西方的工具，也有人将其视为主要的危险。此外，“威胁论”在远东地区被渲染得更为厉害，是因为当地政府利用其与联邦政府进行政治博弈。^②

进入 21 世纪，伴随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相关研究开始增多。徐翀利用个别年份数据，研究了俄罗斯人对中国敌友关系的态度^③；郭小丽引用俄罗斯社会学调查和学者的研究成果，描述了 21 世纪前十年俄罗斯社会在中俄关系认知上的积极变化。^④国外学者重点研究了中国崛起背景下俄罗斯人在对华政策认知上的分歧。什拉彭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描述了 21 世纪初俄社会对中国态度的矛盾性，指出各阶层的俄罗斯人都愿意将中国视为友好邻国，但同时对这个亚洲巨邻心存恐惧。其文章特别关注美国因素对塑造俄精英阶层涉华态度的作用：虽然一些具有强烈反美倾向的精英将中国视为主要盟友，但其他精英则视美国为可以帮助俄罗斯保护领土不受中国侵犯的唯一力量。^⑤索洛门采娃（Anastasia Solomentseva）通过考察俄罗斯三个群体（政治家、科学家和普通公民）对于中国崛起及其对俄影响的认知，得

① Paradorn Rangsimaporn, “Russian Elite Perceptions of the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996-2001)”, *Slovo*, 2006, Vol.18, Issue.2, pp.129-145.

② Alexander Lukin, “Russia’s Image of China and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East Asi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1999, Vol.17, No.1, pp.5-39; Лукин А.В. Медведь наблюдает за драконом. Образ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и в XVII—XXI веках. М.: Восток-Запад: АСТ, 2007.

③ 徐翀：“近十年俄罗斯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基于俄国内民调结果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 年第 2 期，第 92-104 页。

④ 郭小丽：“俄罗斯民众对华认知的新趋势”，《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 年第 3 期。

⑤ Vladimir Shlapentokh, “China in the Russian mind today: Ambivalence and defeatism”, *Europe-Asia Studies*, 2007, Vol.59, No.1, pp.1-21.

出的结论是：俄罗斯社会关于对华政策有三类不同主张，第一类是亲华派，他们把这个亚洲邻国视为全球舞台上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友；第二类在战略三角框架下看待中国崛起，主张与中国适度合作，同时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互动；第三类将中国看成一个潜在威胁。此外，尽管这三类人在总体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也有显著的共性：都认为中国移民进入远东和西伯利亚对俄而言是威胁，并建议尽一切可能发展这两个地区，使它们融入亚太空间这一 21 世纪国际政治的主要舞台，以化解来自中国的威胁。^①

2014 年克里米亚事件，致使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却让中俄两国关系迅速升温。2014 年后发表的成果，普遍注意到了俄罗斯社会对华态度的变化。许华从精英视角梳理了俄政治和知识领袖的态度和观点，提出俄罗斯对中国从不够重视到更加倚重，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② 王文和张婷婷主要通过摘取文章观点，认为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近几年出现了极大改善。^③ 沈莉华等对乌克兰危机以来俄文媒体的涉华报道进行了梳理，指出近些年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在改善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和谐之处。^④

（二）对中俄经济关系的评价

祖延科研究了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在俄境内，尤其是与中国毗邻地区投资活动认知的演变，发现过去 20 年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投资活动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渲染中国威胁转向更有建设性的态度，特别是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居民对中国的认知更加务实。^⑤ 沈莉华等梳理了俄专家对于中俄合作，尤其是远东和北极合作的看法，指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投资和对华经济合作存在消极评价。^⑥ 对远东问题的研究很多涉及的也是中俄经贸合作问题。

① Anastasia Solomentsev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Russia: A Source of Threats or New Opportunities?" *Connections*, 2014, Vol.14, No.1, pp.3-40.

② 许华：“从‘冷眼’到‘热盼’，俄罗斯政治精英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俄中关系”，《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1 期，第 36-48 页。

③ 王文、张婷婷：“俄罗斯对华认知的新变化及前景展望”，《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67-87 页。

④ 沈莉华、李淑华、于小琴、王琦：“俄罗斯媒体和民众对华态度分析”，《俄罗斯学刊》，2019 年第 1 期，第 15-45 页。

⑤ 祖延科：“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在俄境内投资活动认知的演变”，《西伯利亚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56-58 页。

⑥ 沈莉华、李淑华、于小琴、王琦：“俄罗斯媒体和民众对华态度分析”。

（三）对远东问题的认知及其对政策主张的影响

远东问题是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双边关系认知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有时对远东问题的看法甚至决定了俄罗斯社会的总体对华态度。

沃斯克列先斯基（A. Voskressenski）研究了俄罗斯国内在远东边界认知上的差异及其对中俄两国关系的深远影响，以及俄精英在发展对华合作方面的矛盾心态。^①科诺诺夫（С.В. Кононов）通过分析俄罗斯学术和新闻话语，也证实了这种矛盾心态的存在：“危言耸听者”执着于突出俄中互动的危险趋势，而“实用主义者”则强调对华合作之于远东发展的必要性。^②

除了边界认知，移民问题也是远东研究的重点。亚历山大·卢金指出，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居民对中国的人口扩张存在恐惧，但这并不妨碍当地人希望扩大与中国边境地区的经贸合作；“中国威胁论”在远东地区被渲染得更为厉害，这与当地政府期冀以此增强自己与联邦政府政治博弈的筹码有关。^③亚历山大·拉林（А. Ларин）利用 2007 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以及在俄华人移民的态度，指出对华人移民的消极评价是俄罗斯全国性恐惧症的组成部分，对远东地区发展前景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另外，他也指出，大多数俄罗斯人意识到移民劳工的有用性，并愿意以合理的条件予以接受。^④远东地区居民的态度也是研究的重点内容。维克多·拉林（В.Л. Ларин）和拉琳娜（Л.Л. Ларина）对远东联邦区居民的对华态度进行了持续调查和研究。^⑤拉琳娜将 2013 年的调查结果与十年前的调

① A. Voskressenski, *The Difficult Border: Current Russian and Chinese Concept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and Frontier Problems*,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6; A.Voskressenski, “The Perceptions of China by Russia’s Foreign Policy Elite”, *Issues and Studies*, 1997, No.3, pp.1-20.

② Сергей Кононов. Мифотворчество о Кита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граничья как предмет научного дискурса//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вектор. 2016. Т.11. No.2. С.104-111.

③ A. Lukin, “The Image of China in Russian Border Regions”, *Asian Survey*, 1998, Vol.38, No.9, pp.821-835.

④ Ларин 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оценке россия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8. No.5. С.111-123; No.6. С.81-95.

⑤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глазам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иков: эволюция взглядов 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на рубеже XX—XXI веко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2011;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2013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14. No.2. С.5-19.

查结果相比较发现,俄太平洋沿岸居民对中国和中俄关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依然稳定,在该地区居民的心目中仍旧存在“中国威胁论”,但同时,认为应优先发展同中国关系的人也大幅增长。^①拉林和拉琳娜还对2017年春夏季在远东四个地区1100多位居民进行的社会学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在整个吸引力方面还没有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的排名和知名度正在稳步上升。滨海边疆区居民认为中国是发展经济合作的优先伙伴,而萨哈林、马加丹和堪察加居民则优先考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和日本。^②布利亚赫尔和格里戈里切夫(Л.Е. Бляхер, К.В. Григоричев)使用1998至2013年对中俄边境和俄偏远地区居民的非正式访谈,以及研究中俄边境地区互动的著作所提供的材料,分析了“中国威胁论”是怎样从远东前哨地区产生,并逐渐扩散至政治中心乃至全俄罗斯的。^③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这一问题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普遍揭示了俄罗斯对华态度在总体友好背景下的矛盾性,以及美国因素和远东问题对于塑造俄精英对华态度的影响。相关研究为我们了解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提供了有益帮助,但也存在不足。首先是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多数研究只涉及个别时期,以及个别群体(例如专家或政治家等精英阶层,或者远东地区居民)对中俄关系中的某些层面(如敌友关系)或特定问题(如远东问题)的认知,缺乏长时段里俄罗斯社会对双边关系的认知特征及其演进的系统分析。而只有长时段、系统性地分析,才有助于客观、全面了解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思维框架与角色定位,厘清其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以及推动观念变化的影响因素。其次,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已有成果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文献或文本分析法,即从著作或媒体信息中摘录文字,以刻画特定群体,特别是专家学者和政治家的观点,但是这些精英的观念被全社会接受的程度,以及不同时期主流认知的形成与变化,往往不得而

① 拉琳娜:“公众舆论认知中的现代中国和俄罗斯——中俄关系:太平洋沿岸俄罗斯居民的观点”。

②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2017 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18. №2. С.5-33.

③ Бляхер Л.Е., Григоричев К.В. Вглядываясь в зеркала: смыслов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браза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циуме// Полития. Анализ. Хроника. Прогноз. 2015. №.1 (76). С.24-38.

知。笔者认为，尽管领袖和精英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是研究社会民众的观念与认知仍有意义，因为没有任何精英和领袖在制定政策时不需要考虑民意的支持。截至目前，从民众视角出发的研究多聚焦于远东居民，但他们无法代表其他地区居民的态度。拉林和拉琳娜就承认，尽管远东地区居民的调查数据显示对华认知出现了很大改善，但这一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及其他地区，唯有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才能提供确切证据。^①最后，对影响和推动涉华认知形成与演进的因素缺少系统、严谨的分析。

本文主要以俄罗斯权威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全国性调查为依据，系统考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关系的认知及其结构特征，厘清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与特点，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于影响认知形成与演进的基础性因素进行分析。

二、“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民意调查纵览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ВЦИОМ，以下简称“全俄中心”）是俄罗斯历史悠久和知名的社会舆情调查机构。1987年12月，该中心成立并设在苏联劳动部，1998年重新登记为国有独资企业，1999年获研究机构地位，2003年改组为开放式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100%国有。目前其管理机构是董事会，成员是来自俄罗斯劳动和社会发展部、财产关系部以及总统办公厅的代表。总经理根据“研究和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对中心活动实施直接领导，中心工作人员均有博士学位。自1990年以来，该中心已进行了1000多轮具有全俄代表性的社会调查，是俄罗斯领先的民调机构。尽管因政府背景其调查数据（特别是对俄政府和政治家的支持率）的真实性有时会受到质疑，但该中心的调查数据仍被广泛采信，是涉俄民意实证研究的重要资源之一。

“全俄中心”主要针对俄国内事务开展调查研究，有时也会发起针对中国的问卷调查。有关中国和中俄关系认知的调查，对俄而言政治敏感度较低，数据的真实性会相对更高。另外，因其政府背景及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定位，

^①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2017 г.).

该中心的涉华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俄知识和政治精英针对中国问题的思维特性。因此，对“全俄中心”涉华调查的框架体系与调查结果进行研究，不仅能使我们了解俄罗斯的民意基础，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探究俄精英阶层对于我国的角色定位和战略思考，进而对于把握俄对华政策方向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俄罗斯另外两家知名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Левада-Центр）和“社会舆论基金”（ФОМ）也有涉华调查，但无论在调查次数、调查持续的时间跨度，还是议题广度等方面，“全俄中心”均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全俄中心”的调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在必要时参考“列瓦达中心”和“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数据进行补充论证。

“全俄中心”在其官网公开的涉及中国、中俄关系的调查数据库有两个：一个是“Архивариус”，包含的社会调查时间范围从1992年至2017年5月29日；第二个是“Спутник”，涵盖的时间范围是2017至2018年。我们在这两个数据库中针对调查问题输入关键词“中国”（Китай*）进行检索，共获得32次专门针对中国的有效调查，涉及的问题有74个。议题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对中俄关系的看法；二是对两国的改革成效与国际影响力进行比较评价；三是对中国文化符号、历史和世界影响力的认知和评价（表1）。

表1 “全俄中心”涉华调查概览

轮次	调查时间	调查问题
1.	1998.2.15	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
2.	1999.10.30	叶利钦访华成果
3.	2000.9.30	普京访华成果
4.	2001.7.15	(1) 21世纪的敌友关系；(2) 中国参与远东开发
5.	2005.4.28	最现实的威胁：中国等异族定居俄罗斯
6.	2005.7.28	(1) 今天是敌是友；(2) 21世纪是敌是友
7.	2005.8.14	中国领导人是谁
8.	2006.4.7	(1) 对华供应天然气是否符合国家利益；(2) 燃气管道建设的环保问题；(3) 今天是敌是友
9.	2006.11.30	最现实的威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及东南部国家的战争
10.	2007.4.8	(1) 今天是敌是友；(2) 21世纪是敌是友；(3) 远东开发中利用中国劳动力
11.	2007.8.26	(1) 最现实的威胁：与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战争；(2) 是否购买中国商品；(3) 购买中国商品的原因；(4) 中国商品是否符合消费者安全要求；(5) 关于中国产品使用危险材料的看法；

		(6) 对中国商品质量的看法; (7) 买中国商品是因为价格低廉; (8) 是否知道俄罗斯公司雇佣中国劳动力; (9) 使用中国雇工会导致当地居民失业; (10) 使用中国雇工会恶化犯罪状况; (11) 使用中国雇工可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 (12) 使用中国雇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13) 中国之于俄罗斯首要的角色
12.	2008.4.6	最现实的威胁: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及东南部国家的战争
13.	2009.6.7	(1) 今天是敌是友; (2) 21 世纪是敌是友
14.	2009.6.28	最现实的威胁: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及东南部国家的战争
15.	2009.8.23	中国对二战的贡献如何
16.	2009.9.27	(1) 中俄世界影响力比较; (2) 中俄生活水平比较; (3) 中俄不同改革道路比较
17.	2010.4.24	中国人对二战的贡献如何
18.	2011.2.13	(1) 居住地有无中国人; (2) 居住地中国人的活跃性如何
19.	2011.4.3	是否同意中国长城是太空中唯一肉眼可见的物体
20.	2012.2.12	最现实的威胁: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南部及东南部国家的战争
21.	2013.6.16	最现实的威胁: 中国等异族定居俄罗斯
22.	2014.5.11	(1) 中俄是否为兄弟关系; (2) 能否将中日韩三国人区分开; (3) 熟人中是否有中国人; (4) 邻居中是否有中国人; (5) 工作同事中是否有中国人; (6) 亲属中是否有中国人; (7) 街道上能否遇到中国人; (8) 是否同意中国人以旅游者身份访俄; (9) 与中国人同去商业中心和电影院; (10) 与中国人同住一个街道和住宅; (11) 中国人成为自己的医生; (12) 中国人成为领导上司; (13) 中国人成为家庭成员
23.	2014.9.14	是否会中文
24.	2014.10.19	(1) 今天是敌是友; (2) 21 世纪是敌是友; (3) 在乌克兰冲突中, 中国支持西方还是俄罗斯; (4) 中国能否代替西方经济伙伴; (5) 是否庆祝中国新年
25.	2014.11.30	中国人与俄罗斯人的文化接近度
26.	2015.2.7	(1) 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集团对世界的影响力; (2) 对金砖国家集团的评价
27.	2015.10.4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程度
28.	2015.10.25	(1) 是否同意中国利用“转向东方”提升自身影响力; (2) 是否应将汉语作为必修课
29.	2016.5.15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程度
30.	2016.6.12	中国对二战的贡献如何
31.	2017.1.29	(1) 今天是敌是友; (2) 21 世纪是敌是友; (3) 对中国在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地区部署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看法
32.	2018.10.28	是否庆祝中国新年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全俄中心”公开的最早一次涉华调查是在 1998 年 2 月 15 日进行的,

最近的一次是在 2018 年 10 月 28 日，这期间，除了 2002-2004 年，其余年份都会在全俄范围内的社会调查中专门设置中国议题。通常每年只进行一次涉华调查，但 2009 和 2014 年是两个特殊年份，各开展了四次涉华调查，是频次最高的两个年份，显示这两个时间点中国话题在俄引发热议。1992-2018 年间共开展了 32 次专门的涉华调查，每次调查通常设置 1-3 个问题，但有两次（2007 年 8 月和 2014 年 5 月）各设置了 13 个问题，2014 年 10 月的调查也设置了 5 个问题。年度调查频次高低以及每次调查问题数量的多寡，折射出特定时间段里俄精英对中国话题的重视程度，以及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以此为基础计算出关注度指数^①，用以量化考核在特定时间节点上，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话题的关注度及随时间发生的动态变化（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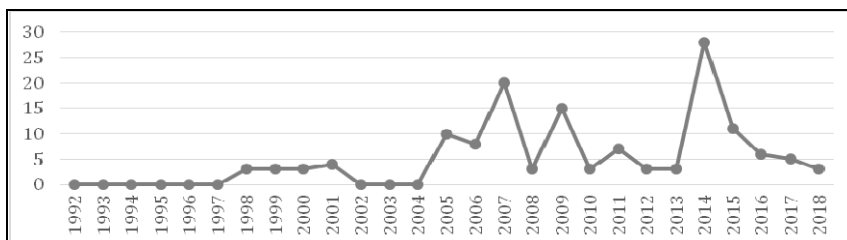


图 1 俄罗斯对华议题关注度及其演变（1992-2018 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计算。

图 1 显示，俄罗斯独立 30 年来，其社会对中国话题的关注度出现了三个高点，分别是 2007、2009 和 2014 年。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4 年西方制裁这两次大的外生冲击，引发了俄罗斯人对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②，并

① 关注度指数用以定量刻画特定年份中国议题在俄罗斯受到的关注程度。特定年份的关注度指数计算公式为： Y_i (i 年度关注度指数) = N_i (i 年调查次数*2) + Q_i (i 年调查问题个数)， $i=1992-2018$ 。

② 2009 年在一般性的敌友关系之外，特别提出了三个调查问题：（1）中俄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比较；（2）中俄的生活水平比较；（3）中俄不同改革道路的比较。显示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受到严重冲击的背景下，俄精英对于中国经济以及改革方式和成效问题给予了特殊关注。2014 年在一般性问题之外，特殊调查了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对中国人的态度，此外还专门就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和角色设定了调查问题：在乌克兰冲突中，中国支持西方还是俄罗斯？中国能否代替西方经济伙伴？显然，乌克兰危机和俄西关系恶化，不仅促使俄罗斯精英关注中国的站位问题，而且在两国政治接近的趋势下，还试图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一步探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态度。

且后者的冲击力要显著高于前者。此外，2005-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话题（敌友关系、中国威胁和经济议题）已经成为俄精英们关注的热点，三年间共进行了7次调查并提出了24个研究问题。据此，可以将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过程大致划分为4个阶段：（1）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调研机构对于居民的俄中关系认知问题，总体上是忽视的，直至1998年才开展了第一次涉华调查，而且只是跟踪国家领导人访问这一热点，调查民众对发展双边经济关系的看法。（2）进入21世纪，伴随着两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期以及经济互动增多，俄罗斯社会开始逐渐关注中国，双方的敌友关系以及中国参与远东开发问题，成为早期研究的重点。2005-2007年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加速，“中国威胁论”以及中国之于俄罗斯的经济角色成为热议的话题。（3）第三个时期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经济遭遇重创，短暂恢复后又陷入停滞，中国则在主要国家陷入衰退和停滞的背景下保持快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话题引发了更多关注，中俄两国转型与发展模式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比较进入研究视野。（4）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在这一大背景的推动下，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的关注上升到了新高度，并且出现了诸多新的研究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特征及其与俄罗斯的差异、中国在俄西之间的站队，以及中国能否取代西方之于俄罗斯的角色等。

可见，俄罗斯社会对华关注度与关注议题的演进，与俄对外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密切相关。2005-2007年，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俄社会开始对中国经济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2009年受外生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俄罗斯再次提升了对中国的兴趣，但究其实质，还是由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所引致；2014年，在中国相对实力并无明显变化的前提下，中国话题再度引发热议，则主要源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极度恶化。

三、俄罗斯社会对中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看法

梳理“全俄中心”的涉华调查可以看到，俄罗斯精英们关注的中俄双边关系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对华角色定位、对“中国威胁”的感知，以及

对双边经济关系（包括一些具体合作问题）的态度。“全俄中心”开展的问卷调查如无特殊说明，是在俄罗斯 46 个州（以及边疆区和共和国）的 153 个居民点进行的，样本为 1600 人，统计误差不超过 3.4%。下面根据“全俄中心”有关双边关系的调查问题、选项设置以及数据结果，对俄罗斯社会如何看待中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对华角色定位

自 2001 年起，“全俄中心”在全俄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专门设置了关于中俄敌友关系的问题^①，其后于 2005、2007、2009、2014 和 2017 年持续进行了调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数据系列（图 2），我们据此可以研究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角色定位及随时间发生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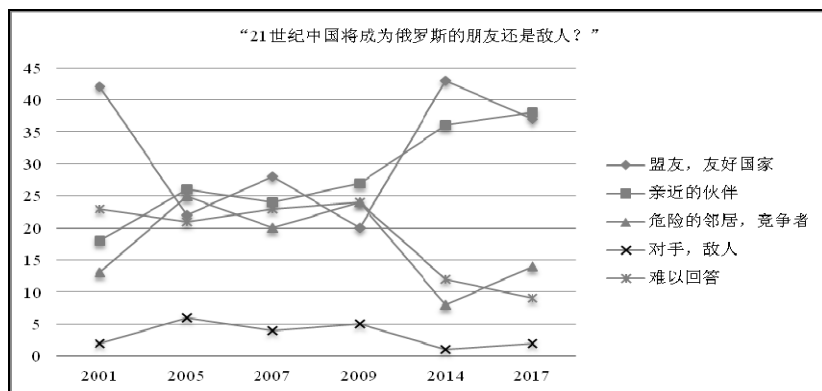


图 2 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角色的定位及其演变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调查显示，2001 年认为中国是“盟友”或“朋友”的受访者占比为 42%，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占 13%，“敌人”占 2%。^②这表明在 21 世纪初，

① 具体包括两个调查问题：“21 世纪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朋友还是敌人？”，以及“当下中国之于俄罗斯的角色？”由于两个问题得到的调查数据呈现了相同的趋势，为节约篇幅，这里仅汇报第一个问题的调查结果。

② 2001 年调查设置的答案选项与其他年份不尽相同。为进行时间动态比较，这里将 2001 年选项作如下处理：将选项“朋友”和“盟友”加总，归入“盟友与友好国家”；将选项“危险的邻居”归入“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将选项“敌人”归入“对手与敌人”；将选项“非盟友，非反对者”归入“亲近的伙伴”。此外，2001 年没有设置“难以回答”选项，为进行时间纵向比较，我们将 2005、2007 和 2009 年选择“难以回答”选项的数值取平均值，作为 2001 年的对应数值，再将其他选项作同比例调整。

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对两国关系的评价比较积极，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人（15%）对中国抱有敌意。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奉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相对忽视，涉华舆论调查也很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对华友好的民意氛围，与此同时，对于人口稠密且实力日益增长的中国也心存疑虑^①，这种对华认知的矛盾性也延续到了21世纪初。

四年之后，到2005年7月，俄罗斯人对中国角色的定位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消极趋势：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从13%增加到25%，“敌人”的比重也从2%大幅升至6%，而认为中国是“盟友与朋友”的比重则大幅下降（从42%下降至22%）。2005-2009年间对中国角色的认知相对稳定，“盟友与友好国家”“亲近的伙伴”“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这三种角色的支持者数量比较接近，平均各占1/4左右，并且交替占上风。“敌人”的定位则处于边缘地位，仅占5%左右。另外还有相当大比例（1/5-1/4）的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这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尽管整体对华友好，但在对华具体角色定位问题上尚未形成主导意见，以至于相当多的人态度模糊。21世纪前十年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伴随中国经济崛起，俄罗斯人对中俄关系的负面认知明显增强，这一时期“威胁论”（将中国看成是“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乃至“敌人”）的感知处于最高水平（平均占30%左右）。

2014年成为一个分水岭，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出现了显著改善。当年10月的调查显示，竞争和敌对情绪显著下降（从2009年的29%骤降至2014年的9%），亲华倾向（“盟友与友好国家”和“亲近的伙伴”）骤升（从47%至79%），持模糊立场的减少了一半（从24%至12%）。显然，乌克兰危机及其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是一个有效的外部冲击，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意识得以形成。^②

① 参见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282页。

② 乌克兰危机推动俄罗斯居民对华友好态度提升的可能机制包括：第一，在与西方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有效平衡者的潜力上升；第二，中国在俄西关系恶化后采取的友好政策：并未参与制裁，还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对俄罗斯进行支持（例如，达成巨额能源交易，提供金融支持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的变化趋势。2017年，尽管亲华的总体格局未变，但“盟友与友好国家”的支持率显著下降（从2014年的43%下降至37%），而“危险的邻居与竞争者”的支持率则显著上升（从8%至14%）。这只是偶然的波动，抑或反映了一种趋向性？“全俄中心”官网上并无针对同一问题的最新调查数据公布，这里只能结合其他资料进行考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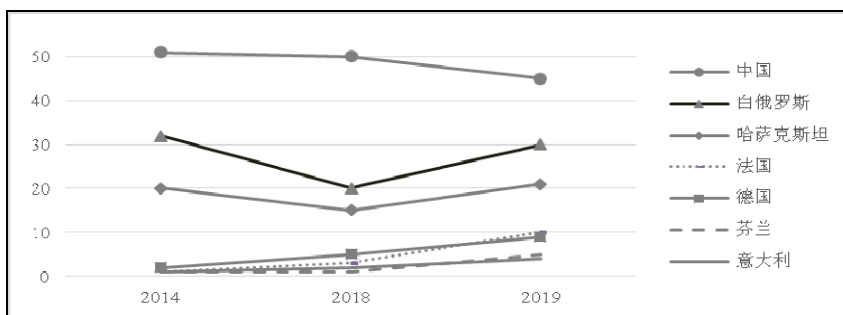


图3 当前我国与哪些国家形成了最牢固的友好关系 (%)

数据来源：Друзья и враги//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28 Октября 2019. №.4089.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9971>

图3显示的是“全俄中心”对于最友好国家的开放式调查结果。自2014年起，中国在友好国家排名中始终占据第一位，甚至比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得分还高15%至35%。但是2019年中国得分显著下降（从50%降至45%），而同期多国得分上升：白俄罗斯上升10%，哈萨克斯坦上升6%，法国上升7%，德国上升4%，芬兰上升4%，意大利上升2%。换言之，对华友好评价的下降，发生在对他国，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评价普遍得到改善的背景下。^①

另一家比较权威的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数据，也证实了类似的动向。就“现在您总体上如何看待中国”这一问题，选择“积极评价”的比率在2017年3月为76%，2018年1月下降至69%，2020年1月进一步降至65%，三年间下降了11%。与此同时，对美国的积极评价从2019年2月

① “全俄中心”关于敌对国家的认知调查，也揭示出俄罗斯人对西方国家态度近两年出现了改善趋势：对“当下我国与哪些国家形成了最紧张的敌对关系？”这一问题，2019年选择美国的比例较上年下降了8%，英国下降了8%，德国下降了5%，法国下降了3%。

的34%升至2020年1月的42%，对欧盟的积极评价从42%升至49%。^①

（二）“中国威胁论”

前面的分析显示，尽管总体上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关系以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偏友好，但是“威胁论”也始终挥之不去，全球金融危机前后的高峰时期甚至达到30%的认同率，2014年后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到2017年认为中国是“危险的邻居”与“敌人”的占比依然有16%。

“全俄中心”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也有一些专门调查。其一是在对国家面临的“最现实威胁”的调查中，将中国列入备选答案之中，包括（1）外族人（中国人，越南人等）定居到俄罗斯；（2）与南部以及东南部国家（中国、日本、朝鲜等）的战争。从问题和选项设置可以看出，移民定居和军事冲突是俄精英们最为关注的两种“威胁”。表2显示，比较而言，俄罗斯社会对于中俄两国不会爆发战争抱有较强的信心，并且这一态度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有较大增长。中国移民的定居，在俄罗斯人眼中显然是“更现实的威胁”，2005年58%的受访者认为这是“完全现实”的威胁。八年之后，移民威胁论大幅减弱，但仍有超过1/3的人认为是“完全现实”的，另有1/3的受访者认为，尽管可能性低，但移民威胁仍旧存在。甚至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大力推进“转向东方”并加强与中国合作的背景下，移民问题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要关切之一。2015年10月24-25日“全俄中心”关于“转向东方”的专项调查发现，尽管60%的受访者支持中俄合作，但仍有高达61%的受访者担心“转向东方”会导致中国移民大量涌入。^②

表2 对于俄罗斯而言，哪个是更现实的威胁

	中国人到俄罗斯定居		与中国发生战争				
	2005	2013	2006	2007	2008	2009	2012
完全现实	58	35	12	10	12	10	5
可能，但很低的可能性	27	33	37	29	28	28	20
实际上不现实	13	25	45	50	47	50	65
难以回答	2	7	6	11	13	11	1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99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① 数据来源：列瓦达中心，<https://www.levada.ru/indikatory/otnoshenie-k-stranam/>

②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всерьез? и...надолго?!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204>

其二，“全俄中心”还在 2015 和 2016 年就“中国威胁”的感知程度直接设置成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否认存在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仍有 1/3 的受访者肯定存在某种威胁（表 3）。

表 3 中国对于俄罗斯的威胁有多大^①

	2015	2016
非常严重的威胁	6	7
不大不小的威胁	11	13
低威胁	18	16
没有任何威胁	60	56
难以回答	4	8
总计	99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三）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

纵观“全俄中心”的涉华调查，经济议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中心最早于 1998 年开展的涉华调查就是针对双边经济关系设题的，此后围绕中俄经济合作展开了更为广泛的研究。这里先考察俄罗斯社会对于双边经济关系的一般性认知，后面再对具体合作问题进行分析。

1998 年 2 月中国国家主席访俄前夕，“全俄中心”就对华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调查，这也是该中心最早的一次专门涉华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4），不足 30% 的受访者认为对华经济关系对于俄罗斯而言“很重要”，一般性“重要”为 44%，“不很重要”甚至“毫无意义”的占 27%。尽管总体上肯定对华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但超过 1/4 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这反映出当时俄罗斯社会在“整体上亲西方的倾向”^②之下，对于发展对华经贸合作的忽视，以及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缺乏预见。“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也证实，1998-1999 年间，认为应首先加强与西欧经济政治关系的俄罗斯人占 24%，将美国和加拿大放到最优先地位的占 13%，而认为应将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作为俄罗斯对外关系优先选项的仅占 14%。^③

① 2015 年的调查选项与 2016 年的不一致，这里将 2015 年的“极端高威胁”（1%）和“高威胁”（5%）合并为“非常严重的威胁”（6%）。

② 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 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第 287 页。

③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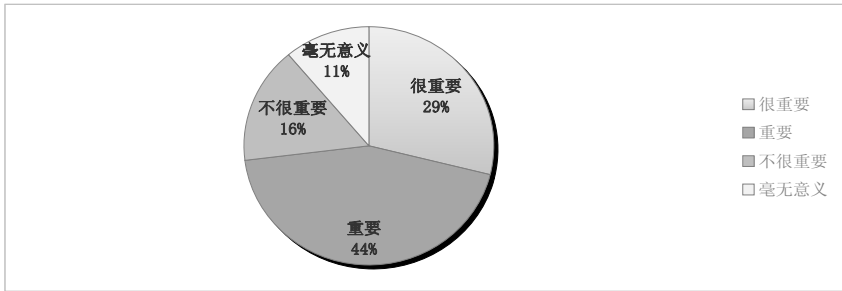


图 4 现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于俄罗斯而言有多重要(1998/2/1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势头明显，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经济潜力仍缺乏恰当的认知。2007 年 8 月 26 日的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针对中国的经济定位，压倒性的主张是成为俄罗斯“廉价的日用品的供应者”（74%），或者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者”（43%），而对于中国向俄方提供资金和技术的可能性，问卷设计者根本未予考虑。相反，研究者设置了一个“俄罗斯高科技产品的销售市场”选项，尽管受访者认为这一可能性很小（仅占 8%）。此外，对于中国成为能源市场的潜力也极度缺乏前瞻性，仅有 5%的受访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图 5）。^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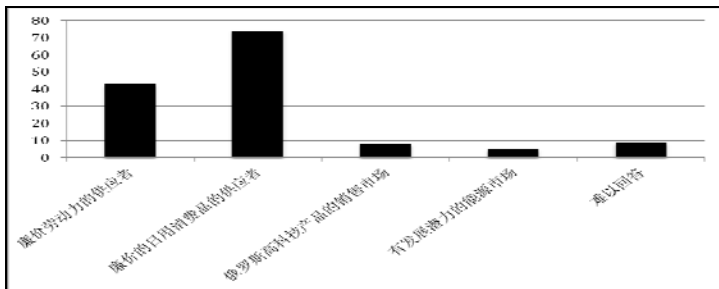


图 5 中国之于俄罗斯，首要的经济定位是什么 (2007/08/26)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① 美国皮尤中心的调查也显示，全球金融危机前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实力严重低估：2008 年只有 12%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领袖，而对美、日、欧的支持率则为 32%、25%和 17%；但仅过了一年，到了 2009 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支持率就变为最高（26%），对美、日、欧的支持率则下降为 17%、22%和 12%。转引自 Anastasia Solomentsev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Russia: A Source of Threats or New Opportunities?” *Connections*, 2014, Vol.14, No.1, p.30.

到了 2014 年，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经济角色的看法发生了逆转。图 6 反映的是 2014 年 10 月对于中国在经济上替代西方可能性的看法。^①有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认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将使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关系破裂的后果（包括 24% 的人认为将完全取代，50% 认为将部分取代），持相反观点的仅占 16%。“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也显示，在西方与中国之间，更多的俄罗斯人倾向于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见表 4），这与“西方优先”的传统意识形成了明显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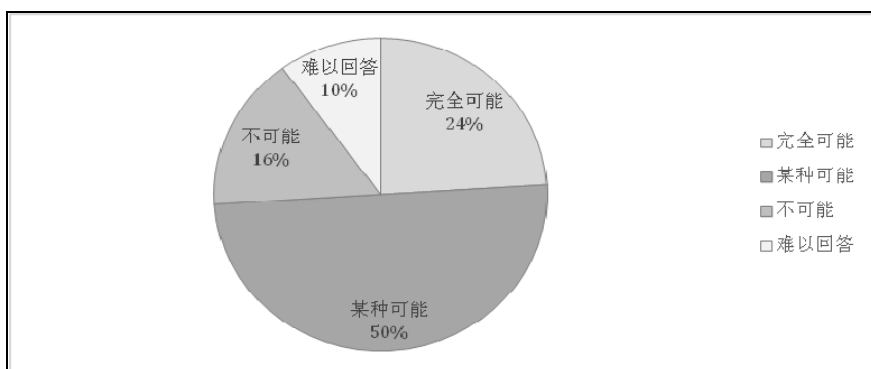


图 6 对俄罗斯而言，中国能否取代西方经济伙伴（2014/10/19）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表 4 对俄而言，更重要的是加强与西方还是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2014.5.31-6.1	2015.4.25-26	2018.6.30-7.17
西方国家	10	19	20
中国	27	32	30
应当两者兼顾	50	35	29
难以回答	13	14	2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社会舆论基金”的官网资料整理。

（四）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的认知

除了对华经济关系的一般性问题，“全俄中心”还就特定领域的合作进

^① 设置的问题是：由于相互制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部分经济联系中断了。您认为，中国能否取代西方成为俄罗斯的经济伙伴？

行研究，其中，最早（2001 年）关注的是中国参与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发，2007 年再次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

2001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5 第 2 列），7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公司和劳动者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是“危险”的，而认为“有益”的仅占 30%。这表明，21 世纪初期，尽管多数俄罗斯人支持发展对华经济关系（见图 4），但并不包含远东开发合作。

2007 年 4 月，“威胁论”仍旧占据主导地位（62%，见表 5 第 3 列）。考虑到 2007 年设置的第三个选项“难以回答”分离了一部分问卷回答，因此与 2001 年相比，“危险”的认知比例几乎没有减少，中国企业和劳动者在远东的存在，成为“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内容。

“全俄中心”网站上公开的远东问题调查，只有 2001 和 2007 年这两次，我们无法据此判断最近情况是否发生了改变。所幸的是，2014 年 5 月底“社会舆论基金”进行了类似的调查：“现在正在讨论扩大中国企业在远东开发中的参与度问题。您认为这会给远东带来更多利益、更多损害，还是损益各半？”结果显示（见表 5 第 3-4 列），持肯定态度的仅占 1/4，而认为损害至少与收益一样多，甚至大于收益的则超过了 1/3，并且，近 40%的人表示对此问题“难以回答”，成为最大的选项。

表 5 对中国公司和劳动者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态度（%）

	2001/07/15	2007/04/08	2014/05/31-06/01	
有益	30	16	更多受益	27
危险	70	62	损益各半	16
难以回答	—	22*	更多损害	19
总计	100	100	难以回答	38

注：*其中包括“难以回答”21%，没有回答 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和“社会舆论基金”的官网资料整理。

（五）对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看法

2006 年 3 月普京访问中国期间，两国签署了建设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的协议。“全俄中心”于同年 4 月 7 日的调查中特意为此设置了问题：“该管道穿越阿尔泰保护区。阿尔泰居民和环保主义者对此表示反对，说建设将破坏阿尔泰的自然环境。您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表 6 第 1 列），支持

管道建设，认为经济好处超过对阿尔泰地区造成自然损害的受访者仅仅占到8%，最大的选项（44%）认为不应该经过保护区，另有42%的受访者认为铺设管道时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对自然的损害。这个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不愿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利益。在对俄经济合作中，环保问题将始终是俄方的核心关切之一，我们对此必须予以重视。

表6 对于中俄天然气合作的观点（%）

2006/04/07（“全俄中心”）	2014/05/31-06/01（“社会舆论基金”）		
问：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管道穿越阿尔泰保护区。您的观点？	问：普京签署了数十亿的供气合同。这符合俄罗斯利益吗？	问：您对签署从俄罗斯到中国的长期供应天然气协定有何看法？	问：您认为本合同对俄罗斯还是中国更有利？
A. 经济好处超过了对这一地区自然的损害(8)	A. 是，因为给预算带来更多收入(37)	A. 好(70)	A. 对俄罗斯更有利(13)
B. 建设中应采取措施降低对自然的损害(42)	B. 是，因为巩固了与中国的联盟关系(18)	B. 不好(11)	B. 同样有利(61)
C. 管道建设不应该经过保护区(44)	C. 不，因为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7)	C. 难以回答(19)	C. 对中国更有利(19)
D. 难以回答(6)	D. 不，因为这浪费了俄罗斯的战略天然气储备(30)	总计(100)	D. 难以回答(7)
总计(100)	E. 难以回答(8)		总计(100)
	总计(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和“社会舆论基金”的官网资料整理。

尽管环保是重大关切，但总体而言，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符合俄国家利益这一看法居主流地位，其中37%认为有利于提高预算收入，18%认为巩固了与中国的联盟关系。但也有近40%的受访者持否定态度，原因是“浪费了战略天然气储备”（占30%），以及“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7%，见表6第2列）。后一选项尽管得到的支持很少，但选项设置直观地显示，在研究者看来，向中国供应天然气进而“极大地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被认为不符合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否助力中国崛起，是俄精英们考虑双边经济合作的核心关切之一。即便在西方围堵、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之时，这

种考虑也未曾消失。以 2015 年 10 月 25 日“全俄中心”就““转向东方”做的专项调查为例，专家们直接提出了问题：“由于俄罗斯转向东方，中国是否有可能在最近 5-10 年利用俄罗斯提升自己在世界的影响力？”结果显示，53%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否定的占 36%。^①

2014 年 5 月，在西方国家发动对俄经济制裁后，中俄两国签署了总价值达 4000 亿美元的天然气供应协议。“社会舆论基金”的调查显示（表 6 第 3 列），70%的受访者认为天然气合作是“好的”，这比 2006 年肯定合作符合俄国家利益的人数（55%）提高了 15 个百分点。

除了总体评价，“社会舆论基金”还就天然气合作的利益分配，调查了受访者的看法。结果显示，六成的居民认为对两国而言这是互利共赢的合作（表 6 第 4 列），这表明 2014 年后俄罗斯社会看待中俄天然气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设置议题时，俄专家就中俄天然气合作问题，不单纯关注“绝对获益”一个维度，“相对收益”也是重要考量。事实上，利益分配一直是“全俄中心”重视的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持续调查。结果显示，在很长时间里，多数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从双边合作中获益更多，只是到了 2014 年，获益同样多的共赢心态才成为主流（表 7）。

表 7 谁从中俄经济合作中获益更多（%）

	2005	2009	2014
中国	53	40	22
俄罗斯	8	7	10
一样多	25	37	60
难以回答	14	16	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六）对中国商品和劳工的评价

2007 年 8 月，“全俄中心”针对中国商品和劳工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表 8 中的数字显示，俄罗斯社会对于中国商品非常不信任，评价很低，认为中国商品不安全、质量差，仅仅在价格上有优势。这种负面评价成为压倒性的看法，占到了受访者的 60-80%。俄罗斯人对中国商品形成的极为消极的

^①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всерьез? и...надолго?!

评价模式，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两国政府对于双边贸易尤其是边境贸易缺乏监管，大量假冒伪劣商品从中国流入俄罗斯市场（特别是远东边境地区），有直接的关系。不幸的是，早期双边经贸关系的混乱带来了长期不良影响，直到 2015 年 10 月，仍有 64% 的受访者担心中国劣质商品流入俄罗斯。^①

表 8 关于中国商品的看法（2007/08/26）

%	通常符合消费者安全要求	危险，因为用有害材料制成	质量低（不耐用且易损坏）	购买是因为便宜
同意	13	60	80	86
不同意	68	17	9	5
难以回答	19	23	11	9
总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对于中国雇工的社会影响问题，多数受访者持消极态度，比如导致当地居民失业增多（58%），以及犯罪形势恶化（50%）。而对中国劳工之于俄罗斯经济的积极作用，肯定态度则不占优势，40%认为弥补了俄罗斯劳动力短缺，但大体相当（38%）的受访者却不同意这一观点。并且近一半的受访者（46%）否认中国劳工使俄罗斯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 28% 的人认为带来了效率提升（表 9）。

与对中国商品的不良观感一致，对中国劳动移民的负面认知也发挥了持续影响，尽管这被知名汉学家马斯洛夫称为“完全错误的刻板印象”，但到 2015 年 10 月，仍有 61% 的受访者担心中国移民涌入俄罗斯。^②

表 9 使用中国雇工带来的后果（2007/08/26）

%	导致当地居民的失业增多	导致犯罪形势恶化	弥补俄罗斯劳动力短缺	带来俄罗斯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升
同意	58	50	40	28
不同意	26	29	38	46
难以回答	16	21	22	26
总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① Разворот на Восток: всерьез? и...надолго?!

② Там же.

四、影响俄罗斯社会对华角色定位的因素分析

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以及对华角色的定位，根本上是对于现实的映射，既受宏观因素影响，同时个体的认知模式、以及个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宏观因素

前文第二部分的研究显示，俄罗斯社会的对华关注度与俄对外关系状况、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密切相关。事实上，这两个宏观变量在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的形成和演进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传统上，俄罗斯人一直将西方作为对外政策的重点，这既是由西方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进而对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产生关键影响所决定，同时也与地缘、历史文化乃至俄精英的西方情结有关。当俄西关系进展顺利，俄罗斯较为容易从西方获得现代化的资源时，发展与非西方国家合作的紧迫性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与西方合作的道路受阻，则转向“东方”以谋求对西方某种程度的替代，就会成为自然的选择。回顾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关系的认知演进过程，可以发现，俄西关系的状况发挥着实质性的约束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俄罗斯国家地位发生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俄中关系改善的一个原因在于，俄精英们将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视为打“中国牌”，以对抗美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①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增长时期，俄相对忽视对华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时的俄西关系状况决定的，因为俄罗斯一度将西方（主要是西欧）作为转型的样板和现代化来源，能源出口也主要面向欧洲。在这种导向之下，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成就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潜力认识不足，这些观念意识制约了对华关系发展。乌克兰危机则以极端方式改变了俄西关系，特别是经济制裁，很大程度上关闭了俄罗斯面向西方合作的大门。正是源于这一外部条件的根本改变，对华政治友好并认同对华经济合作，才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导观念，并最终促使俄从政策和实践上“转向东方”。

^① 有关美国因素在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形成中的作用，参见 Paradorn Rangsimaporn, “Russian Elite Perceptions of the Russo-Chi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996-2001)”.

第二，中国自身实力状况及其演进。这一因素可能带来相反方向的影响。一方面，不断崛起的中国可以作为俄罗斯在全球舞台上至关重要的战略盟友，还可以为俄提供多元的资金技术和市场选择。而且中国的经济模式也会为俄当局树立榜样^①，这些都会提高对华合作的倾向性。另一方面，给定中俄两国复杂互动的历史，中国实力的相对上升，也会使俄罗斯社会感受到更大的发展与安全压力，从而降低对华合作的积极性。换言之，中国崛起会带来相互矛盾的两种影响：如果国家安全的考量占上风，则伴随中国崛起，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认知有可能恶化；如果中国经济的不可替代性增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华友好倾向就会增强。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前，中俄经济合作相对滞后，特别是俄方对于两国能源合作持消极态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当时俄西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人将安全关切置于经济利益之上。而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以及两国合作迅速改善，则在于西方经济来源中断后，中国经济援助的不可替代性极大增强。

第三个因素是中俄在现实中的互动，尤其是中国的对俄政策。我国的对外政策实践是俄罗斯人判定我们是敌是友、是否对其国家利益带来损害的最直接因素。2014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极大改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外交政策增强了俄罗斯人的信任和期待。“全俄中心”2014年10月19日的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在俄西冲突中更支持俄罗斯，认为中国持中立立场的有34%，而认为中国支持西方的仅有2%。^②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这份“信心”，可以很容易以我国的外交行动来解释：在西方宣布对俄实施制裁两个月后，2014年5月21日，中俄两国签署了总价值400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作大单；10月，两国央行签署了为期三年的1500亿人民币与卢布的互换协议；此后，中国又通过主权财富基金、国有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等渠道，向俄罗斯注入了大量资金。反事实推理也可以揭示中国行动支持的重要性：如果当时中国站到西方阵营对俄实施联合制裁，而不是提供帮助，

① 参见索洛门采娃对于中国崛起的影响分析，Anastasia Solomentseva,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Eyes of Russia: A Source of Threats or New Opportunities?”

②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社会的立场是，多数人（53%）选择中立，而不是支持任何一方。参见“全俄中心”2017年1月28-29日进行的调查，Россия-Китай-США: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треугольнике。 <https://wciom.ru/index.php?id=236&uid=525>

那么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角色认知有可能出现显著改善吗？当然，我们的站位选择进一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应另当别论。这里只是强调，现实中我们的对俄政策，会实质影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态度。

最后一个宏观因素是两国的历史遗产，这是发挥持久影响的深层原因。尽管中俄两国从国家层面上解决了领土和划界问题，双方均无对对方的领土要求，但民间的异议却不曾消失。最早研究俄罗斯社会对双边关系看法的文献，就聚焦于两国人民对边界与边界形成史的不同理解，认为边界问题对于俄罗斯外交精英的对华政策主张产生着重要影响。^①在边界认知分歧的基础上，俄罗斯独立后又叠加着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尤其是远东毗邻的边境地区双方人口和经济失衡，这些萦绕俄罗斯人心头、长期挥之不去的安全担忧，是塑造“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②，它也决定了俄罗斯即便在西方围堵不得不“转向东方”时，也会对中国心存顾忌并有所防范。

在长期，以上四个因素也将对双边关系和相互认知发挥决定性影响。其中，作为常量的历史遗产，将在很长时间里发挥消极影响，并且较难改变。我国的对俄政策变量，相对而言自主性较强，但也受到中美关系与自我角色定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则是两个客观性变量，前者作为一阶约束条件存在，指的是俄罗斯“打中国牌”以平衡美欧的影响，后者发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关键取决于俄西关系这一外在环境的性质。

给定我国对俄友好的政策方向，中俄双边关系根本上取决于俄方如何定义自己的国家角色或“主要对手”。如果俄方确信反美仍旧是俄外交的第一要务，则中国作为强大盟友的潜力就有助于克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恐惧，两国的合作态势就能够延续。^③如果俄政策精英将日益崛起的中国设定为主要对手，则对华政策可能会大不相同。当然，鉴于俄罗斯与西方的结构性矛盾难以在短期内消失，俄中关系将处于俄西关系的从属地位，至少在中短期内中俄友好的舆情与政策大概率可能延续下去。

① A. Voskressenski, *The Difficult Border...*, pp.67-85.

② 有关远东问题与“中国威胁论”的关联，参见 Ларин 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оценке россиян. No.5/No.6.

③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重点，是恢复在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鉴于这一定位会带来美国的反对甚至打压，结果也会导向将美国设定为俄罗斯的首要威胁。相关论述参见 Vladimir Shlapentokh, “China in the Russian mind today: Ambivalence and defeatism”.

（二）微观因素

除了上述宏观因素，微观个体受限于自身的经历、阅历和价值观等因素，也会对中俄关系产生不同的看法。为了厘清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认知差异，并揭示哪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塑造个体态度产生了显著影响，这里利用“全俄中心”关于中国角色定位的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选取调查问题“今日的中国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和盟友、战略和经济伙伴、经济和政治竞争者、敌对国家和可能的敌人？”将后两个选项视为对华消极定位，并将这两个选项合并作为“威胁论”的代理指标，以分析哪些微观个体因素在威胁感知中发挥显著影响。为考察时间动态变化，我们选取 2007 和 2017 两个年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见表 10）。2007 年，全俄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将中国定位成“竞争者”或者“敌对国家”的受访者占比为 25%，2017 年则几乎下降了一半（为 14%），这意味着，“中国威胁论”在十年间急剧下降，俄罗斯社会的对华角色认知有了明显改善。

1. 政治倾向。数据显示，是否支持普京总统对于预测个体的对华态度是个显性指标。不支持普京的人有更强的对华消极认知，并且这一趋势十年来未曾改变。2007 年由“支持普京”到“不支持普京”，这一政治倾向的改变，会带来反华倾向提高 32%（25% VS. 33%），2017 年甚至提高 92%（13% VS. 25%）。这或许与普京被普遍认为奉行对华友好的外交政策有关。反普京的人倾向于反对普京的政策，包括外交与对华友好政策。

党派归属也会导致明显的态度差异，但三大党派拥护者的倾向性在时间上并不具有一致性。2007 年，俄共支持者中近 1/3 将中国看成竞争者或对手，比自民党和统俄党拥护者的反华概率高出 7-9 个百分点；但 2017 年只有 10% 的俄共支持者持消极立场，十年下降了近 70%，并且横向比较，俄共支持者在三大党派拥护者中的负面倾向也是最低的。2017 年，自民党拥护者的消极情绪（23%）显著高于统俄党（11%）和俄共（10%）支持者；而且自民党拥护者的对华负面倾向具有稳定性，十年间几乎没有变化，都在 1/4 左右。执政的统俄党拥护者比较亲华，这与是否支持总统普京的数据结果相同。

2. 年龄。2007 年，35-44 岁的受访者拥有更高的对华消极认知倾向，十年后 45-59 岁的人口反华倾向更高。事实上这是同一批人，即 1963-1972

年出生的人口。他们在青少年时期恰逢中苏两国关系紧张和边界冲突，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成长时期又经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思想上可能更为拥护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中国的体制缺乏信任甚至歧视。需要指出的是，与前述政治倾向以及其他指标相比，年龄差异带来的态度变化不甚明显，所以还需要更多的调查和更细致的研究，才能得到确切的答案。

表 10 对华消极定位的受访者占比及分布 (%)

		2007/4/8	2017/1/29
总计		25	14
1. 政治倾向			
支持总统	支持	25	13
	不支持	33	25
党派支持者	统一俄罗斯党	22	11
	俄罗斯共产党	31	10
	自由民主党	24	23
2. 年龄	18-24 岁	25	11
	25-34 岁	21	13
	35-44 岁	28	16
	45-59 岁	24	17
	60 岁以上	22	13
3. 教育背景	中等教育以下	21	27
	中等教育	25	13
	中等专业教育	26	11
	高等教育	22	16
4. 职业身份	商人，企业主	34	25
	无高等教育背景的职员	29	15
	国家公务员	24	8
	熟练劳动力（包括农业部门）	24	17
	非熟练劳动力（包括农业部门）	26	18
	军人和安全机构人员	41	17
	在读大学生	22	12
	退休人员	20	12
5. 经济地位			
消费能力	勉强维生	23	22
	有钱购买食物，但买衣物有困难	23	15
	有钱买食物和衣物，但购买耐用品有困难	26	13
	购买耐用品不困难，但很难购买贵重物品（如汽车）	21	9
	可以购买贵重物品，例如住房，别墅等	34	18*/28**

家庭物质状况	好和很好	26	13
	中等	23	12
	不好，很不好	25	23
按家庭人均收入分级 ***	1	22	15
	2	22	17
	3	23	15
	4	23	10
	5	-	14
6. 地域特征			
居住地人口规模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14	20
	50 万人口以上	32	8****/16** ***
	10 万-50 万人口	22	11
	人口少于 10 万	25	14
	农村	24	16
联邦区	中央区	20	14
	西北区	15	18
	南部区	20	19
	伏尔加区	28	11
	乌拉尔区	20	16
	西伯利亚区	36	9
	远东区	34	16
	北高加索区	-	12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计算。

注：*买车不困难，但无钱买住房和别墅；**几乎可以购买一切，包括住房、别墅；***2007 年按收入水平划分为四个等级；****百万人口；*****50-95 万人口。

3. 教育背景。2007 年，教育水平的差异并没有带来对华态度的显著不同。但 2017 年情况有所变化，中等教育以下的人群显示了比较明显的对华消极认知，这一群体的倾向性是平均水平的 2 倍（27% VS. 14%），并且是十年间唯一的消极情绪增强的群体（从 21%到 27%）。这部分群体更多是低收入弱势阶层，我们将在后面结合其他指标作进一步分析。

4. 职业身份。具有稳定高反华倾向的职业人群是商人和企业主，以及强力部门的职员。军人和强力部门职员以国家安全为业，容易夸大国家的安全威胁，在 2007 年“威胁论”盛行之际，成为最反华群体不足为怪。十年后这部分群体的反华情绪大幅下降（从 41%降至 17%），但仍高出平均水平 3 个百分点。商人和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追求自由竞争，对中国的体制不认可；

也可能是与中国企业有竞争和利益冲突，或者缘于反普京倾向而对中国持负面态度^①，并且在2017年超越安全部门成为最具负面倾向的群体（较比全社会平均水平高了近80%）。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务员较为亲华，特别是在2017年，只有8%的公务员将中国列为竞争者和对手。公务员更可能认同普京的执政政策，这与前面对政治倾向的分析结果也较为一致。

5. 经济地位和状况。无论从消费能力、对家庭物质状况的主观评价、以及收入层级（包括十等份收入分层，见图7）指标进行考察，结果都指向一个事实：两个极端的层级，即最富有和最贫穷阶层，都更倾向于对华消极定位，而中等偏上的阶层则相对具有亲华倾向。以消费能力为例，2007年最顶层富人拥有最高的反华倾向（34%），比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这一阶层到了2017年仍是最消极的群体，尽管比十年前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比全社会平均水平还是高了一倍（28% VS. 14%）。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的最底层人群原本在2007年相对不反华，但十年后转变成第二高负面倾向的阶层，比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这与教育水平的考察结果相同，即俄罗斯社会最底层民众对中国角色的认知，在最近十年来并无明显改善，相反，他们由原本不反华蜕变为最反华的群体之一。底层民众也许是因为接受了较多反华宣传，同时自身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分辨力，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的作用和影响，结果是将自身的困顿部分归咎于中国崛起，或者归咎于普京政府，并将不满迁移至对华友好政策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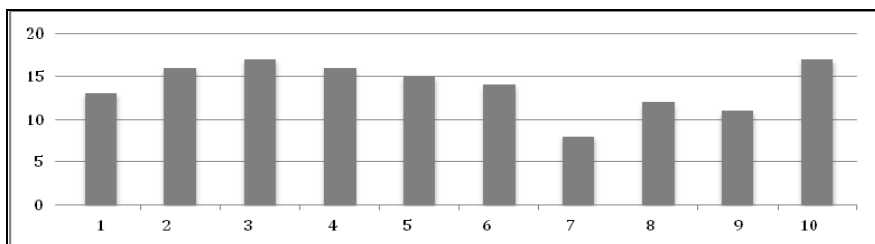


图7 2017年按收入十等份分类的各阶层对华消极定位的倾向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全俄中心”的官网资料整理。

^① 对于普京政治支持的分析揭示，商人和企业家是拥有最高反普京倾向的职业群体。参见曲文轶：“经济因素、普京的政治支持及2018年大选”，《国际经济评论》，2018年第2期，第93-111页。

6. 居住地。按人口规模分类，俄罗斯两个直辖市和超大型城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是十年间唯一显示反华情绪增长的城市，从2007年的14%增至2017年的20%，而且是由反华“洼地”转变为新的反华“高地”，2017年较平均倾向高了43%。

地理位置指标也提供了显著的预测性。2007年西伯利亚和远东联邦区居民对中国怀有明显的敌意，超过1/3的受访者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以及“对手或敌人”，比全俄范围高了9-11个百分点，是传播“中国威胁论”的中心。十年后，这两个地区的对华认知有了极大改善，反华概率分别下降至9%和16%，西伯利亚甚至成为最不反华的地区，较比全俄平均水平低了36%。远东联邦区对华消极倾向从34%下降至16%，尽管2017年仍高于全俄平均水平（14%），但也退出了“最不友好”地域的行列。相反，西北部（18%）和南部区（19%）成为疑虑最浓的地区，圣彼得堡市所在的西北联邦区，是十年间唯一对华负面倾向增强的区域（从15%增长至18%）。

将人口规模和联邦区数据结合起来，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十年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居民对中国的态度和角色定位有了极大改善^①，这可能与这两个地域居民有更多机会和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进而逐渐消除了恐惧并认识到开展对华合作的积极意义有关。俄科学院远东分院2017年的调查研究证实，地理位置离中国越近，当地居民对中国的认同感越高，例如滨海边疆区的居民较比其他三个行政区的民众，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首要的经济伙伴，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更加充满信心，并且对于中国企业和工人在俄罗斯的存在更加宽容。拉林和拉琳娜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地缘接近，滨海边疆区人民有更多机会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和人文接触，因此，与北部地区相比，他们更有可能专注于同中国的经济互动，并且更加适应中国。^②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从遥远的远东边陲，转移到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中心，并被精英们继承了衣钵。如果说十年前甚至更早，“中

① 这与一些研究结果相同，参见 Ларин 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китайские мигранты в оценке россиян//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8. No.5; 祖延科：“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在俄境内投资活动认知的演变”，第56-58页。

② Ларин В.Л., Ларина Л.Л. Китай в общественном мнении жителей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России (по итогам опроса 2017 г.)// 2018. Россия и АТР. No.2. С.5-33.

国威胁论”主要是源于历史上“前哨”定位的惯性作用，并成为远东地区争取自身利益、与中央进行博弈的工具^①，那么当下则来自俄罗斯精英的担忧，即其遥远边区的民众，可能更倾向东方身份、胜于对莫斯科的认同。^②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俄罗斯民调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的涉华调查为依据，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对中俄双边关系的认知特征、演进趋势，以及推动观念形成与改变的关键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1) 从对华总体认知和角色定位看，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人较为忽视对华关系，但到了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俄罗斯社会总体上已经形成了对华友好认知。与此同时，俄方对中国也有疑虑，伴随中国经济崛起，“威胁论”进一步增强，在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高峰时期，受访者中的三认为中国是“危险邻居”或“敌人”。乌克兰危机成为分水岭，2014 年后俄罗斯社会对华友好的主导格局得以形成。但有迹象表明，最近两三年俄罗斯人的亲华倾向有所下降，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则出现了改善。

(2) 尽管在俄罗斯社会中始终存在“中国威胁论”，但远非主流，2014 年后其影响力式微。移民，特别是中国人在远东的经济存在，而非与中国的军事战争，被认为是更加现实的威胁。

(3) 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经济角色的认知经历了巨大变化。由廉价商品和劳动力的供应者，到取代西方成为优先经济伙伴。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成为此一认知转变的最大推手。

(4) 俄罗斯社会最为关注的双边经济问题是远东开发与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移民和商品质量。在能源合作方面，除环保问题外，俄罗斯人比较看重收益分配是否均衡。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社会对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态度极大改善，但对中国参与远东开发和劳工移民仍心怀芥蒂，并且对中国商品质量低劣的“刻板印象”还广泛存在。

① 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 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第 21 页。

② Бляхер Л.Е., Григоричев К.В. Вглядываясь в зеркало: смысловы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браза Кита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социуме.

(5) 常量与变量。俄罗斯社会对华认知与角色定位，主要受四个宏观因素影响：作为常量的历史遗产将在很长时间内发挥消极作用；我国的对俄政策这一变量，相对而言自主性较强，虽受到中美关系及自我角色定位等诸多因素影响，但整体上发挥积极作用；俄西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则是两个客观性变量，目前来看，前者的影响更大。

(6) 微观层面的差异。政治倾向、经济地位、职业身份与居住地区的不同，带来显著的认知差异。亲政府群体倾向于对华友好，在三大政党的支持者中，拥护自民党的反华倾向更强且稳定。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底层群体，具有较明显的反华倾向，处于经济塔尖的最富有阶层，以及商人和企业家也具有明显且稳定的反华倾向。军人和安全机构职员更有可能将中国看成是“威胁”，而中等偏上的经济阶层以及政府公务员则更加亲华。居住地区也是显性预测指标。与全俄范围内的趋势一致，十年间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中国威胁论”大大减弱，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政治经济中心，却继承了“威胁论”衣钵，成为新的传播中心。与此前“前哨”定位的惯性作用不同，现今的“中国威胁论”主要由精英们对遥远边陲居民的认同取向所驱动，并可能在未来继续对中俄合作发挥实质影响。

【Abstract】 Mainly based on China-related opinion polls of the famous Russian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volu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f Russian society on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although Russian society has generally formed friendly perceptions towards China, yet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still has a certain market. And with the rise of China’s economy, it has even been accepted by more people befor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9. The Ukraine crisis has become a watershed. After 2014, the dominant pattern of Russian society’s friendship with China has been formed, and negative perceptions were held by fewer people. Russian society’s perceptions of China’s economic role have also changed dramatically due to the Ukraine crisis. China has been regarded from a supplier of cheap goods and labor

to a prior economic partner to replace the West. However, Russians are still skeptical about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ar East and labor migration, and their "stereotype" of the inferior quality of Chinese goods still exists widely. (3) Russian society's perceptions and role orientation of China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two variables.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And the other is China's rise. The former exists as the first-order constraint, while the latter depends on the former. (4)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in 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has been greatly weakened, but Moscow and St. Petersburg, the tw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enters, have become new communication centers, which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 Key Words 】 Russian Public Opinions, Sino-Russian Relationship, Perception towards China, Russia's Far East, the Ukraine Crisis

【 Аннотация 】 Статья в основном основан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мн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опроса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Китаем, в статье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а эволюция восприятия россий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факторов, которые на него повлияли,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Основные выводы таковы: (1) В конце 20-го и начале 21-го века, хотя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 дружеск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я, «теория угрозы» такж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а с подъёмом экономики Китая во время глобаль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2009 года, она укрепилась.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стал переломным моментом: после 2014 г.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доминирующая модель дружб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Китаем, и негативное восприяти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снизилось. (2)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роли Китая также претерпело огром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связи с кризисом в Украине: Китай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из поставщика дешёвых товаров и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в приоритет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ёра, заменяющего Запад. Однако россияне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кептическ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участию Китая в освоен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трудовой иммиграции, а

«стереотип» о низком качестве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варов по-прежнему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ён. (3)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оссий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Китая и его ролевое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висят от двух перем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Западом и подъёмом Китая. Первая существует как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первого порядка, а влияние второй зависит от природы внешней среды российско-запа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4) «Теор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ы» в Сибири 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ослабла, однако д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центра, Москва 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тали новыми центрам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данного мышления, что требуют внимания.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Росс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мн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ведомлённость о Китае,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责任编辑 肖辉忠)

中美俄在亚太：政策演变与博弈趋势*

柳丰华**

【内容提要】中、美、俄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与竞争，是影响亚太局势和地区格局的最重要因素。国际体系中的中美俄三角格局奠定了亚太地区中美俄关系的基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防范与遏制地区大国，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中国的对亚太政策经历了从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到主动塑造亚太地区合作架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俄罗斯由于国力衰退，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重心都在欧洲等原因，其对亚太政策包括保障东部边界安全，发展与亚太国家的贸易、能源和军事技术合作，融入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因而在亚太地区影响有限。美国与中国的遏制与反制，成为亚太地区中美俄三边关系的主轴。亚太地区格局将向均衡、多元复合的区域秩序演进。

【关键词】亚太地区格局 中美俄三角关系 中国对亚太政策 美国对亚太政策 俄罗斯对亚太政策

【中图分类号】D82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072(33)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一直是影响国际新格局构建的最重要因素。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世界经济政治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美、俄三国积极强化对该地区的政策和影响，国际社会也日益关注三国在亚太的存在、博弈和地区格局走势。本文借助于国际三角关系理论，试图厘清中美俄在国际体系和亚太地区层面的三角关系。通过论述国际体系层面

*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和《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不足之处由作者负责。

** 柳丰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俄罗斯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演变及其在亚太地区投射的影响，考察冷战结束以来三国对亚太地区政策的演变，分析三国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博弈，在此基础上，评估中、美、俄亚太政策和地区格局的走势。

一、国际三角关系的理论内涵

国际三角关系理论源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战略大三角”。1972年，美国出于遏制苏联扩张的考虑，利用中苏关系恶化的形势，改善中美关系，并与中国共同抗衡苏联，由此形成了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当时美国、苏联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分别占据世界第一和第二位，中国虽然落后于美、苏，但是足以与之三足鼎立，特别是能够在亚太地区发挥美国盟国难以比拟的在军事上牵制苏联的作用。中美接近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其中包括促使苏联做出妥协，在1972年与美国签署《第一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1975年东、西方签订《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以及美苏关系缓和。苏联在欧洲推行缓和政策的同时，却在亚洲、非洲和拉美大肆扩张，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争霸和关系恶化，促进了中美建交进程，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实力得到恢复，联盟巩固，而苏联经济陷入停滞，盟国涣散，美苏争霸转为美攻苏守。^①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美关系逐步缓和，苏美军控合作促进两国关系改善，同时苏中关系实现正常化，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战略意义下降。苏联、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随之不复存在。

“战略大三角”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由美、苏、中三大国组成，这是“大三角”的意义所在。前两者都是世界大国，都推行世界战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国际事务；后者虽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但是能够在美、苏之间发挥平衡作用，影响其均势。其二，在冷战的特定形势下，中美苏三角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军事政治和安全。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所展开的冷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国际事务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美苏三角关系则聚焦于攸关国家及

^①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6-177页。

其社会政治制度生死存亡的军事政治和安全领域,而这种竞争和对抗又对国际形势产生战略性的影响,因而被称为“战略三角”。其三,美、苏或东、西方两极对抗体系是中美苏三角关系产生和运行的背景与环境,三角关系既受到两极体系的制约,又服务于两极对抗。其四,美苏、中美、中苏三组关系中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动,都对另外两组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美、苏、中三国在运筹三角关系时,都会考虑到其对另外两边关系的影响。^①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对中美俄、中美日、美欧俄、中俄印等三角关系研究的展开,国内学术界日益深入地探讨国际三角关系的理论内涵。就国际三角关系的确立要件而言,张蕴岭研究员认为,主要包含三个条件:三国的双边关系之间存在相互联系;三国的双边关系存在互动;三方关系在地区甚至国际范围具有一定的或者重要的影响。^②贾庆国教授也认为有三个条件:三国决策的自主性,这是三角关系存在的重要前提;三国国家利益的相关性,这是三角关系运行的动力;三组双边关系的互动性,即三角关系中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出现重要变化都会导致其他两组双边关系相应的变化。^③时殷弘教授则认为有五个条件:其中任何两国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处于合作与对立交织状态;任何两国的基本关系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重要的变动;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都对其他一国或两国有关外交政策和三方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三国都具有基本独立的对外政策;三国都将纵横捭阖的典型多极均势及权谋外交视为三国关系的一大特征。^④这些观点对于研判国际三角关系是否成立很有助益。

笔者本着理论从简的原则,在借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历史经验和有

① 参见王缉思:“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大三角’”,载《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186页;牛军:“冷战中的中美苏三角关系”,载《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8-199页;Бобо Ло.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США: Прошлое и будущее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треугольника. февраль 2010. <http://www.ifri-rnv47-bobo-lo-triangle-strat-rus-2010.pdf>

② 吴金平:“中美日三角关系在亚太:理论检视与前景展望”,《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6期。

③ 贾庆国:“中美日三国关系:对亚洲安全合作的影响”,《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2期。

④ 时殷弘:“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回顾·实例分析·概念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

关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以下三个判定要件来研究中美俄关系。具体条件包括：其一，三国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其二，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影响另外两方的行为；其三，三组关系中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动，都对另外两组关系产生敏感的影响。

二、国际体系中的中美俄三角关系

随着美苏两极格局崩溃，中美苏三角关系也随之终结，国际格局和大国关系都处于转换调整之中。以冷战胜利者自居的美国，积极构建世界新秩序，其实质就是追求美国单极霸权。俄罗斯尽管处于艰难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之中，却仍然力图保持其大国地位。在全球和周边安全环境显著改善的情况下，中国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推行全方位外交，广泛参与国际体系。中、美、俄三大国在围绕世界新秩序、国际战略安全与稳定等问题的博弈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三角关系，其发展进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

（一）1991-2011年：美主要“挤”俄，其次防华

冷战结束后，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处理国际事务方面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美国面临的主要国际形势和问题包括：首先，世界格局呈现多极化趋势，军事上依然强大的俄罗斯、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独立自强倾向、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都对美国的霸权图谋构成挑战。其次，由苏联解体而可能产生的核武器和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被美国视为重要的安全威胁。再次，此前为美苏对抗所掩盖起来的民族、宗教等冲突，在冷战结束后纷纷爆发，不仅对地区安全造成威胁，而且危及美国或其盟国的利益。1994年，美国推出“参与和扩展战略”。其基本内容是：美国一方面要积极地参与和领导国际事务，以巩固其世界首领地位，另一方面要在世界范围扩展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民主，以巩固其安全所依赖的基础。^①美国在利用它所主导的同盟体系、国际组织和制度规则巩固自身全球领导地位的同时，极力阻止俄罗斯复兴和中国崛起。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

^① 刘丽云、张惟英、李庆四：《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6-297页。

衡的形势下，中美俄三组关系状况主要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

在中、俄两国中，俄罗斯是美国遏制的首要对象。一方面，美国利用俄罗斯当时的亲西方政策，支持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改革，削减俄核武器，与俄联手实现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无核化。另一方面，美国趁俄罗斯衰落之机，推动北约和欧盟东扩，以填补因苏东集团瓦解而产生的中东欧地缘政治“真空”，挤压俄地缘战略空间，防止其东山再起，再次挑战美国。北约东扩进程的启动，打破了俄罗斯通过加入西方国际组织、与美国共同主导欧洲安全事务以保持其大国地位的迷梦。1996年，俄罗斯放弃亲西方外交，改行多极化政策，坚决抵制北约东扩，反对美国的单极霸权图谋。为了推动世界多极化，俄罗斯主动与中国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科索沃战争导致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紧张，也使俄认识到其未必能够动摇美国霸权。^①普京执政后，由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信奉西方中心主义等原因，利用“9·11”事件后美国反恐的时机，与美结成反恐伙伴关系。然而，美国不仅没有因俄罗斯支持其反恐而承认俄在独联体地区的“特殊利益”，反而在独联体国家策动“颜色革命”，促使俄抵制美“输出民主”。美国还在捷克和波兰建立反导基地，推动北约向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扩张，继续侵蚀俄罗斯的战略安全利益，迫使俄奋起抗争，警告美不要妄想建立单极世界模式。^②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武装冲突，既是俄对格奉行亲美反俄政策的惩罚，又是对美国在独联体地区实行扩张政策的敲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美虽然“重启”两国关系，但是仍然在北约东扩和美国建立欧洲反导系统等问题上矛盾重重。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长期实行“遏制+接触”政策：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以防止其挑战现存亚太秩序；同时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合作，引导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基础消失之后，本来就不稳定的中美关系因为意识形态、台湾、贸易摩擦及世界多极化等问题变得

^① Россий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д вызовами XXI века. 2 апреля 2000 г. Совет по 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 политике. http://www.svp.ru/live/materials.asp?m_id=6744&r_id=6828

^② 普京：“在慕尼黑安全问题会议上的讲话”，《普京文集（2002-2008）》，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72-390页。

更加艰难。中国致力于国内经济现代化，对美国奉行友好合作政策，避免对抗。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逐步取消从 1989 年开始实施的对华制裁，恢复美中高层交往。1997 年，两国共同宣布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此后双方关系趋于稳定。中国与美国务实处理了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南海“撞机”事件，在防扩散、朝核等问题上开展合作。中美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对两国关系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中俄两国顺利完成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过渡，进而建立起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对中俄两国的遏制政策，是促使中俄 1996 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动因。中俄战略协作的领域包括互相支持对方的领土完整（中国的台湾和俄罗斯的车臣等）和发展道路，反对单极霸权，建立多极世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等。科索沃战争使中俄两国认识到抵制单极霸权图谋和单边主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此后加强了在维护联合国世界安全事务主导地位方面的合作。中俄两国在积极解决边界问题和发展合作的同时，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在中亚地区开展协作。中俄战略协作在“9·11”事件后因为俄美接近而一度松弛，随着俄美关系回归地缘政治竞争轨道，再度加强。2005 年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通过宣言，要求美国制定从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撤军的时间表，此举使美重新认识中俄战略协作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意义。中俄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丰硕成果，2011 年两国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冷战后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形成于 1996-1997 年。其标志性事件是：1996 年 4 月中俄两国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 年 5 月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签署相互关系《基本文件》，确认双方关系的伙伴性质；同年 10 月中美两国宣布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大体具备上文所述国际三角关系的三个构成要件。从此时直到 2011 年，中美俄三角关系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权力分布为一超两强。美国一家独大，俄罗斯国力大幅下降，中国实力不断提升。其二，美国对中俄两国以遏制为主，合作为辅，俄罗斯是遏制的首要对象，中国则是次要对象。其三，中俄两国加强战略协作，共同抵抗美国的压力，联合抵制美国单极霸权，推动世界多极化。其四，三

国运筹三角关系的意愿都不甚强烈。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对中美俄三角关系缺少兴趣。而中俄两国都希望发展与西方的合作，无意与美国对抗，因此只在多极化和国际战略稳定等有限的领域运筹中美俄三角关系。

（二）2011 年至今：美主要遏华，其次罚俄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亚太地区成为全球经济政治重心，而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中抽身出来时，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军力显著提升，已经对美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构成挑战，加大对其遏制力度势在必行。2011 年 11 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将美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集中投放到亚太地区，以遏制中国崛起，维持其亚太安全和经济主导地位。从此，在美国的地区大国遏制政策中，中国上升为首要的遏制对象，俄罗斯则退居其次。

中美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日益加剧。奥巴马政府先后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包括：加强美国驻扎在亚太的海、空军力，强化与区内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以巩固美在地区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推动有关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谋求制定亚太地区新的贸易规则，打造封闭性区域贸易集团，把中国排斥在外；主导制定关于亚太地区海洋问题的国际规则和规范，引导和督促区内各国，特别是中国遵守游戏规则。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除了继续实行上述政策之外，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遏制力度，特别是防范中国效仿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模式”，以强力解决同邻国的岛屿争端。因此，美国于 2014 年将《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钓鱼岛，在南海对中国耀武扬威，2017 年在韩国建立“萨德”反导基地。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等三份政策文件，再次把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者，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加紧布局，遏制中国崛起。为此，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发动中美“贸易战”，扩充陆基中程导弹。2020 年，特朗普为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转移选民对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糟糕表现的不满，极力恶化中美关系，使之陷入两国建交 40 年来的最低谷。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执掌白宫后，美对华政策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回归奥巴马时期的做法，即

更多地借助于盟国和伙伴国，利用美所主导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在军事、政治、经济和高科技等领域遏制中国崛起，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方面推行有选择的合作。总体而言，拜登政府可能在一些领域与中国务实合作，但是不大会改变美中战略竞争关系的大势。

俄美关系从“重启”状态坠入对抗，而且两国对抗长期化。乌克兰危机后，美欧对俄实施经济制裁和军事政治遏制，从而使俄美关系结束“重启”进程，转入对抗状态。西方对俄经济制裁主要集中在金融、能源和军工等行业，一度使俄罗斯经济陷入衰退。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前沿派驻重兵，对俄形成军事压制之势。俄罗斯对西方毫不妥协，针锋相对，还在 2015 年 9 月出兵叙利亚，在乌克兰之外开辟出一个新的角斗场。继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建设反导基地之后，美国又在 2019 年 8 月退出《中导条约》，致使俄美竞争进一步扩大到中短程导弹领域。《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相继被弃，给《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21 年 2 月到期后的顺延前景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在特朗普当政期间，俄美对抗全面化——涵盖政治、经济、能源、金融、技术、信息、意识形态、军事安全和国际事务等领域，被学术界称为“混合战争”^①，可谓坠入冷战后两国关系的“谷底”。拜登执政后，尽管有可能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恢复与俄罗斯在战略稳定方面的对话，但同时将继续推行对俄经济制裁，加强北约军力和继续扩充驻东欧军备以压制俄军，资助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拜登政府对俄策略与特朗普时期相比会有所变化，但遏制俄罗斯的方针不会改变。^②俄罗斯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认为，“无论谁赢得美国总统选举，近期俄美两国仍将保持竞争关系，仅可能在个别相对狭窄的领域开展合作。未来俄罗斯的对美政策应当致力于建立一种能降低与美竞争开销和风险的俄美关系，以便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于解决国内发展问题，同时不损害俄安全利益。”^③鉴于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

①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От гибридной войны к взаимному отстранению. Как изменятся от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и США за 20 лет. 8.11.2019.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0293>

② Марина Панюжева. Чего ожидать о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тандема Байдена и Харрис? 18 ноября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chego-ozhidat-ot-politicheskogo-tandema-baydena-i-kharris/>

③ Игорь Иванов. Видеть лес за деревьями. 2 ноября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videt-les-za-derevyami/>

的现实障碍难以消除，在北约东扩、独联体事务和国际战略稳定等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无法化解，而在反恐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动力不足，可以认为，在近期和中期，俄美关系难以实现正常化。

中俄关系快速发展，成为当代大国关系的典范。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定发展，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由于俄罗斯推行“转向东方”政策，因而又获得重大的发展动力。中俄在军事技术、能源与经贸等各个领域的双边合作日益深化，成就斐然。两国开展“一带一盟”对接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而扩大了双方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单极化、单边主义化和去全球化的形势下，中俄两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对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俄两国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促进世界稳定。两国共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有助于防止国际军备竞赛。两国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促进全球经贸发展。2019年，中俄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俄两国互相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共同反对一些国家的疫情政治化行径，共同推动国际防疫合作。

这一时期，中美俄三角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一，权力均衡化。虽然美国仍然具有实力优势，但是中国已经日益缩小与美经济实力差距，并在军事和科技等领域也取得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则维持了对美军事平衡，中俄两国同美力量对比趋向平衡。其二，美国同时对中俄两国采取遏制政策，但以中国为主要遏制对象，以俄罗斯为次要遏制对象。在中、俄两国中，美国只是把俄罗斯视为一个可以对美军事安全和一些国际利益构成威胁的地区强国，而把中国当作是对美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尽管中国并没有这种意图和行动。其三，中俄联手反制美国的范围明显扩大，从此前的多极化和国际战略稳定，扩展到周边地区安全、信息网络空间秩序等领域。尽管如此，两国仍然只是有限地、而不是全面地制衡美国。^①其四，三角关系持续运行，以中美战略竞争为主要特征的中美关

^① 柳丰华：“乌克兰危机以来的中俄美三角关系：调整与走势”，《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4期。

系已经成为三角关系的主轴。拜登执政后，将会继续推行遏制中国和制裁俄罗斯的政策，中美战略竞争仍将是三角关系中的主要矛盾。

随着中美国力日益接近和俄罗斯同中美国力落差日益拉大，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谈论中美两极化格局的前景。俄罗斯既反对美国单极霸权，也不愿意面对中美两极格局，因而极力保持其独立一极的地位，争取在中、美之间推行平衡外交。^①在中美展开战略竞争、2020年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调整的形势下，俄罗斯重新思考其国际战略，力图对未来的国际格局施加影响。特列宁认为，俄罗斯应防止依附于中国，在中美两极之间保持平衡，为此必须发展与欧盟、日本、印度等的关系。^②卡拉加诺夫等学者主张，在世界格局中美两极化的形势下，俄罗斯有必要担任“新不结盟运动”——由亚洲、非洲、拉美甚至欧洲的国家组成——的主导国，使它们不必在中、美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保持其主权和独立。与此同时，俄罗斯既与中国保持友好和战略伙伴关系，又致力于同美国建立良性关系。^③科尔图诺夫认为，对于中美战略竞争，俄罗斯应当学精明的猴子，坐山观虎斗；俄应推动有悖于中美两极化趋势的进程，其中包括发展与欧盟的合作。^④考虑到俄罗斯政界重视学界智库的资政建议，普京总统就曾吸纳卡拉加诺夫等学者的建议，将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列入俄外交政策，

① 俄罗斯的这一政策在俄智库和学者专家的文章中屡见不鲜，在俄官方外交和安全政策文件中是以如下方式表述的：例如，“巩固俄罗斯联邦作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的地位”，“建立公正民主的国际秩序”，“俄罗斯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强调俄美关系的平等地位和相互尊重，强调中俄关系的平等和互信，强调“几个世纪以来俄一直作为国际事务中的平衡性因素”这种“独一无二的作用”，等等。见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 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http://www.mid.ru/ru/foreign_policy/official_documents/-/asset_publisher/CptlCkV6BZ29/content/id/2542248. 参见俄罗斯发布的各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和《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构想）》。

②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России удержать равновесие в 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м биполярном мире. 15.04. 2020.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541>

③ Доклад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й на факультете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ИУ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апрель 2020 г.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zashhita-mira-zemli-svobody/>

④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О мудрой обезьяне, спускающейся с горы. 4 мая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mudroy-obezyane-spuskayushcheysya-s-gory/>

俄有可能将上述构建俄“第三条道路”或“第三极”的观点，作为俄对中美两极化的官方政策。当然，这并不是俄罗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唯一备选方案。2020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回答中俄是否可能结成军事同盟的问题时表示，“（中俄同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俄罗斯和中国还要观察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短程导弹等问题上如何做，又将对两国产生哪些威胁，据此决定共同采取何种应对举措。”^①俄罗斯究竟将如何应对中美两极化，主要根据俄国家利益来决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要看美国的对俄政策，特别是美对俄的妥协程度和“收买”价码。

三、中美俄对亚太地区政策

作为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力量，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全球层面的博弈势必影响到各自的对亚太政策。同时，三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在该地区拥有重要的利益，维护各自利益是中、美、俄对亚太政策的目标。中、美、俄对亚太地区的政策以及三国间的博弈，是影响该地区形势和格局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一）美国对亚太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战略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地区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结构过渡。首先，原有的美苏两极格局和与之紧密联系的中美苏三角关系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独大的美国同日本、中国、俄罗斯、东盟四支地区主要力量并存的状态。美国虽然拥有无可比拟的实力和领导地位，但是军事强大的俄罗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和快速崛起的政治大国中国，分别在各自擅长的单项领域对美构成挑战。其次，随着亚太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东亚地区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北美、欧盟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区，而亚太则成为美国最大的区域贸易伙伴。再次，地区安全形势依然复杂。美国借助于美日同盟防范中国，

^①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 режиме видео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VII ежегодно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22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4261>

利用台湾等问题牵制中国。中日、俄日、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和朝韩对峙等问题，消极地影响地区稳定。

无论是乔治·布什政府推行的亚太地区新秩序或者“扇形结构论”，还是克林顿政府倡导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构想”，根本目标都是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美国对亚太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对美更加开放的亚太地区经贸体系。美国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从一个国际论坛变成区域经济组织，积极推动该组织实施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第二，建立一个美国主导的、灵活而强大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政策的目标是维持其主导地位，防止竞争对手和敌对势力支配该地区。为此，美国继续在亚太保持 10 万驻军^①，发展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军事安全合作，支持包括东盟地区论坛在内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同时，对中国既合作又防范，制止朝鲜核技术开发计划。第三，推动亚洲国家民主化，以增强“太平洋共同体”国家的共同价值观。美国利用民主、人权等工具，干涉亚洲国家内政。

乔治·W·布什时期，受“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确立了全球反恐外交战略，为此不得不放松对中、俄等地区大国的遏制，与它们开展反恐合作。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大幅度调整了亚太政策。首先，以打击恐怖主义和开展反恐外交为中心。2001 年 10 月美国出兵阿富汗，2003 年 3 月又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敦促亚太盟国派兵参加这两场反恐战争，改善美俄关系，驻军中亚打恐，发展同中国、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反恐合作，阻止伊朗和朝鲜研发核武器。其次，虽然继续防范中国，但是由于忙于反恐和需要同中国合作等原因，中美关系实际上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中美经济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再次，维护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秩序，防止出现排斥美国的区域贸易架构。由于将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反恐、大中东、独联体地区“颜色革命”等方面，美国实际上既没有推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一体化，也没有阻碍东盟、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等区域合作机制的发展。

^① 张蕴岭主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96 页。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返亚太”战略及“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亚太政策最大幅度的调整。究其原因，主要包括：美国长期深陷的两场反恐战争和始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大幅缩小了中美国力差距；美方认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已经对其在亚太地区的霸权构成了现实挑战；中国坚定地维护自身领土领海权益的政策措施，自信地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使美国相信，中国正在凭借自身实力挑战美主导的亚太地区军事安全 and 经济秩序。

奥巴马时期美国对亚太政策的调整主要包括：其一，实施在 2020 年前将 60% 的驻外海军和空军部署到亚太地区的计划，强化与区内盟国及伙伴国的军事合作，构建针对中国的防务合作网络。美国制定旨在削弱中国“区域拒止/反介入”（Area-denial & Anti-Access）能力的“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概念，试图利用美军在空中和海上优势以及依靠远程攻击，在未来的冲突中获胜。这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已经不止于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围堵，而转入战术设计和战役演练层面。奥巴马政府在韩国建立“萨德”反导基地，则使美国对华军事遏制的军备上升到战略武器层面。其二，通过与亚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打造一个将中国排斥在外的亚太区域贸易集团。2010 年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积极推动与其他 11 个伙伴国的谈判进程，促成该协定于 2016 年 2 月正式签署。该协定确定了一套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规则，其实施将促进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削减中国与签约国的贸易投资合作，从而使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边缘化。而这正是奥巴马政府力推该协定的战略目标所在。

由此可见，奥巴马政府已经将其全球战略的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并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作为延续其全球主导角色的关键。同时，美国将中国作为其对亚太政策的核心，围绕遏华政策来设计和实施对亚太政策。美国既将其对亚太其他国家政策、对地区内领土领海争端政策融合实施，以遏制中国，又积极争取中国在朝核、伊核等问题上与美合作。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因特氏的非建制派背景、独特的个性和执政理念、商人行为模式等因素，与奥巴马时期“同”少“异”多。其一，对中国

发动“贸易战”，开启中美经济竞争。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全面遏制中国，特别重视经济遏制。2018年美国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企图通过加征关税，迫使中国在贸易赤字、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开放金融市场和取消外汇管制等方面，接受它的要价。2020年1月中美两国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是各方普遍认为，接下来的第二阶段经贸协议谈判会更加艰难。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对下一代技术——网络安全、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的争夺战，也就是对决定国际经济主导地位的科技制高点的竞争。

其二，促进美国与亚太国家建立“公平互惠”的双边经贸关系。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上台后实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促进美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特朗普认为，多边贸易协议有损美国利益，上任伊始就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政府强调在“公平互惠”的基础上，与亚太国家修订双边贸易协定；要求日本、韩国等国向美国开放国内市场，平衡美国的贸易逆差。

其三，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企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体系的约束之下。2017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巡访亚洲国家期间，提出“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思想，随后美国恢复美日澳印（度）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美国的“印太战略”以美日澳印四国机制为主要架构，在亚洲、太平洋和印度洋范围内，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通过武器出口、情报交流、人员培训等方式，提高包括印度在内的伙伴国军事能力，构建封堵中国的防务合作网络，以期滞缓中国崛起。

其四，推进亚太地区反导系统建设，计划增加在亚太的导弹部署，以提升美国主导的地区防务体系的攻防能力。在加强亚太前沿军力部署、继续打造强有力的军事同盟和防务伙伴关系的同时，特朗普政府特别重视加强以战略武器为主的攻防能力。继完成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之后，美国于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放手发展中短程导弹，策划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谋求对华导弹优势。

根据拜登竞选期间的有关言论，可以认为，其执政后对亚太政策大体走势如下：第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特朗普偏激的贸易政策，部分地恢复

贸易自由化政策，包括：取消部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通过谈判达成美中第二阶段经贸协议，停止美中“贸易战”；取消对亚太其他国家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进口关税；重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者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加强与亚太盟国和伙伴国的经贸关系与区域协作。^①第二，将继续推行对华军事政治遏制政策，包括：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力部署，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极力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主导地位；重视对日本、韩国的安全保证；在南海问题上调整策略，重建法律和规则。^②第三，在朝核及半岛稳定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就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言，拜登政府将奉行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政策。

（二）中国对亚太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形势趋于稳定，中国周边环境显著改善。美苏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对抗不复存在，中国周边爆发大规模地区冲突以及中国被卷入其中的危险基本消除。冷战时期在亚太地区形成的诸多热点问题纷纷降温，一些国家之间的边界、民族和宗教等矛盾虽然复杂难解，但是对抗程度明显降低。同时，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区内国家间经贸联系增强。面对有利的国际和周边地区环境，中国对内进行经济建设，对外实行开放政策，集中精力推进国家现代化。

综观冷战结束以来的中国对亚太地区政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1年12月至2013年9月）：中国奉行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政策，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积极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第二阶段（2013年9月至今）：中国在积极维护地区稳定和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主动塑造亚太地区合作架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中国对亚太外交政策更多地遵循“韬光养晦”方针，那么在第二阶段，“有所作为”的特点更加明显。为国内经济建设积极营造长期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同时促进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则是贯穿于两

① “卡托研究所分析拜登政府贸易政策走向”，2020年11月11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zhiku/hwzk/2020/1117/2424946.shtml>；“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系列对华政策建议”，2020年11月18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zhiku/hwzk/2020/1118/2425021.shtml>

② “布鲁金斯学会提出系列对华政策建议”，2020年11月18日。

个阶段不变的政策目标。

在第一阶段，中国对亚太地区奉行睦邻友好与务实合作政策，2003年将其升华为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旨在维护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第一，发展与美国、俄罗斯和日本等大国的合作关系，避免对抗。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虽然在诸多领域依然拥有共同利益，但是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台湾问题等方面的矛盾空前凸出，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困扰。中国积极敦促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双边关系指导原则，妥善处理分歧，不断扩大合作，使中美关系在磨合与起伏中向前发展，形成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实现了从睦邻友好向建设性伙伴关系，再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三级跳”，两国共同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军事互信，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中日关系实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两国建立起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与周边中小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合作，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同中亚五国等国家建交，发展与朝鲜、巴基斯坦的传统友好合作，改善同越南和印度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实现了从睦邻互信伙伴到战略伙伴的提升。与此同时，中国同俄罗斯和中亚邻国等签署边界条约，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东盟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协商南海岛礁争端解决之道。中国同印度达成在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建立信任的共识，保持了中印边境地区的总体稳定。

第三，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在中国崛起和亚太地区经济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中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持续扩大。2012年中国与亚太国家的贸易额接近 1.6 万亿美元^①，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②同时，中国积极融入亚太地区一体化。中国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共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该组织框架下的多边经贸合作。中国积极参与东盟“10+3”机制，并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继续参加

① 数据来自王珏、黄光灿：“中国与亚太地区贸易潜力的关系研究：基于 TPP 与丝路经济带的比较分析”，《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② “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2013 年 3 月 9 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3lh/2013-03/09/c_114964380.htm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张在自愿参加、协商一致、自主安排等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第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洗雪百年耻辱，使国家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

第二阶段，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和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案，主动塑造亚太地区的合作架构，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2013年是中国对亚太地区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份，是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内在有经济结构调整需求、外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遏制的形势下做出的应对方略，其出台标志着中国开始主动塑造周边区域合作架构。同年10月，中国专门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定了未来5-10年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和实施方案。习近平主席在会上强调，周边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外交方针在继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的同时，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促进周边国家发展。经济上要建设好“一带一路”，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安全上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人文上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①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亚太地区而言，就是要建立亚太命运共同体。

其一，推进亚太地区自贸区建设，同时主动塑造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中国积极推行自贸区战略，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其中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14年中国提出建立亚太自贸区的“北京路线图”，推动北京峰会就建设亚太自贸区问题达成重要共识。2017年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接纳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而扩大了区域合作范围。2019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

^①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5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0/25/c_117878897.htm

级议定书》全面生效，双方不但将提升贸易规模和质量，而且将加强产业合作。2020年11月中国与东盟十国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根据该协定，十五国将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区域性自贸区。这是第一份涵盖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标志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式“起航”。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表示，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①同时，中国积极地贡献中国版区域合作机制：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主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与伙伴国广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区内国家的经贸联系，促进了亚太区域经济新格局的构建。

其二，稳定中美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针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美政治对话与经贸等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使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并有所发展。特朗普政府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启动对华全面竞争与遏制，重点发动“贸易战”和“技术战”。中国兼用并施坚决反制和灵活谈判的策略，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正视“贸易战”和“技术战”对美国造成的损失，同中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特朗普为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极力在防疫、南海、台海、新疆和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挑衅，使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状态。中国既维护自身利益，又斗而不破。

其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2014年，中国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上海峰会上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太安全之路。中国致力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积极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亚太贡献力量。^②中国积极增进与亚太国家的政治交流与互信，扩大军事与安全交流合作。中国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了印度边防部队侵入中国洞朗

① “习近平：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20年11月20日，中国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20-11/20/content_5563086.htm

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年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539488/1539488.htm>

地区等事件。中国积极推动上合框架下的多边安全合作，支持亚信发展安全协作机制，参与东盟倡导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主张建立开放、透明和平等的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机制，并与伙伴国共同推动该机制建设。

（三）俄罗斯对亚太政策

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其 2/3 国土位于亚洲，因此，亚太地区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方向之一。苏联解体以来，受国内外形势等因素的影响，俄罗斯对亚太地区政策经历了从忽视到审视、再到重视，亦即不断加强的演变过程。近 30 年间，俄罗斯对亚太政策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政策特点如下：忽视东方（1991-1995 年）；地缘政治驱动型发展（1996-2001 年）；地缘经济驱动型发展（2002-2013 年）；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双轮驱动型发展（2014 年至今），即“转向东方”。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因奉行向西方“一边倒”政策等原因，无意也无暇关注亚太。由于苏美军事对抗消失，俄罗斯远东地区安全形势有所改善。加上新俄罗斯忙于政治经济转轨、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文明离婚”、推行亲西方外交政策以获取美欧经济援助等原因，叶利钦政府疏于开展东方外交，其对亚太政策基本限于以下内容：一是维护东部边界安全。由于俄罗斯在亚太地区仍然保有大量驻军，亚洲邻国对俄奉行睦邻政策，俄东部边界并无危险。二是同大多数亚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俄罗斯同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与亚洲其他国家或者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或者复交。只有俄日关系因南千岛群岛问题发展缓慢。三是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

1996-2001 年，俄罗斯出于抵制美国单极霸权、反对北约东扩等地缘政治需求，开始重视和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其亚太政策主要包括：（1）加强与中国、印度等国的合作，借以抑制美国单极霸权。俄罗斯与中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推动世界新秩序建构，共同反对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俄罗斯试图建立俄中印三角战略关系，并与印度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世界多极化方面开展合作。（2）保证俄罗斯东部边界安全，为乌拉尔以南和以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①（3）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

^① [俄]伊·伊万诺夫：《俄罗斯新外交》，陈凤翔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年，第 108 页。

发展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

2002-2013年，俄罗斯对亚太政策转向发展务实合作，同时淡化与亚太国家关系中的地缘政治色彩。“9·11”事件后，俄罗斯改善与西方关系，致力于实现国家经济复兴，对亚太政策也服务于国内发展目标，主要包括：（1）加强与亚太国家双边经贸合作。中俄贸易额从2002年的121.1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3年的892.1亿美元，并且从2011年起中国一直保持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俄罗斯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的贸易额总体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发展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俄罗斯铺设通往亚洲国家的石油管道，扩大对亚太市场石油出口规模。2010年中俄原油管道建成，2012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二期工程竣工投产，使俄罗斯成为亚太石油市场重要的输出国。（3）扩大对亚太军技出口。亚洲国家一直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主要市场，俄在积极维护同中国和印度军技交易的同时，积极扩大同伊朗、朝鲜和东南亚国家的武器贸易。（4）积极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俄罗斯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下的经贸合作，2012年主办该组织符拉迪沃斯托克峰会。俄罗斯与东盟实施长期合作纲要和经济合作协议，扩大经贸联系。（5）保障俄罗斯东部边界安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为俄远东地区开发及俄与亚太国家经济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以来，随着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和军事政治遏制的实施及长期化，俄罗斯被迫推行“转向东方”政策，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政治合作。俄罗斯这一轮对亚太政策的强化，具有鲜明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色彩。（1）俄罗斯大力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中国一道将其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强各领域合作。中俄战略协作重大成果纷至沓来：2018年中俄贸易额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从2016年起俄罗斯连续三年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2019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成供气；俄对华输出S-400防空导弹系统和苏-35战斗机，中俄军技合作达到新的水平，等等。（2）俄罗斯加强与印度特惠战略伙伴关系、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俄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对话与经贸合作，探讨在南千岛群岛开展共同经济活动以及签订和平条约等问题。（3）俄罗斯提出并实施“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2016年普京总统提出该倡议，

呼吁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共同结成“大欧亚伙伴关系”。这表明，在俄罗斯与西方对抗长期化的形势下，普京政府不仅将外交重点从“大欧洲”转到“大欧亚”，而且有意建立一个与西方平行的、以俄为中心的非西方世界。欧亚经济联盟已经与越南、伊朗建立自贸区，和新加坡等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现在正同印度等国开展自贸区谈判。在中美竞争亚太的形势下，俄罗斯学者建议俄政府实行亚太平衡政策，通过发展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成员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平衡的伙伴关系，来降低该地区分裂为各以中、美为首的两个对立阵营的风险，同时维护区内中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①中国与亚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促使俄罗斯更加积极地推动欧亚经济联盟与更多亚洲国家建立自贸区，有可能促使俄罗斯提前（原先设想是在 2020 年代末）启动该联盟与中国的自贸区谈判。

综上所述，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极力防范中国和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坐大，对其构成挑战。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但是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壮大，自然地增加了中国对亚太事务的影响，引起了美国的疑虑和遏制，美中遏制与反制成为亚太地区中美俄关系的主轴。俄罗斯因为国力衰退，安全战略重心和现实安全威胁都在欧洲地区等原因，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关注和介入都有限，主要包括保障东部边界安全，融入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不被排斥地参与亚太事务等。如俄罗斯学者所说，俄对保障亚太地区安全虽然表现得相对消极，但对该地区局势仍然保持重要影响。^②

四、中美俄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博弈

亚太地区有一些复杂的热点问题，长期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由于立场、利益和观念等差异，中、美、俄三国对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政策并不一致，三国博弈对亚太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

① Доклад «Защита мира, Земли, свободы выбора для всех стран. Новые идеи дл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② Лукин А.В, Кашин В.Б.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АТР//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2019. №.2.

（一）朝鲜半岛核问题

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的援助下，朝鲜开始发展核工业，1985年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冷战结束后，朝鲜致力于核武器开发，引发1993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1994年美国与朝鲜签署《核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朝鲜冻结核武器开发，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美国则保证不对朝鲜使用武力，承诺为其提供补偿性的能源^①，危机得以平息。乔治·W·布什政府以朝鲜秘密开发浓缩铀为由，于2002年废除《核框架协议》，次年朝鲜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公开研发核武器。从此，朝鲜核问题陷入“朝核试验-国际制裁-朝核试验”的怪圈。

尽管美朝核矛盾不断升级，但是直到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基本上沿用以制裁迫使朝鲜放弃核研发的政策。2016年朝鲜两次进行核试验，2017年又宣称远程弹道导弹试射成功，可以打到美国本土。于是特朗普政府放弃奥巴马时期对朝鲜核问题的“战略忍耐”政策，改行“极限施压”，企图以强硬手段甚至战争边缘策略，迫使金正恩政权弃核，却导致美朝关系紧张。2018年6月，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两国关系史上首次元首会晤。双方发表声明，表示朝鲜半岛将向无核方向前进，但是没有规定弃核期限以及为此两国各自须承担的义务等内容。虽然朝核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朝鲜半岛局势大为缓和。2019年2月，第二次“特金会”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谈无果而终。鉴于美国对朝核政策的目标在于朝鲜永久放弃核武器和中远程导弹开发，而金正恩政权研发核导以维护自身安全的国策不可能改变等因素，可以认为，朝鲜核与半岛和平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②中国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进程，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积极参与了朝韩中美四方会谈，2003年以后，中国先后主持中美朝三方会谈和美洲朝韩俄日六方会谈，促成有关各方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达成“9·19共同声明”等多份

① Россия 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МИД России. <https://www.mid.ru/ru/uregulirovanie-situacii-na-korejskom-poluostrove>

②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年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xbd/wz/Document/1539488/1539488.htm>

重要共识文件，为政治解决朝鲜核问题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 2009 年 6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朝鲜核试验的决议以后，中国开始支持对朝实施必要的制裁，以促使其回归六方会谈。

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倡导国之一，主张朝鲜无核化。同时，俄罗斯反对美国对朝鲜发动军事干涉，因为这有悖于俄所主张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也将殃及俄远东地区安全与稳定。当然，自视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也希望在朝鲜核问题调解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俄两国在朝核与半岛和平问题上的立场日趋接近，合作越来越密切。2017 年 7 月，中俄两国外交部共同发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提出朝鲜半岛问题调解“路线图”倡议。其主要内容包括：实行“双暂停”倡议，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和美韩暂停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并行”思路；对立各方同步开启谈判，一揽子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所有问题；推动建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和平安全机制，最终实现有关国家关系的正常化。^①从 2019 年初开始，中俄两国共同与朝鲜核问题其他伙伴国进行磋商，希望达成《全面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行动计划》，为实现半岛无核化提供更加具体的“路线图”。^②

（二）反导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利用朝鲜试射中远程导弹所引发的危机形势，打着部署战术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幌子，在韩国部署了“爱国者-3”防空导弹，并向日本出售 24 个“爱国者”PAC-2 导弹系统。^③同在欧洲以伊朗导弹威胁为由部署反导系统而剑指俄罗斯一样，美国在东亚以朝鲜导弹威胁为由部署反导系统，实际上是要获取对中国的战略军事优势。美国通过与日本和韩国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甚至还妄图将台湾地区纳入该系统，就是企图保护美在东亚驻军，向日韩等提供导弹“防护网”，巩固美在亚洲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2017 年 7 月 4 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475362.shtml>

② Россия и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ситуации на Корейском полуострове. МИД России. <https://www.mid.ru/ru/uregulirovanie-situacii-na-korejskom-poluostrove>

③ 王建华：“TMD 系统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现代军事》，2000 年第 11 期。

不受挑战的军事霸权，同时使美拥有干涉东亚地区军事冲突的自由。^①2016年朝鲜核危机发生后，美国不顾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于2017年完成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正如俄罗斯学者所指出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美国反华军事战略的关键环节，尽管该反导系统对拦截朝鲜核导效果不大，但其雷达系统可用于跟踪中国的导弹，增强美在与中国冲突中的优势。^②随后日本从美国采购两套陆基“宙斯盾”导弹防御系统并完成了部署。美国正在建设亚太地区反导系统，用以遏制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反对美建立亚太地区反导系统，坚决反对美将台湾地区纳入该系统。中国明确告知美国和韩国：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破坏了地区战略平衡，严重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也不利于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强烈敦促美韩停止有关进程。^③中国一贯认为，发展冷战式军事同盟、构筑全球和地区反导系统，既不利于构建战略稳定与互信，也不利于构建包容性的全球及地区安全格局。^④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2017年韩国做出不考虑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系统、不发展韩美日三方军事同盟的表态以及无意损害中方安全利益的表态。^⑤

俄罗斯也反对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系统。美国在韩国和日本部署反导系统，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但是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及其亚太驻军的安全也构成威胁。而且美国的亚太地区反导系统和欧洲反导系统一道，从东、西两侧对俄罗斯构成军事围堵和威慑。俄罗斯在表态反对美国建立亚太地区反导系统的同时，积极采取军事反制措施，其中包括在国后岛和择捉岛部署岸防导弹系统和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

中俄两国联合反对和反制美国建立亚太地区反导系统。2016年5月，

① 朱锋：“TMD与当前东北亚‘导弹危机’”，《当代亚太》，1999年第5期。

② Лукин А.В, Кашин В.Б.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АТР.

③ “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召见美国、韩国驻华大使就美韩宣布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提出严正交涉”，2016年7月8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t1378703.shtml

④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亚太安全合作政策》，2017年1月1日。

⑤ “王毅同韩国外长康京和举行会谈”，2017年11月22日，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xgxw_676530/t1513135.shtml

中俄两军在俄罗斯国防部空天防御部队科研中心，举行“空天安全-2016”中俄首次首长司令部计算机模拟导弹防御联合演习。同年6月，中俄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共同反对美国在亚太和欧洲建立地区反导系统，维护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的共同立场。2019年7月，中俄两国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东海有关空域实施首次联合巡航，展示了共同维护亚太地区战略稳定的决心。同年10月，普京总统在索契表示，俄罗斯正在协助中国建造导弹预警系统。^①2019年美国退出《中导条约》之后，公开试射中程导弹，积极筹划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美国在反导和中导等领域的种种行径，都严重损害了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亚太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将促使中俄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以维护亚太地区的战略稳定和安全。

（三）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是围绕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主权和权益的国际争端，涉及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及文莱。中国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曾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为日所窃取，二战结束后中国政府恢复行使主权，当时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并无异议。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纷纷侵占中国南沙群岛多个岛屿，引发中国与这些国家间的纷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进一步刺激了东南亚南海国家侵占岛屿的野心，南海争端逐渐扩大化。由于美国主动插手和东南亚南海岛礁声索国拉拢美介入争端，于是美成为南海问题的重要域外因素。在南海问题国际化的背景下，俄罗斯也在一定程度上卷入其中。

美国对南海问题政策逐渐由中立转向反华。长期以来，美国由于反共、遏华、维护自身在亚太主导地位、对盟国的安保信誉等原因，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中立立场。随着中国崛起和由此产生的美国对中国谋求西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怀疑，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南海问题政策，公开介入其中，这反映在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的讲

^① Айсель Герейханова. Путин: РФ помогает Китаю создать систему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я о ракетном нападении. 3.10.2019. <https://rg.ru/2019/10/03/putin-rf-pomogaet-kitaiu-sozdat-sistemu-preduprezhdeniia-o-raketnom-napadenii.html>.

话中。希拉里宣称：美国的利益在于南海航行自由、贸易畅通无阻以及尊重国际法；美支持主权声索方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胁迫。^①奥巴马政府实施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后，在南海问题上开始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明确反对中国的“九段线”立场。从2014年起，为防止中国效仿“克里米亚模式”“修正”南海地区秩序，美国加强了对中国南沙岛礁附近海、空巡逻等军事威慑活动。同时，美国积极支持菲律宾发起的“南海仲裁案”及其仲裁裁决，推动建立一套反映美国利益和观念的南海规范，企图将中国纳入其约束之下。2020年，在美国总统选举年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形势下，特朗普政府强化在南海对华军事威慑，中美在南海军事对峙加剧。

中国对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中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坚决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反对他国对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侵占及侵权行为，主张由直接当事方通过双边协商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支持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反对域外势力干涉南海问题；与南海邻国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稳定。^②在睦邻友好方针和对南海政策的指导下，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各方承诺和平解决南海问题，不使争端复杂化和扩大化；2018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文本草案，从而共同维护了南海局势的总体稳定。中国对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种种行径，包括外交指责和炫耀武力等，都及时地做出了外交和军事回应。中国宣布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裁决无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③2020年7月1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称，中国在南海的许多主张没有国际法依据，南海仲裁案裁决对中美均有法律约束力。中国外交部严正驳斥了蓬佩奥的错误言行，敦促美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④

俄罗斯对南海问题持中立的政策立场。由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是俄罗

① 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 July 23, 2010, <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20092013clinton/rm/2010/07/145095.htm>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t1380021.htm>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2016年7月12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nanhai/chn/snhwtlcwj/t1379490.htm>

④ “外交部发言人对美涉南海声明作出回应”，新华网，2020年7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7/14/c_1126237988.htm

斯重要的政治、经贸和军事技术合作伙伴，俄不愿意卷入南海争端，因此俄在南海问题上不支持任何一方的领土要求；俄主张当事国遵守不使用武力原则，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俄认为将双边领土争端提交到国际和地区组织无助于找到可接受的解决方案。^①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对南海问题的策略有所变化，主要包括：更明确地反对将双边争端国际化，认为域外势力干涉南海问题的图谋只会适得其反；^②2016年9月俄罗斯与中国首次在南海举行“海上联合-2016”军事演习，这被外界视为俄在南海问题上给予中国政治支持。颇有趣味的是，2016年7月俄罗斯外交部在回答记者关于南海仲裁案裁决的提问时，表示俄不会卷入南海争端，不站在任何一边；^③而同年9月普京总统在杭州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表态，俄罗斯不介入南海岛争，但是支持中国不接受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的立场，理由是仲裁程序应当由当事双方启动，由于中国未付诸仲裁，因此该裁决是不公正的。^④实际上，无论是俄罗斯在南海问题上的策略变化，还是普京总统的上述表态，都只是与乌克兰危机后俄国际处境和世界观的变化有关，但是俄对南海问题政策立场的实质没有改变。俄罗斯需要同南海问题各方发展合作，其中包括与越南在中越争议海域已进行多年的油气开采合作，俄也主张南海航行自由。

（四）台湾问题

台湾作为中国的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台湾问题的实质，也是它与南海等国际问题的不同之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其延宕都与外部势力的干涉密不可分，其中主要是美国阻挠，也包括日本作祟等。

自国民党退据台湾至今，美国对台策略虽然因全球、东亚地区和中美关系形势变化而时有调整，但是基本政策是通过直接军事干涉和对台出售先进

① Василий Кашин.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проблемам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АТР. 17 июня 2016. <https://carnegie.ru/2016/06/17/ru-pub-63832>

② Брифинг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МИД России М.В.Захаровой. 14 июля 2016 года. https://www.mid.ru/web/guest/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354135#13

③ Там же.

④ Путин: Россия солидарна с КНР, не признавшей решение суда по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му морю. 5 сентября 2016 г. <https://tass.ru/politika/3595565>

武器等手段，极力维持台湾与大陆“不统不独”的现状，谋求“以台制华”的目的。中美建交之前，美国把台湾视为西太平洋岛屿“弧形防线”中的一环和“抵御国际共产主义扩张”的前沿阵地。^①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出于联华遏苏的考虑，美国对台湾政策明显收敛，但仍然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保持了美台“实质关系”。冷战结束后，中美联合遏制苏联的基础不复存在，同时中国崛起引起了美国的不安，美把台湾作为滞缓中国崛起和防止中国挑战美在亚洲霸权的战略“棋子”，为此甚至支持“台独”势力。由于中美两国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和中国坚决维护在台湾的利益，美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遵行“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但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成主要竞争者，美国在加大对中国经济和军事政治遏制力度的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也步步紧逼，包括炮制 2018 年的所谓《与台湾交往法》和 2020 年的所谓“台北法案”等，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

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政策，经历了由“解放”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转变。其基本内容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防止台湾“独立”；争取和平统一，但不放弃使用武力；“一国两制”等。^②就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台湾问题，反对美国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中国利用美苏争霸和调整中美关系等因素，通过与美国签署三个联合公报，促使美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三不”承诺。中国在三次台海危机（1954 年、1958 年、1996 年）中，向美国展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使其认识到台湾问题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从而能够主动约束“台独”越“轨”之举。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极力维持台海两岸军事“均势”，掌控岛内“统”“独”力量，不时对中国打“台湾牌”。中国政府敦促特朗普当局不得实施涉台法案，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否则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③

① 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40 页。

② 《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1993 年 8 月发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1993/Document/308013/308013.htm>；《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2000 年 2 月发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00/Document/307945/307945.htm>

③ “外交部敦促美方不得实施‘2019 年台北法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3/28/c_1125779498.htm

俄罗斯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政策立场。在 1992 年 9 月叶利钦总统签署的“俄罗斯与台湾关系总统令”中明确规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不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①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1998 年俄罗斯明确宣示对台湾的“四不”政策，即不支持“台独”，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立场，不支持台湾加入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②在 2000 年中俄北京宣言中，俄罗斯增加了“一不”表态：俄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③以上“五不”政策，就是俄罗斯对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至今为俄所遵行。俄罗斯对中美冲突持不介入立场，因此不愿意因为台湾问题而卷入可能的中美军事冲突。由此可见，俄罗斯也愿意维持台海现状。

在亚太地区层面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明显薄弱。俄罗斯在亚太地区安全方面能够影响中、美两国的政策举措，在经贸和能源领域对中国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产生有限的影响，此外别无所长。尽管如此，俄罗斯也没有弱小到可以忽略其在亚太地区影响的境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仍然将在维持亚太地区安全和战略稳定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结语

国际体系中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奠定了亚太地区中美俄关系的基调。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推行全球霸权战略，为此积极防范、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等地区大国；利用北约和欧盟东扩挤压俄在欧洲的地缘战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б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и Тайванем. 15 сентября 1992 г.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2010>. 俄罗斯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立场，见中俄两国历年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等双边关系文件，此处不一一列举。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联邦并与叶利钦总统非正式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1998 年 11 月，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7_679122/t5416.s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宣言》，2000 年 7 月 18 日，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1207_679122/t6787.shtml

略空间，巩固冷战胜利成果；2011年以后，转而重点遏制中国崛起，同时压制俄。美国的遏制政策，促使俄罗斯和中国接近，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抵制美单极霸权图谋，推动世界多极化。中俄两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随即向地区层面“外溢”，扩大到共同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等领域。

中、美、俄三国的亚太地区政策服从和服务于各自的全球战略或政策，鉴于美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中国和俄罗斯的亚太政策同时又受到美国对亚太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决定了其亚太战略目标在于维护美在该地区的霸权，为其世界霸权提供支撑。美国的这种亚太政策，使中国和俄罗斯不得不开展战略协作，在亚太地区共同应对美遏制。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由于俄罗斯渴望维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特别是集中精力在欧洲地区抵制北约东扩和阻止美向独联体国家渗透，因此，俄对亚太事务的关注和外交投入相对较少。

在亚太地区，虽然美国维持了主导地位，但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在安全和能源等领域也能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美国超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同盟体系及其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是其对亚太外交的优势。同时，美对区内国家推行“民主改造”，近年来奉行利己主义的经贸政策，煽动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立等，削弱了美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中国崛起虽然增加了其对亚太事务的影响力，但也引起了霸权国的遏制和邻近国家的疑惧，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时面临矛盾和挑战。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虽然不能同美国和中国并驾齐驱，但是在军事安全以及能源和军火出口等领域仍然占有一席之地，也有强烈的意愿在这个最有发展活力的地区保持重要的影响。就中美俄三角关系而言，中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和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日益扩大。随着美国建立亚太地区反导系统，准备在该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中俄在这些领域共同反制美国的战略协作会进一步深化。

亚太地区现有的安全格局还将存在相当长时间，未来将向均衡、多元复合的区域安全秩序演进。目前，亚太地区基于中美总体上合作，包括美国主导的亚太同盟体系、东盟主导的诸多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中俄战略协作、区域内其他双边和多边安全机制在内的亚太安全秩序仍然在发挥作用。未

来，随着中国崛起，特别是其军事实力的显著增强，其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亚太地区命运共同体外交的推进，以及中俄两国持续推动建立开放、平等的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亚太区域安全秩序将朝着均衡发展、多元复合的方向变革。这种地区安全机制有助于有效协调和综合解决亚太区域所有重大的安全问题，包括朝鲜核、半岛稳定、战略平衡、军事安全、军备控制等问题。同时，不排除亚太区域安全秩序朝中美两极化方向发展的可能。未来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构建的一个重大不确定因素，是美国能否超越“冷战思维”，接受中国和平崛起。

亚太地区经济格局将延续目前中国引领区域合作、多种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平行发展的态势。中国是大多数亚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持续崛起将进一步巩固其作为亚太国家主要经贸伙伴的地位，“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带给区内国家更多的福祉。中国积极推动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倡议等一体化机制，将获得程度不同的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同时，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东盟等参加的各种区域和次区域一体化机制平行地发展，既促进泛亚太区域以及东亚、中亚、南亚等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又导致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之间的竞争。

中美俄三角关系是影响亚太地区新秩序构建的最重要因素。在亚太快速发展和欧洲相对衰落的形势下，中、美、俄三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变革。

【Abstract】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among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situation and regional configuration in the Asian-Pacific. The Sino-U.S.-Russian triangle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as set the tone for their tr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U.S.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eventing and containing regional powers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hegemon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hina's Asia-Pacific policy has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from good-neighborly friendship and pragmatic

cooperation to actively shaping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is region. Due to the decline of its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s strategic focus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on Europe, Russia's Asia-Pacific policy includes ensuring the security of its eastern borders, developing trade, energy and military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 other Asia-Pacific countries, and integrating itself into the regional economy. As a result, its influences in the Asia-Pacific are limited. American containment and China's counter-containment have become the main axis of the Sino-U.S.-Russian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Asia-Pacific will evolve towards a balanced,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regional order.

【Key Word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figuration, Sino-U.S.-Russian Triangle, China's Asia-Pacific Policy, U.S. Asia-Pacific Policy, Russia's Asia-Pacific Policy

【Аннот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влияющим на ситуацию и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США и Россией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задал тон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 момента окончания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привержены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ю и сдерживанию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держав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своей гегемонии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ретерпела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ю от добрососедской дружбы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 активном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структур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и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общества с общим будущим. Из-за упадка сво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щи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развития на Европу,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ключающе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границы,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ого,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и интеграцию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ую 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интеграцию, ограничено.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и контрмеры со стороны США и Китая стали главной осью трёх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ША-Россия в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регионе. Структур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будет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в сторону сбалансированн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го и сложного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й регион, треугольник Китай-США-Росс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ит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欧亚国家转型研究

从“转型推手”到“政治疏离” ——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批判*

郦菁 张昕**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全球经历了全面复兴，苏联、东欧地区转型国家的相应实践成为激发此次复兴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回顾、总结苏东地区转型前后“市民社会”概念的起落、对此概念理解的演变以及市民社会组织本身形态和功能的变迁，说明苏东地区特殊的历史情境和转轨性质，使得基于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念在该地区的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非预期的结果。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动态张力、转型后市民社会的职业化与社会团结、“非公民性”市民社会的出现等三个层面的分析，我们描述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特定理论基础上的理想模型和理论想象在苏东转轨过程中面临的悖论和困境。尤其是苏东转型的特殊性为市民社会在该地区的发展注入了独特内涵：市民社会从民主化转型的革命推手，到转型后“日常政治”中表现出的政治疏离、被新自由主义和右翼保守力量俘获，进而成为社会分裂的诱因。

【关键词】“市民社会”理论 苏东转型 政治社会 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D85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105(31)

市民社会理论是近代西方政治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发明。在某种程度上，“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是一对互为基础的概念，其主要议题包

* 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 郦菁，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通讯作者：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教授。

括如何理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别、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公共价值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等。市民社会是近代西方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之后，“国家-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加以想象的理论产物，亦是信仰秩序受到极大挑战后，社会稳定的来源由外在的宗教转向社会内部而催生出来的新社会观念的基础。^①西欧历史上，因为中世纪经历、宗教基础以及自由城市的传统而生发出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及其制度基础。^②另外，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城市发展过程中，欧洲不断涌现的新社会主体促进了各种行业协会、自治组织的发展，冲击了由教会和国家主导的政治秩序，创造并拓展了一种“市民社会”的特殊公共空间和独特形态。相应地，在此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市民社会理论于17-19世纪达到高峰，包括洛克、孟德斯鸠、弗格森、休谟、托克维尔、黑格尔、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都提出了相对独立的市民社会理论，或者是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批判和重构。20世纪上半期，自由主义理念遭遇多重危机，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成为替代性的新潮流，市民社会理论也相应地由盛转衰。^③二战之后，在西方世界内部，国家在管理经济上的角色持续扩展，福利主义成为新的政治基础，市民社会理论没有得到可资利用的结构性契机。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市民社会话语得到了一次意外的复兴。这一时期全球层面正经历着多重重大范式变迁：经济层面是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化，政治层面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而社会层面的相应变化即市民社会重新成为社会的理想组织方式。这三个层面的新运动都与美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球霸权地位有密切关系，这些新运动也共同成为美国主导全球秩序的重要基石。复兴的市民社会叙事固然内部也不一致，但有一些重要的共同话语：强调社区的自治力量，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民社会才是民主的基础；认为市民社会能够重新带来基层的团结。这一时期美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在政治实践领域（尤其是美国的保守政治阵营）

① 有关绝对主义国家 (absolutist state)，参见[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查尔斯·泰勒提出，市民社会的概念起源于从中世纪早期以来有关社会的观念、教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主观权利观念、自治城市传统和中世纪世俗政体的二元性。参见 Charles Taylor, “Modes of Civil Society”, *Public Culture*, 1991, Vol.3, No.1, pp.95-118.

③ Adam B. Seligman,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开始频繁调用市民社会话语资源。其中，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学界和政界被不断标举，他所考察的 19 世纪 20 年代的美国市民社会也被标榜为美国的“黄金时代”。而有学者则称这一轮的复兴为“新托克维尔主义”，用以表明此一思潮其实既不是托克维尔思想的简单延续，也不是美国历史与现实的真实镜像。^①

市民社会从复兴到成为一种全球性话语和“政治正确”，不仅来源于美国作为全球体系中心国家自身经历的学术和政治变化，也得益于所谓“边缘”地区的转型实践。其中，苏联和东欧地区（以下简称“苏东地区”），尤其是东欧的转型经历，被调用作为市民社会成功反抗威权国家的明证。^②正由于波兰团结工会这样的组织，早在转型前十年就开始从地下活动走向公开，市民社会被认为是推翻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重要力量，而实际上，更为关键的长时段政治经济结构问题却被忽略了。苏东转型这一段历史在当代全球史话语中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用以强调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与独立市民社会如何互为表里，怎样促进了发展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话语在西方比在苏东本土有更多的听众，正如柏林墙的倒塌在西方媒体和文化中更具象征性一样。^③这种市民社会的话语不仅深刻形塑了苏东转型后的政治实践，也成为指导拉美、亚洲等其他南方国家市民社会和广义民主建构的典范。换言之，市民社会，或者说这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理想的复兴与全球化，是中心与边缘地区相互塑造、共同创造的结果。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初期，欧美国家普遍对于苏东市民社会的发展充满信心，并输出资金和人员来帮助该地区建设整个市民社会部门和各种社会组织。而苏东国家（尤其是东欧）本地的精英亦将此项摆脱威权统治

① Theda Skocpol, “The Tocqueville problem: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997, Vol.21, No.4, pp.455-479. 另见鄙著：“‘新托克维尔主义’：起源、话语与民主”，浙江大学工作论文，2020 年，其中有关于“新托克维尔主义”的详细综述。

② 如不另加说明，本文使用的“苏东地区”泛指原苏联、东欧等在冷战时期曾处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群体，有政治和地理的双重指向。

③ James Mark, Anna Saunders et al., “1989 after 1989: Remembering the End of State Socialism in East-Central Europe”, in Michal Kopeček and Piotr Wciślik, eds., *Thinking through Transition: Liberal Democracy, Authoritarian Pasts,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ast Central Europe after 1989*,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95-496.

和殖民羁绊之后的道德任务，并视为自身回归欧洲的必然选择。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西方世界对苏东市民社会的各种学术和公共批评开始积累；进入 21 世纪，由批评转变为失望。最近十年内，右翼政治与保守主义的兴起，使很多苏东国家进一步抛弃了自由民主的方案和对于自身欧洲性的想象，而市民社会也是被放弃的对象之一。

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念和实践，从一开始就与关于市民社会的新全球话语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其中很多问题正源于该地区从“转型革命”到“日常政治”过渡的诸多特性，而在中文语境里关于苏东转型的既有研究，通常聚焦在政治制度的转型上，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关注不多。^①正因为此，本文希望通过回顾、总结苏东地区转型前后市民社会组织结构与运行模式、与政治的关系和主导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迁，来说明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实践与市民社会理论之理想预期如何不同，出现了何种悖论和困境，从而质疑这种新全球性市民社会理论本身的普世性。文章首先对苏东地区转型的基本特征进行反思和再阐释，随后通过“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动态张力、转型后市民社会的职业化与社会团结、“非公民性”市民社会的出现三个部分来详加阐述。最后对市民社会如何“再理论化”提出若干建议。

一、苏东转型的再反思

苏东剧变是自二战后冷战秩序形成、六七十年代新社会运动兴起并改变欧亚大陆政治图景以来，“漫长的 20 世纪”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此后的五至十年，政治学领域曾有过“转型学”的热潮，尤其聚焦在该地区内部转轨表现的差异上。然而这类研究大都预设了苏东地区的某种共性，并依赖于一些在当时历史语境中看来确定无疑的假设，这种关于共性的假设包括：

(1) 民主化是反对派、市民社会和所有反极权、反威权力量联合斗争的必然政治选择。且民主化的制度选择是“自由民主”，而非“社会民主”，

^① 高歌：“中东欧政治转轨 30 年：对转轨进展的观察与思考”，《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2 期；杨友孙：“冷战结束后中东欧政体转轨及其得失”，《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尽管在很多苏东国家，新建或重建的社会民主党在转型后很快赢得了选举。

(2) 政治上的民主与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方案是相互不可分割的。民主化是“自由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的推论……是全球市场理性和扩张运动的必然且自然的产物”。^①

(3) 苏东国家政治与经济转型和民主化是兼具去帝国、去殖民性质的独立运动。而转型过后，苏东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应该、并且在现实中也确实迅速拥抱了全球化进程，新的世界主义取代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该地区政治的基调。

自 21 世纪初期开始，溢出这些基本议题的研究逐渐累积，对于这些预设的质疑和挑战也日益增多。如《1989：东欧的全球史》等研究全面总结了近期关于苏东转型的反思，及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框架变迁的重大影响。^② 这些反思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

首先，苏东地区民主化的方案并不是唯一且必然的政治选择。当时东欧政治转型参照的榜样是 20 世纪 70 年代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国通过精英协商实现的民主转型——多种政治力量（包括共产党在内）参与的新多党议会体制——这些国家也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肇始。当时东欧共产党人大都认为这是一条可以避免暴力冲突的转型道路，而西方政界也认为这一方案可以有效遏制暴力革命，使转型过程和平可控。但东欧国家学习、模仿南欧民主化模式的直接后果，是转型过程几乎完全由精英主导。即使在波兰，本应该代表工人的团结工会也是以“保卫工人委员会”的精英代表为主，来参与政治转型谈判的“圆桌会议”；转型后又是同一批精英控制了新政府，草根政治活动家与一般民众并没有充分介入转型方案的设计。^③ 尽管转轨后大多数东欧国家都经历了左右翼政治力量交替执政，但在决策过程中，依然是技术官僚主导着经济政策的设计。由此，作为对之前旧体制威权/极权主义的反

① Barry Gills, Joel Rocamora, “Low Intensity Democra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2, Vol.13, No.3, p.503.

② James Mark, Bogdan C. Iacob, Tobias Rupprecht, Ljubica Spaskovska,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比如在参加圆桌会议的 232 名代表中，有 195 名是知识分子。参见 Jacqueline Hayden, “Solidarity at 40: How The Union That Brought Down Communism Became a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lly”, August 28, 2020, <https://notesfrompoland.com/2020/08/28/solidarity-at-40-how-the-union-that-brought-down-communism-became-a-conservative-government-ally/>

抗，转型后新兴的选举政治赋予了民众形式上的政治权利，但却遮蔽了社会主义时期所关注的社会福利和经济正义。正如后文所示，这些问题之后会以不同的形式重返政治领域。

其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苏东地区民主化的政治方案实际上与同为自上而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方案捆绑在一起，相互提供了合法性，并加速了苏东地区（尤其是东欧和苏联波罗的海三国）重新融入欧洲市场和全球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进程。^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和成员资格设置了严苛的条件，迫使东欧主要国家进行紧缩调整和私有化改革。此前的研究对于经济转型的宏观绩效多有讨论，但经常被忽略的是，紧缩与调整的成本，在不同的转轨路径中基本上都是由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承担的。转型带来的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还包括：更容易遭受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参与西方市场竞争导致去工业化、城乡分割和失业上升；劳动力流向西欧导致本国人口急剧下降；贫富差距上升；文化创伤和对城市右翼精英的强烈不满。“民主带来经济繁荣”的命题，已经丧失了相当的合理性。

政治参与感的丧失与经济利益的被剥夺，都间接导致在转轨初期至今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苏东地区民族主义与极端保守思想的回潮。更深层的原因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东欧精英（尤其是掌握转型后政治权力的精英）的核心理念是，只有全面接受并推行和原有体制对立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才有可能彻底打败旧体制。因此，在批判苏联对东欧地区“殖民统治”的同时，当地精英又普遍接受和支持欧美，尤其是美国在该地区和国际上的霸权统治，尽管后者的政策可能违背了自由与平等的基本理念。^②现实中，在摆脱苏联霸权之后，东欧又不免面临另一重在西方政治经济框架和文明话语中的“再边缘化”。在转型期间被压抑的民族（民粹）主义，重新获得了政治支持，以抗衡来自欧洲和北美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① 在主流话语中，以西欧、北美代表的西方发展故事似乎印证了市场与民主的天然结合。当然，波兰的部分领导人一开始支持韩国式的威权主导经济改革方案，但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威权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韩国与拉美都逐渐实现了民主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欧转轨的参照系。

② 比如，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作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革命的领导人，都支持 2003 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James Mark et al.,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4.

internationalism)。在这样的政治话语中，作为自由国际主义推动者的欧洲或者西方，恰恰是在推行一种新殖民主义；而欧洲的后现代文化、性别关系的改变、对于各种性少数群体的政治包容和对于中东、北非移民的吸纳等变化，也促发东欧的保守力量重新抬头。由此，欧洲被认为背离了传统的“欧洲性”，而这些东欧、甚至欧亚地区的保守力量认为，恰恰是传统东欧社会、俄罗斯社会才代表了真正的欧洲性，并正在遭受西方世界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的侵蚀。近二十年来，多个右翼民粹政府和卡钦斯基、泽曼、欧尔班等领导人在东欧地区的出现，也是利用了这样的张力。进入 21 世纪，东欧的民粹力量和西欧的极端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已经建立了有力联系，试图共同推动所谓“重新发现欧洲”运动：以民族主义为底色的右翼政党（如波兰的 PiS、匈牙利的 Fidesz）^①及其支持者，在传统的自由主义话语之外，开始重新想象、构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归属，以“帮助欧洲找回欧洲性”的说辞，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上述对于苏东转型的再反思与再认识，可以为进一步剖析市民社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话语廓清历史与现实政治背景。反之，苏东国家市民社会的变迁和转型后的实践，亦是理解苏东转型性质的重要参照。

概而言之，一种史观认为东欧市民社会传统其实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早期，之后其发展被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式共产主义所中断，因此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政治转型必须“重建”市民社会。但实际上，除却捷克、波兰等例外，很多东欧国家在二战前的市民社会并不发达。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在美苏之间“缓和”（Détente）进程与欧洲赫尔辛基机制的影响下，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有一个在苏东地区逐渐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的过程。当时的异见者试图从“非政治化的政治”中发现社会的自组织力量。因此，环保运动、环保议题的社会组织是这一时期市民社会的典型，如保加利亚的“保护鲁塞生态公民委员会”和后来的“生态公开性”组织、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的反核环保运动、东德的“环境图书馆”等。类似的还有各种性别平权

^① PiS 是波兰保守派政党“法律与公正党”的缩写，2005 年以来该党是波兰两大政党之一，持民族保守主义、软性欧洲怀疑主义立场。Fidesz 是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青民盟）的简称，持极右翼民族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立场；1998-2002 年和 2010 年至今，该党是匈牙利的执政党。

运动、反战与和平运动、重建民族文化组织等。^①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代表特定社会群体（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进一步兴起，如最早起源于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团结工会、乌克兰利沃夫-沃伦煤田工人委员会等。其中很多组织迅速扩展了其代表性，如团结工会在 1981 年即自称有一千万成员，包括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各个阶层。^②当时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三百万成员中也有近三分之一参与团结工会，因此团结工会可以用“我们是人民”的身份发言^③，其政治后果留待下文详述。

直言之，转型之前的苏东国家市民社会，主要以非政治场域为活动空间、以成员利益型组织和运动为主，当然也包括政治上更为激进的地下反对派和更具公益性并以推进公民权和人权为宗旨的组织与运动。^④在当时社会生活泛政治化、国家施行全能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市民社会的雏形有一个共同特征：实践中的高度政治化。在后来的转型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组织和运动深刻卷入了政治进程，其中颇有一些在此后的议会民主政体中转型为政党，或参与新的政治联盟，而其领导人成为第一轮民主制度建设的中坚力量，之后担任执政党领导人或者国家领导人。再以团结工会为例，在圆桌会议后，团结工会于 1989-1993 年间组阁掌握了政权，1997 年再以“团结工会选举运动”为组织基础执掌政权。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全苏劳联”所属的各独立工会，也一度成为战斗性很强的政治化组织（后来逐渐淡出了政治）。^⑤成立于 1989 年的“乌克兰人民运动”组织（“鲁赫”），曾经是苏联后期乌克兰最大的政治性社会组织，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中右翼政党“乌克兰人民党”

① 比如 WiP 是 1985 年在波兰成立的一个和平运动组织，最初旨在唤醒人们反对强制兵役，之后逐渐拓展到更广谱的和平议题，类似还有匈牙利的“和平对话组织”、斯洛文尼亚的“和平文化人民”。重建民族文化运动包括由基辅学者和作家组成的“乌克兰文化俱乐部”、波兰的“华沙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等。

② Maciej Sandecki, Marek Waś, “Duda za Śniadka?” *Gazeta Wyborcza*, 24 August, 2010.

③ 景凯旋：“‘我们就是人民’：观念与东欧转型”，《东方历史评论》，2018 年。

④ 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在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橙色选择”运动（波兰语：Pomarańczowa Alternatywa；英语：The Orange Alternative），最初是以街头戏剧手段（嘲笑官方象征和仪式的表演）进行政治抗议的一种形式。参见 Bronisław Misztal,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lidarity: One Movement, Two Interpretations-The Orange Alternative Movement in Polan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2, Vol.43, No.1, pp.55-78.

⑤ 这部分内容参见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年（第一版），第六章。

的发起者。而保加利亚 1988 年成立的以生态议题为主要关注点的“生态公开性”组织，日后参与组建了“民主力量联盟”政党，成为执政力量的一部分。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市民社会理念想象中的政治和社会空间能否成功出现，能否拥有挑战旧有权力的地位，既是转型的目标，也是衡量转型成功与否的指标。

在这种新政治语境和转型革命情境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整个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发展迅猛，成为市民社会全球性复兴的“明证”，被认为与拉美、非洲、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和市民社会建设相呼应。有些学者甚至将此过程称之为“全球性的社会组织革命”（global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认为其重要性堪与 19 世纪民族国家的兴起相比。^①尽管如此，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并不能说明社会组织的性质，也无法探究市民社会作为一种被极度理想化的概念与其实践之间的张力。那么，苏东地区市民社会在转型后，以及在欧美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范式遭遇合法性危机的情况下（2008 年以来），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这与西方（美国）学术界建构的市民社会理想形态如何背离？其中哪些层面被理论化，而哪些层面又被遮蔽了？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这些问题。

二、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

探讨市民社会理论的政治内核，有多种可能的切入方式。^②为了理解市民社会理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复兴，本文首先从其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关系的视角来加以讨论。查尔斯·泰勒在《市民社会的模式》一文中指出，市民社会有两大理论传统，其一认为市民社会应独立于政治社会，这源自洛克“社会先于国家”的“信托说”；另一个重要的潜流是孟德斯鸠，认为“（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形成一个非政治的社会领域，而在于促成了政治体系权力多元化的基础。最为相关的并不是（市民社会）有国家之外的生命，

^① Lester Salamon, Wojciech Sokolowski, Regina List, “Global Civil Society: An Overview - The Johns Hopkins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 2003, <http://www.jhu.edu/cnp/research/index.html>

^② Jean Cohen,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IT Press, 1994, pp.1-29.

而是如何与政治体系互动融合，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①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美国学界和政界，仅前一种理论传统被普遍调用。在这种新话语中，市民社会成为国家威权的对抗者，强调只有相对于政治社会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威权和不公正现象的对抗性场域，市民社会由此也成为民主巩固的保障。比如，美国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就很喜欢引用托克维尔对于 19 世纪美国市民社会“黄金时代”的描述，以反对民主党的大政府计划和福利政策，甚至一度使托克维尔主义成为美国的某种“国民宗教”。^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还组建了“千灯基金会”和“千灯计划”，以类似“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比喻，来支持美国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精神的发展。^③但实际上，泰勒认为托克维尔更多是孟德斯鸠范式的继承者。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转型后的前共产主义国家，特别是东欧地区，被迅速织入这一话语，成为市民社会反抗威权国家的典型。那么，这一地区在推翻威权政府后，其市民社会确有独立而繁荣的发展吗？它们和年轻的民主政治之间的现实关系又如何呢？

如上文所述，转型前期苏东地区的新兴社会组织普遍具有“政治化”的色彩，而在转型后的最初阶段，其中颇有一部分组织和运动领袖掌握了国家政权，或至少进入了制度化的政治社会。这种高度政治化带来的广泛参与和普遍的代表性，是苏东地区市民社会能够推进民主转型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转型成功后，掌握政权的精英、西方国际组织和主要的霸权国家，并不愿意看到转型期市民社会的激进政治和草根参与以某种方式延续。他们达成的新共识恰是“去激进化”和“去政治化”，尤其要极力避免类似罗马尼亚的暴力斗争局面，因为草根民众被广泛调动起来之后的激进参与，或者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具有不可控的本质；这种不可控性无法用治理框架轻易驯服，也无助于建构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和推行紧缩改革方案。^④因此，政治斗争的焦点必然从转型经济正义与社会保障，转向形式化的个人权利，而政

① Charles Taylor, “Modes of Civil Society”, p.114.

② Alexis de Tocqueville, John Wilsey, eds., *Democracy in America: A New Abridgment for Students*, Lexham Press, 2016, p.23.

③ 参见千灯机构的官网：<https://www.pointsoflight.org/about-us/>

④ James Mark et al.,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p.88, 91.

治的中介力量也自然从社运活动家转向经济学家、宪政专家和技术官僚。

如此“去政治化”的新图景，改变了苏东市民社会发展初期的社会基础。一些成功转型为政党的组织，比如上述的波兰团结工会，必然会因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不同取向而严重分裂。早在圆桌会议之前，团结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并不希望该组织成为执政党，而另一名团结工会早年的女性领袖安娜·瓦连季诺维奇（Anna Walentynowicz）甚至比瓦文萨更加反对政党化，希望保持该组织的工会性质，还严厉批评瓦文萨对此态度不够坚定。^①但这种自我限制式的政治选择，在高度政治化、政治机会涌现的转型期间很难达成，而其后果只有在这些组织执政后才逐渐显现。从第一次执政开始，团结工会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就控制了政府，而基层工人活动家则主要集中在议会。前者基本抛弃了早期工会的社会网络，而后者仍然时常发动市民社会罢工和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以保护转型过程中工人的权利。持续的分裂使得团结工会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和公共空间。^②另一些社会组织在进入政治社会后则变更了领袖人物和纲领。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在赢得政权之后，“布拉格之春”时期的捷共第一书记、天鹅绒革命时复出的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并没有获得总统提名，而是被更为坚决地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自由民主与市场方案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取而代之。这标志着 1968 年的政治遗产、社会主义民主和市民社会参与民主的传统，并没有在 1989 年转型之后被继承。^③

还有一些国家的草根组织在 1989 年之后的政治场域中被边缘化。东德的“新论坛”（Neues Forum）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提倡直接的公民民主参与而非议会制的自由民主，同时反对加入西德，这一 1989 年前在东德最有影响力的市民社会组织，在随后的大选中基本丧失了影响力。^④还有捷克

① Jacqueline Hayden, “Solidarity at 40: How The Union That Brought Down Communism Became a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lly”.

② 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第 318 页；David Ost,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James Krapfl, *Revolution with a Human Face: Politics,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Czechoslovakia, 1989–199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99.

④ Gareth Dale, *The East German Revolution of 1989 and Popular Protest in East German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7.

1999年成立的松散知识分子组织“冲击99”(Impulse 99),后来演变为要求政治家离开政坛的“谢谢你,是时候离开了”(Thank You, Time To Go)的社会运动,其宗旨是,“如果内阁和议会忙于政治性的非政治(工作),那么公民们只能来从事非政治的政治(工作)。”^①然而,这种与政治社会决裂的态度,以及无法提出具体政治议程的局面,最终也导致该组织本身的分裂和消亡。^②

在特定条件下,转型后的市民社会还与政治社会发生了激烈对抗,出现了“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的现象。罗马尼亚日乌河谷煤田区的“罗马尼亚矿工工会”与团结工会等组织不尽相同,一直坚持政治化原则,即使转型后也没有放弃激进的游行抗议,甚至还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因为与左右翼政府都缺乏妥善沟通与协商的制度化渠道,最终也不得不接受煤矿关闭、组织式微的结果。^③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矿工组织、克罗地亚的退伍军人运动等,也是类似的例子。^④

一个意涵更为丰富的反抗运动则是所谓的“布拉格之秋”。2000年9月,全球多个跨国市民社会组织联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布拉格峰会期间进行抗议,反对这两家精英组织在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和债务议题上的立场。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捷克总统哈维尔、执政的社民党政府以及捷克最大的工会组织(CMKOS)都支持全球化,而捷克一个由多个社会组织联合组成的“反对经济全球化动议”(捷克语首字母缩写“Inpeg”)与独立工会联合会(捷克语首字母缩写“ASO”)则参与组织了这场反对运动。^⑤

① 原文是“If the cabinet and the parliament engage in political non-politics(...), then the citizens have to engage in non-political politics”, in Petr Kopecky,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Taylor & Francis, 2005, p.136.

② Vladimíra Dvořáková, “Civil society in the Czech Republic: ‘Impulse 99’ and ‘Thank You, Time To Go’”, in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p.130-151.

③ 金雁、秦晖:《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第314页。

④ Vlad Mykhnenko, “State, society and protest under post-communism: Ukrainian miners and their defeat”, in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pp.89-109; Sharon Fisher,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roatia: the war veterans’ movement”, in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pp.70-88.

⑤ 有关报道见“Prague IMF summit ends early”, BBC News, 27 September, 2000,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944341.stm>; “Who are the Prague protesters?” BBC News, 26 September, 2000, <http://news.bbc.co.uk/2/hi/europe/926614.stm>

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至少说明苏东市民社会进入新千年后的两个重要变化：一是不再绝对支持转型精英的民主纲领和新自由主义政策，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转而“再政治化”；二是开始调用全球市民社会的力量，来实践新形势下的社会抗争。^①

与“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钟摆运动并行的，是苏东市民社会参与率的大幅下降。“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缩写WVS）1995—1997年——即苏东转型之后的第一轮——民调数据显示：虽然在转型之后，后共产主义国家社会组织的绝对数量提高了，但是公民的参与率相对处于较低水平，人均参与组织的数量为0.91个，不仅远低于民主巩固的国家（2.39个），也低于其他后威权国家（1.82个）。并且，在WVS调查的九类组织当中，除了工会以外，苏东国家内其他类型组织的成员数量均绝对小于前述的另两类国家。^②而WVS从1989到2003年三波调查的完整数据进一步显示：调查中所有国家的人均参与组织数为1.04个，民主巩固的国家为1.33个，非民主国家为0.85个，而后共产主义国家只有0.56个，是所有类别中最低的。^③甚至有学者通过定量研究说明，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中民主化程度较低的，公民的社会组织参与率反而相对较高，比如白俄罗斯。^④而如果用市民社会部门的正式就业来衡量的话，结果也类似。比如在2001年，东欧这一部门只吸收了2%的劳动力人口，相比之下美国高达7.8%，德国、法国也在5%左右。^⑤

① 参加该运动的捷克以外的组织包括：“巴西失地运动”“哥伦比亚黑人社区过程”“孟加拉失地女性农民联盟”等。这是国际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反全球化运动之一。

② Marc Morjé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62-73. “世界价值观调查”是持续多年的多轮调查，每轮调查覆盖的国家和国家数目不一样，1995—1997年这一轮一共包含了31个国家，其中10个后威权国家，13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具体信息可见“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网站：<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wvs.jsp>

③ Nikolay Valkov, “Membership i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Democratic Performance: Europea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9, Vol.42, No.1, pp.1-21.

④ Derek S. Hutcheson, Elena A. Korosteleva,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post-Soviet politic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2006, Vol.4, No.1, pp.23-46.

⑤ Tsveta Petrova, Sidney Tarrow, “Transactional and Participatory Activism 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Polity: The Puzzle of East-Central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7, Vol.40, No.1, p.76.

当然，用个体层面的参与性数据来衡量市民社会的深度与密度，显得极为单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对欧美之外地区部分国家的市民社会曾做过“可持续性”的指数评估，通过对法律环境、组织能力、财政能力和政治游说四个方面的测量，来综合刻画一个国家宏观层面的市民社会组织程度：指数数值越小，说明市民社会组织可持续性越高。以最近的 2018 年数据为例，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平均得分是 3.30，亚洲是 4.27，中东与北非地区为 4.96，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为 4.73，拉美为 4.2。而且，从 1998 年以来，苏东地区国家该数值一直在缓慢下降。^①虽然中东欧和欧亚国家看起来是表现最好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指标中的变量是美国国家机构和相关智库选择的，尤其赋予“游说能力”很大的权重，但本土参与之类的行为并没有给予权重。

类似地，佩特洛娃与塔罗利用布达佩斯的个案研究和上述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数据试图说明：市民社会的活跃与政治能动不仅体现在个体参与性，还体现在所谓的“交易/中介性的行动主义（transactional activism）”，即市民社会组织作为政治游说力量与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联系。^②另一研究也声称，中东欧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与游说在所有非盈利活动中的占比，是西方的两倍，前者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游说活动中。^③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文献指出，东欧社会组织的游说能力和政治联系并没有那么强，更常见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交流的旧机制崩溃，但是仍然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市民社会代表的公共需求往往被政治社会内的政党有意忽略，前者与官僚部门的摩擦也从未停息，这也反过来打击了普通民众的积极性。^④因此，即使个别案例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也并不能证实东欧地区民众通过市民组织部门实现了普遍而有效的参与，而反过来恰恰说明其市民社会的核心是精英网

① 不同地区包括的国家和各国具体数据参见<https://www.fhi360.org/resource/civil-society-organization-sustainability-index-fact-sheets>。需要说明的是，拉美地区数据只包括墨西哥一个国家。

② Tsveta Petrova, Sidney Tarrow, “Transactional and Participatory Activism in the Emerging European Polity: The Puzzle of East-Central Europe”, pp.74-94.

③ Stefan Toepler, Lester M. Salamon, “NGO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 empirical overview”,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2003, Vol.37, No.3, pp.365-378.

④ Marlies Glasius, David Lewis, Hakan Seckinelgin, eds., *Exploring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Routledge, 2004.

络，并非大众参与。概言之，苏东地区转型之后公民参与下降与民主转型之前的期待和理论都背道而驰，以至于不同的学者或者称之为“虚弱的市民社会”，或者认为这是一个“后共产社会最重要的悖论”，称之为“市民社会僵局”。^①

如果把这些表征放在一起看，苏东地区的市民社会在转型和民主化的历史情境之中，始终处于“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钟摆运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无法达成相对稳定的权力关系。两者之间缺乏孟德斯鸠意义上的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的制度渠道，虽然存在作为政治交易的精英网络，但缺乏广泛而实质性的大众参与。其成因，部分来源于转型前市民社会政治形象留下的重要遗产。如波兰圆桌谈判时的两方即分别带上“党/国”和“社会”的标签，而波兰天主教会作为谈判的中介人和调停者也使用了这样严格两分对立的话语。后来成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提出的“平行政治”（parallel polis）概念，就是主张市民社会独立于、平行于政治社会。^②类似地，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George Konrád）提倡，在冷战格局下，个体只有在“反政治”（antipolitics）状态下才能找到自由，比如投入宗教、文化、经济和职业组织之中去。^③这些东欧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政治上的成功，改变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政治想象，进一步把这种“两分法”的政治观制度化。

另一方面，恰恰也是因为新近建构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精英与本土精英的一种合谋，正如上节所述，把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方案都排除在外，也把市民社会的各种政治能量和诉求，比如大众参与的愿望（走向极端当然就是民粹主义）、对于社会福利的期待，还有下文将详解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以反激进、反民粹的名义，全部压制在正式政治场域之外。然而这种政治能量不会凭空消失，只会使市民社会在内爆与对政治的冷漠之间徘徊，很难找到平衡点。这些历史因素的辐辏，使得主张国家与社会

① Michael Magner, “Stalemate in Civil Society: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in Poland and the Legacy of Socialism”, Oficyna Wydawnicza ASPRA-JR, Warszawa, 2003.

②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John Keane, ed.,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 Eastern Europe*, London: Hutchinson, 1985.

③ George Konrád, Richard E. Allen, trans., *Antipolitics: An Essay*, Boston: Harcourt, 1984; Michael Walzer,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A Path to Social Reconstruction”, *Dissent*, 1991, Vol.38, p.300.

零和博弈关系的洛克范式占了上风，而孟德斯鸠的理论模型，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如葛兰西主义）被遮蔽。换言之，就是所谓的“对抗型”市民社会理论模型替代了“民主型”的市民社会范式。^①实证上，对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早期研究也往往聚焦在前一类直接挑战旧政权的、“道德性的市民社会”（moral civil society）组织，但是针对后一类“日常政治”中的市民社会则缺少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因此对于日后苏东地区市民社会发展前景的判断有所失焦。^②

三、职业化与社会团结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争论之外，市民社会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强调市民社会的自发性，认为通过“自愿结社主义”可达到社会团结。在托克维尔眼中，一个缺乏贵族政治领导、以一两千人为限、分散聚居的社会（美国），“全体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如不学会自动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如果他们根本没有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则文明本身就要受到威胁。”^③因此，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主是因其“结社的爱好和习惯”，并以独特的地理条件、清教的道德基础、地方教会的组织方式、乡镇的自治传统、孕育公共精神与尊重身份平等的民情等为其可靠的基石，而不是法国式革命的结果，更不是来自外部的输入。当然，这一理想图景从来不是对一个半世纪以来美国市民社会现实的写照。而且，美国市民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了“职业化”的重大转型：因“新社会运动”带来的议题变迁、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组织筹款技术改变等原因，美国社会组织转而由拥有工商管理硕士（MBA）等专

①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23; Marc Morjé Howard, *The Weaknes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Jean Cohen,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pp.59-69.

② 对俄罗斯市民社会的研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比如 Alfred Evans, “Introduction: Civil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2, Vol.45, No.3, p.217; Elena Chebankova, “Competing Ideologies of Russia’s Civil Society”, *Europe-Asia Studies*, 2015, Vol.67, No.2, p.245. 也都是集中在第一类市民社会组织上。

③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698页。

业学历的精英加以管理，往往只在华盛顿设全国性的办公室，而实际已经丧失了地方参与的基础，并逐渐官僚化。^①美国共和党及与其相关的政治力量想重建市民社会的地方基础，但影响重大的各地茶党组织，很多无非是共和党输送的资源，被称为“人造草皮组织”。^②那么，苏东地区的市民社会部门在转型后是否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自由民主式转型道路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之后，欧美的基金会、政府机构和国际组织，为苏东、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几个重点地区的社会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和人员援助，成为欧美国家外交政策和所谓“民主推进”“民主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其中，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对东欧的援助尤其多。1989-1994年间，该机构每年在东欧的投入大约 3.6 亿美元，涵盖经济重组、贸易投资、商业发展以及包括市民社会在内的民主建设。此外还有得到美国政府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社会行动与革新动议”（Social Action and Renewal）、“东西女性网络”（Network for East West Women）、“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s Board），也参与了对苏东国家社会领域的各种资助、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等。私人基金会则包括索罗斯基金、福特基金和麦克阿瑟基金等。^④2004 年波兰等 10 个中东欧国家正式加入欧盟后，美国对东欧地区社会组织的资金供应锐减。

在欧洲方面，由欧盟提供资金的法尔计划（PHARE Programme）旨在援助位于中欧和东欧的申请国，协助其加入欧盟的准备工作，其中也包括对这些国家市民社会领域各种社会组织的资助。^⑤由于欧洲议会对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设定了民主标准要求，1990-1996 年间，欧盟提供给申请国经费总预

① 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in Theda Skocpol and Morris 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1999, pp.461-509.

② Theda Skocpol,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Michael Cox, John Ikenberry, Takashi Inoguchi, eds., *American Democracy Promotion: Impulses, Strategies, and Impac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④ Sarah E. Mendelson,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A Critical Look at Building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and Euras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12; James Mark et al.,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137.

⑤ “法尔”（Phare）在法语里是“灯塔”的意思。

算中的1%被规定用于这些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2000年以后，欧盟进一步将“市民社会”引入针对部分原苏联国家推行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The Eastern Partnership, EaP)中，实质上把这些国家内部市民社会的发育同其加入欧盟的前景直接联系起来。2009年，“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正式引入“市民社会”，将其作为欧盟和东部邻国关系中的一个新行为主体，作为东部伙伴国家未来进入欧盟、接受欧盟价值的一个重要基础。^①欧洲议会在关于东部伙伴关系政策的评估报告中，也强调了支持市民社会在欧盟对东部伙伴关系国家援助支出上的重要性。^②

外部援助当然有积极的作用。比如上文所述，转型前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得益于丰富的外部启动资金而在短期内数量猛增，当地市民社会的组织精英也因外部资金支持而加速融入全球市民社会的网络。即便是这些组织获得最低限度的发展，也可以帮助官方和本地社会提升对市民社会组织的认可度，接纳它们为合法的社会主体。^③然而，更多的文献指出，外部援助的政策效果至多是“祸福参半”，产生了诸多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职业化、与地方联系减弱、议题的去本土化、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矛盾加剧，以及地方社会组织的原子化和去政治化。

首先是职业化问题带来的人员构成、训练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在苏东地区转型早期，美国和英国的社会运动积极分子与市民社会组织，最先前往该地区参与建设当地的市民社会组织 and 民主制度，但他们对当地政治状况所知甚少，不免把自己的组织模式复制到当地。在市民社会原有基础较好的波兰、匈牙利，以性别议题为主的社会组织也依靠类似机制，培养了一批可以嵌入国际市民社会网络的当地专业人士，这些人替代了原有的运动分子，但与自身社会的联系实质性地弱化了。^④在哈萨克斯坦等原有市民社会基础较弱的国家，在环保领域，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外部组织派出专业人士帮助当地

① Aliaksandr Charniakovich, “Levers for change: the EU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Eastern neighbourhood”, Policy Brief, FRIDE, 2013, No. 154, pp.1-5.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n the review of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2002(INI), 2015.

③ Sarah E. Mendelson,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A Critical Look at Building Democracy in Eastern Europe and Eurasia*, p.19.

④ Patrice C. McMahon, “International Actors and Women’s NGOs in Poland and Hungary”, in Sarah E. Mendelson and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pp.29-53.

组织起草环保法草案，并推动特定的环境监管体制。^①在此过程中，受外部资源培育而崛起的这些组织的本土管理者，很快成为一批拥有国际资源的当地精英。他们大多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接受培训，而当时的培训并不强调在本地基层社区内寻找筹款机会，更多是学习如何在国外捐助者要求的规格体系内填写申请、召开有效的新闻发布会、如何游说本国议会等内容，但对于怎样与基层社区联系、如何动员基层民众支持，则少有涉及。这类培训达到的目标更多是组织自身发展的机会与个人职业经历的完善。比如一位匈牙利环保主义者就自称为“绿色飞机一族”（green jet set），意即其主要工作是参加国际会议、与国际组织协商沟通，而非扎根社区。^②这样的特征与诸如印度市民社会当中出现的一种“发展职业”（development profession）非常相似：这个职业阶层悬浮于民族国家政治与其社会网络之外，他们和本地社会之间只有“治理”，而无政治，而市民社会的运营者与管理者也更多地成为新兴的全球中产阶级职业群体的一分子。^③

其次，除市民社会组织人员构成变化之外，外来资金的牵制也是市民社会无法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常见的现象是，“大多数的市民社会援助项目成为地方精英争食用的食槽”^④，因而新兴的社会组织必然更为关注出资方的选择与考核标准，并在实践议题上向这方面靠拢，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当地成员、回应当地社会的需求、开辟本土的资金来源。比如对捷克环保领域市民社会组织的研究显示，由外部基金会主导的对捷克社会组织的评价标准主要集中在：现存组织的数量、代表利益的多样性和广度、组织嵌入公共政策过程的程度，以及组织内部职业化、外部（在媒体、政策过程中）的可见度高低等。^⑤相应地，在这类评价体系和资助原则中，对社会组织与

① Erika Weinthal, Pauline Jones Luong, “Environmental NGOs in Kazakhstan: Democratic Goals and Nondemocratic Outcomes”, in Sarah E. Mendelson and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pp.152-176.

② Janine Wedel, *Collision and Collusion: The Strange Case of Western Aid to Eastern Europe*,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2001, p.135.

③ Rob Jenkins, “Mistaking ‘Governance’ for ‘Politics’: Foreign Aid, Democra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④ Sarah E. Mendelson,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p.6.

⑤ Adam Fagan, “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Democratization*, 2005, Vol.12, No.4, pp.528-547.

本地基层的关联并不重视。当然，外部的捐助人会尝试采用不同的策略来培育市民社会，但受助组织也会策略性地选择汇报成功的故事，隐瞒失败的问题，这也使得评价机制越来越固化，并日益脱离本土社会。

第三，转型之后，苏东地区社会组织的议题也发生了重大转变。环保运动在转型前的苏东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关注当地社会的具体问题，比如建立水坝、开矿、核能源等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风险。但是民主化转型之后，这些组织关注的议题转移到保护生态多样性、加强环境教育等，往往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在哈萨克斯坦，这些新议题成了主流，而最为紧迫的清洁水源问题却一直得不到关注和解决。^①上述新议题显然符合西方、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的趣味，也是美国社会组织动员成员邮寄、捐赠和网上捐款的主要手段。^②苏东地区的社会组织与美国的社会组织在接受捐赠的方式、受资助的对象、捐赠者的组织目标、社会组织本身的议题和实践策略等方面都在趋同。

在这种情况下建构的市民社会，甚至可能会加剧政治场域的矛盾。国际援助的介入，使得政治行动主体增加了，国际组织、国际出资人、外国政府（主要是欧美国家）、当地政府和当地新建的社会组织之间，产生了更为复杂的博弈和利益纠葛。在环保领域，国际石油大公司往往是利益相对独立的重要一方。在一些例子中，社会组织成为国际力量形塑国内政策的重要工具。比如捷克在转型初期，原有的环保网络和社会组织在政治场域基本被边缘化了，而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一批组织皆有国际背景，但基本放弃了激进行动的目标。当社会民主党组建的政府面临欧盟压力要推进新的环保立法时，必然需要邀请由专业人士运行的、以政策参与为导向的社会组织来起草法案，而后者更倾向于站在国际组织和欧盟的立场上说话，与国内希望达成环保与经济发展共赢的目标相冲突。^③在另一些例子中，市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比如在波兰，转型前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的

① Erika Weinthal, Pauline Jones Luong, “Environmental NGOs in Kazakhstan: Democratic Goals and Nondemocratic Outcomes”.

② Theda Skocpol, “Advocates without Members: The Recen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ivic Life”.

③ Adam Fagan, “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p.534.

结构和记忆，导致依靠外国和国际组织资助的社会组织与管理外援的波兰外交部之间严重对抗，造成行政机构与社会组织二元对立关系的固化。^①

直言之，苏东地区在转型之后也发生了社会组织的职业化。市民社会的专业人士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性的“发展职业”，孤悬于本土社会之外，社会组织并没有成为社会团结、自愿结社的重要场域。当然，职业化的原因与美国不尽相同，一方面是该地区转型后一度高度依赖欧美援助，导致社会组织在短时间内重新洗牌，另一方面是欧美国家试图把该地区社会组织从培育集体行动动员力，逐渐转向提供社会服务的功能。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去激进化自由民主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牙利哲学家和社会行动家雅诺什·基斯（Janos Kis）曾这样评论：“他们答应给我们市民社会，但却留给我们成千个非政府组织！”^②类似的评价还有东欧普遍出现的“有非政府组织、无市民社会”的现象；^③在亚美尼亚的市民社会部门，“将民主变为一个个项目，将‘市民社会’转为非政府组织”；^④而在俄罗斯，干脆就是只存在于报告和会议室里的“虚拟市民社会”。^⑤这些不同评价共同的言外之意是：市民社会的组织外壳已然建立，但并不能促进社会内部团结，也不依赖于“人民力量”。这些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与本土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分离”^⑥，在俄罗斯至多不过是“购买了公民参与”。^⑦因此可以说，苏东地区转型后的市民社会实践，总体上背离了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对于通过自我组织、促进社会团结的理想憧憬。

① Elzbieta Drażkiewicz-Grodzicka, “‘State Bureaucrats’ and ‘Those NGO People’: Promoting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Hindering the Stat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016, Vol.36, No.4, pp.341-362.

② 转引自 Elzbieta Drażkiewicz-Grodzicka, “‘State Bureaucrats’...”, p.346.

③ Adam Fagan, “Taking Stock of Civil-Society Development...”, pp.528-547.

④ Armine Ishkanian, *Democracy Build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Post-Soviet Armenia*, Taylor & Francis, 2008, p.56.

⑤ Sarah L. Henderson, “Russia’s virtual civil society: foreign aid and civic develop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SA 97th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2000.

⑥ Fiona B. Adamson,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Assistance In Uzbekistan and Kyrgyzstan: Building Civil Society from the Outside?” in Sarah E. Mendelson and John K. Glenn, eds.,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NGOs...*, pp.177-206.

⑦ Sarah L. Henderson, “Selling Civil Society: Western Aid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ector in Russ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002, Vol.35, No.2, p.48.

四、右翼保守主义的回归：非公民性的市民社会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中,还有一种理想化的倾向认为,市民社会高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繁荣能促进社会多元化、民主和进步,因而具有道德上的领导权,而政治社会则由威权和霸权的逻辑主导。换言之,市民社会总是具有“公民性的”(civic),而不是“非公民性的”(uncivic)的特质。当代市民社会和民主化研究的早期文献,曾列举出市民社会之于民主制度的十项功能,包括:平衡和监督国家权力、加强政治参与、培育宽容妥协等民主制度的基本品格、塑造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渠道(特别是被正式政治制度所排斥的群体)、促进社会利益的多元组合并防止政治竞争极化、训练和培养政治人才、监督公平选举、促进信息和理念的流动、形成支持经济改革的联盟,以及最终增强国家问责制度的能力。^①而提出市民社会内部团结来源于社会资本积累的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也假设孕育社会资本的的网络是一种横向的联系,而非纵向的科层结构,所以能促进平等的社会交往,不会导向威权、胁迫和暴力。^②但是对苏东国家来说,这一话语的起点显然是一种狭义的市民社会定义,而不能被治理和控制的、与民主无关的、黑暗又暗潮汹涌的那部分广义的市民社会,显然被排除在外了,而后者也许才是这一地区市民社会的原生力量与真正代表。^③

这部分市民社会的重新上升,与该地区转型前后政治情境的变化高度相关。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全球性的右翼保守主义和民粹-民族主义的回潮: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到 21 世纪初普遍成为各国重要的政治力量,甚至夺取了政权。再以民主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波兰团结工会为例。在第一次执政失败之后,团结工会的主要票仓已经逐渐从工人转向右翼议题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这一方面是由于团结工会在苏东转型的自由民主框架中,必然会放弃阶级话语,不再推动以“阶级裂痕”(class cleavage)为基

①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4, Vol.5, No.3, pp.4-17.

②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2000.

③ Cas Mudde, "Civil societ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lessons from the 'dark side'", in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p.159.

础的政治方案，取而代之的是以种族、族群、宗教等“社会裂痕”为基础的政治。^①另一方面的原因则要回溯圆桌会议时期天主教会的作用。教会被邀请作为“联结各反对派的黏合剂”，这使得“后共产主义波兰政治中重塑波兰身份的世俗声音，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而教会拥有所有政治议题的否决权”。^②转型前，宗教曾被普遍压制，所以提倡性别平等的现代性世俗价值，在教会重获权力后，被认为是“外国的”、非本土的政治主张。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有关堕胎的政策辩论中，团结工会为了获得教会的支持，选择反对堕胎，背叛了曾经的女性盟友，甚至还有一部分反犹的言论。^③

团结工会的转向助推了右翼保守主义在波兰的复兴，以至于在其自身消亡之后，后继出现了两大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和“法律与公正党”），且都进入了议会。2004 年，这两者已壮大到可以角逐政权，其中法律与公正党（PiS）在 2005-2007 年、2015 年之后一直掌握政权。东欧地区类似的新兴右翼政治力量，还包括保加利亚欧洲发展公民党（GERB）及其创始人鲍里索夫（Boyko Borisov）、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及其支持的科琳达·格拉巴尔-基塔罗维奇（Kolinda Grabar-Kitarović）、斯洛文尼亚民主党及三任总理的亚内兹·扬沙（Janez Janša）、捷克“是的 2011”及其创始人安德烈·巴比什（Andrej Babiš）。这种保守主义转向不限于新生的右翼政党，也包括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及其领袖，比如斯洛伐克的菲乔（Robert Fico）、罗马尼亚的德拉格内亚（Liviu Dragnea），以及捷克的泽曼（Miloš Zeman）。^④

概而言之，右翼保守政治力量的主要议题回应了以下几种话语。（1）民族主义：加入欧盟的限定条件、移民问题等历史情境的变化，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零星出现的民族主义，在 21 世纪成为主要的政治动员基础。转型前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方案紧密联系，转型期间的反苏民族主义也是重要的动力，而转型后的主导政治力量动用全球新自由主义来压制民族主义，最后反而使其更为剧烈地反弹。（2）福利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自由民主方案带来的剥夺感，使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改革背叛了 1989 年社会运动

① David Ost, *Defeat of Solidarity: Anger and Politic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p.9.

② Jacqueline Hayden, “Solidarity at 40...”

③ Ibid.

④ James Mark et al.,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276.

对于平等的承诺^①，这促使波兰法律与公正党等党派重新提供部分社会福利、匈牙利青民盟则推行家庭补助和国有化政策，并都通过这样的政策建立了自己的部分政治基础。(3) 和宗教相关的社会保守价值，包括反堕胎、性别主义、反同性恋、强调家庭价值等。(4) 民粹主义：包括反政治、反精英的情绪，反对部分现代政治价值，企图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但迅速与民族主义、保守价值相结合。^②

当市民社会的内在能量无法通过制度化通道进入政治社会，社会组织内部还面临着职业化和国际捐赠所带来的与社区“脱嵌”问题时，新兴的右翼保守主义很容易趁势而起，部分攫取了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将市民社会已有的建制、组织能力和已形成的网络（及相应的社会资本）用于“非公民性”的政治目标。与美国保守主义成功占有该国 20 世纪 60、70 年代服务于自由左翼的“市民社会组织”（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的套路一样，苏东地区的右翼政党也创造、激发和利用了所谓的“非公民性”的市民社会（uncivil society）。^③匈牙利欧尔班在 2002 年创建的草根网络“公民界运动”（civic circle movement）就是重要的例子。这一网络由多个社会组织和媒体组成，他们重提宗教和民族议题，试图重构“欧洲性”和“公民权”，并把中左政治派别贴上“精英”的标签。这一网络的主要参与者为城市中产阶级、职业群体、宗教人士和广义的爱国者，比此前提到的各种“悬浮”的社会组织拥有更广泛的草根基础。这一网络特别有效的一个组织策略，是重新“发现”和再造节日、生活方式、文化符号和民族英雄，吸引追随者参与各类文化和慈善活动，从而达成了另类的社会团结。其活动的主要话题包括四类：地方性爱国主义、神圣化的中世纪主义、欧洲的匈牙利和 1500 万匈牙利人。^④欧尔班曾

① Dimitrina Petrova, “The 1989 Revolutions and the Roots of Illiberal Populism”, October 24, 2019, 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the-egalitarian-promise-of-1989-and-its-betrayal

② 有学者提出，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一样，是一种“薄”意识形态，容易与其他意识形态结合，而自由主义、共产主义是“厚”意识形态，很难与其他意识形态结合。关于“厚”“薄”意识形态的界定与区分，可参见 Michael Freeden, *Ideolog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7-99.

③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④ Béla Greskovits, “Rebuilding the Hungarian Right through Civil Organisation and Contention: The Civic Circles Movement”, EUI Working Paper RSCAS 37, 2017, pp.1, 16.

在其中一次活动中这样宣称：“公民性的匈牙利并不是这个国家或大或小的一部分，它就是全部……（它）无法作为反对派，一个民族作为自己的反对派是不可能的。”^①这一话语显然放弃了市民社会作为“反对派”的功能，也与市民社会作为多元主义的、自由民主框架中的一部分相去甚远，转而充满着将市民社会等同于“整体主义”的民族观念。这与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要素高度相似。虽然欧尔班在右翼政治的光谱上离法西斯还有一定距离，但是这些话语和组织策略的确帮助他赢得了政权。^②

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也有类似的市民社会网络基础，其中之一就是以“玛丽亚广播电台”（Radio Maryja）为中心、以里德兹克（Rydzik）领导的天主教运动（救赎主会）为基础的网络，主要听众是农村地区人口、老年人和天主教徒，在全波兰有上百个相关的俱乐部和办公室。主要的话语包括仇恨外国人、仇恨欧洲、反犹主义、反伊斯兰，并且反对同性恋、反离婚、反避孕和辅助生殖技术。^③2014年法律与公正党魁卡钦斯基竞选失败后，曾利用这一网络发起了街头暴力抗争。

再以乌克兰为例。该国自独立以来公民参与的活跃程度受到学界很多关注，但转型后乌克兰新呈现的市民组织政治参与热潮，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政治观念，各种市民社会组织的形式和性质多有不同，并非所有的组织都符合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④恰恰相反，宣扬传统宗教、保守价值观念的社会组织，和以“个体自由权利”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在过去几年都呈现更加活跃的趋势。乌克兰的保守市民社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关注传统、保守的社会价值和宗教价值的组织，他们获得的支持，部分原因是民众对于

① Viktor Orbán, “Beszède a Disz téren”, 7th May 2002, <http://mkdsz1.freeweb.hu/n22/orban/020507.html>

② 参见 Michael Mann, *Fasc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迈克尔·曼认为，法西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推崇“整体性的、有机的”民族主义，与公民性的民族主义不同。当然，右翼威权和法西斯主义都可能使用这一话语。迈克尔·曼区分了右翼政治光谱中的五种政体类型，而右翼威权并不必然是法西斯。

③ Ireneusz Krzemiński, “Radio Maryja and Fr. Rydzik as a Creator of the National-Catholic Ideology”, in Sabrina Ramet and Irena Borowik, eds., *Religion, Politics, and Values in Poland: Continuity and Change since 1989*,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p.85-112. 亦见 James Mark et al., 1989: *A Global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280.

④ Natalia Shapovalova, Olga Burlyuk, eds., *Civil Society In Post-Euromaidan Ukraine*, Ibidem-Verlag, Stuttgart, Germany, 2018, p.8.

乌克兰加入欧盟法律框架的一个反击。这一类的代表有成立于 2010 年的“全部在一起运动”（All Together Movement），该运动通过大量家庭节日、街头游行和教育活动，来弘扬传统家庭和性别关系，反对乌克兰宪法修正案修改家庭作为“一男一女结合”的法律定义，反对性取向、性别身份等议题进入乌克兰的立法。另一类则是极端右翼、具备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 2013 年以后同俄罗斯的军事对抗中，获得政治资源和活动空间。这类的代表有“右区组织”（Правий сектор），在“广场运动”期间组成，随后逐渐分离出一个半武装组织、一个政党，还有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社会组织，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组织都坚持极右翼的政治立场，也都至少不拒绝使用暴力来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①

如果说以上例子中的右翼组织多少能被政党或国家所控制的话，那么另一些更为激进的暴力组织就未必了。匈牙利的青年新纳粹运动“光头党”就是典型。其中，阿尔伯特·萨伯（Albert Szabó）和伊什特万·哲尔克什（István Györkös）在 1993 年创建的“匈牙利人运动”（Hungarist Movement）是最有影响的组织之一，他们从二战时期匈牙利纳粹组织“箭十字”（Arrow Cross）寻求历史合法性。和其他的组织类似，“匈牙利人运动”的成员诉诸一些青年亚文化，比如采用万字符、穿黑衣和军靴、剃光头等。他们暴力行为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人：吉普赛人、犹太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外国人”（比如阿拉伯人、亚裔和长得像吉普赛人的罗马尼亚人）。在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的青年人群被国家法团主义体系高度组织化。但转型之后匈牙利市民社会的发展，没有有效吸收和组织青年亚文化，而新建构的政党和国家也几乎放弃了这一群体，留下了一个权力和社会领域的重大空白。精英青年还可以通过社会运动实现政治上升，但普通青年很快就被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组织所吸引。朋克亚文化和其他地下音乐团体，不仅催生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反党派，也给后来的反政治种族主义提供了资源。因此，光头党运动是社会主义遗产和后转型政治的共同产物。这些运动和组织一度还加入了“匈牙利民族

^① Natalia Shapovalova, “The Two Faces Of Conservative Civil Society in Ukraine”, in Richard Youngs, ed., *The Mobilization of Conservative Civil Societ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8, pp.33-39; 王思羽：“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年)”，《俄罗斯研究》，2020 年第 1 期。

联盟”（MNSZ）^①，该联盟与丹麦、德国和法国的右翼极端主义政党都有联系，甚至在美国中西部的密尔沃基也设有分支来筹款，可谓上文提到的以“布拉格之秋”为代表的全球市民社会的反面。虽然“匈牙利民族联盟”后来失败了，但他们的主要话语在 21 世纪仍具有持续吸引力。^②类似的运动在其他国家也颇具规模，比如斯洛文尼亚。^③

这些例子对于市民社会的公民性假定和民主属性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我们对于市民社会采用一种广义的理解，即市民社会包括所有处于政治社会与家庭之间的自愿组织社群，那么正如帕沙·查特吉评价他的母国印度一样，这些社群“属于自然的领域、原生的领域。只有经过净化、驯服，才能成为主观共享的情感，来保护和滋养（新的民族共同体）……但是（社群）也总是带来威胁，如暴力、分裂、恐惧和非理性的诸种可能……国家与市民社会在资本的话语中都有相应的地位，而社群在理想状态下也是被流放的……社群变成了地下的延绵流脉，不愿消失，但仍具有颠覆性。”^④这部分“被流放”的市民社会在特定的政治条件下，很可能被右翼威权政治所调动和利用，甚或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准军事（paramilitary）基础。这也正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欧洲东部的故事。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党在一战之后并没有很好地应对大众政治兴起的挑战，仍由旧精英把持一切，市民社会于是成为大众公共政治参与的替代性渠道。然而悖论在于，当时德国的社会动员程度虽然很高，但却是以现有社会群体为界来组织集体行动，从而加深了已有的社会裂痕。而大众对正式政治制度亦高度不信任，并被纳粹所利用，通过准军事化组织来动员社会力量，最终走向了种族清洗。^⑤因此，市民社会理论的重

① 这是一个竞选联盟，由一些规模较小的右翼政党和社会运动网络在 2003 年组建，目的是参加 2004 年的欧洲议会选举。

② Laszlo K Rti, “The uncivility of a civil society: skinhead youth in Hungary”, in Petr Kopecky and Cas Mudde, eds., *Uncivil Society?...*, pp.35-51.

③ Brian Požun, “Uncivil society: are racist skinheads just a symptom of a larger problem in Slovenia?” *Central Europe Review*, 2000, Vol.2, No.17.

④ Partha Chatterjee, “On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 in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p.130.

⑤ 冲锋队、党卫队等都是所谓的准军事化组织，主要依靠群众武装力量，与军队的性质不同。类似的群众武装团体在当时德国、意大利的地方层面也很多，其中一些被纳粹党所收编。关于魏玛共和国政治危机的分析，这里参考的是 Sheri Berman,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1997, Vol.49, No.3, pp.401-429.

要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强调：所有现实的（非想象中的）市民社会都有从“公民性”滑入“非公民性”的危险。^①另一名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重要学者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这样评论：“有关自由的话语，总是内含着压迫的话语。这是市民社会话语最核心的一个悖论。”^②具体而言，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中所界定的“公民”自由、所推崇的“公民性”，往往隐含地以对作为“敌人他者”的压迫为前提。这些“他者”在当代苏东地区可能意味着外来移民、犹太人、吉普赛人、女性和各种性少数群体、异教徒，甚至代表欧洲价值的人群等，而这些人恰恰是自由主义所界定的“公民性”（市民社会）应该保护甚至张扬的多元性的主要对象。自由主义话语必须有效压制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分裂性的地方认同，才有可能自我维护。而现实中，苏东地区社会组织和群体从“公民性”向“非公民性”的转变，其负面后果在过去十多年间逐渐全面展现，也再次验证了杰弗里·亚历山大所说的“市民社会话语最核心的一个悖论”。^③

五、结语

历史上，市民社会理论拥有多歧的理论资源和丰富的社会实践。而如果去掉“民主”“社会团结”“与国家零和博弈”等过强的理论和道德期待，则涵育多元性是其一以贯之的特质。然而已经出现的悖论是，20世纪80年代市民社会理论在全球扩展的过程中，其核心话语却越来越单一。苏东转型前后的实践——被调用说明市民社会理想类型的可行性与普世性——成为一种模板。尽管如此，苏东地区从转型到日常政治的历史显示，曾作为体制反对派与转型推手的市民社会，并不一定能够成为转型之后国家-社会关系中的积极建构因素。市民社会如果缺乏与政治社会之间制度化的关联，很可能走向去政治化或过度政治化两种极端。来自欧美的援助并没有达到通过资助

① John Keane,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pp.114-156.

② Jeffrey C. Alexander, “Citizen and enemy as symbolic classification: on the polarizing discourse of civil society”,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d., *Real Civil Societies: Dilemma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London: Sage, 2008, pp.96-114.

③ 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在这一点上对作者的提醒和启发，帮助澄清了此处“市民社会悖论”的政治含义。

苏东地区市民社会来巩固新民主的效果，而是制造了一群“脱嵌”于本土社会的职业人士和诸多“悬浮”在当地民情之上的社会组织。为了寻找替代性的团结基础，一部分非公民性的市民社会成为社会分裂、右翼保守化和民族主义的载体和表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今后在类似苏东地区这些世界体系中的边缘或者半边缘国家里，市民社会实证研究的可能视角：

(1) 在日常政治的情境中，市民社会如何建构与政治社会的沟通渠道，包括政治诉求的转化、资源的流动、协商的方式。由于不同国家政治遗产、历史上国家-社会结构性关系的差异，这种制度性管道应是多元的。因此，只有具体政治情境中的市民社会，而没有抽象的、普世的市民社会理论。当然，如何维持市民社会的政治联系和“自我限制”的性质，防止市民社会进入“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循环，也是一个重要议题。^①

(2) 如何促进市民社会的本土联系，使之避免“代表性的断裂”，真正为当地议题服务，培育本土社会网络，而不是创造一个国际化的“发展职业”和“绿色飞机一族”。这并不是说必须放弃外来资源，而是需要考察这些资源起作用的方式，是否促进了参与和公平，还是制造了新一重的权力结构，抑或加强了传统的权力结构。

(3) 市民社会的边界也需要重新思考：市民社会只包括具有“公民性”、非强迫性、非暴力的那部分，还是也包括灰色甚至阴影的部分？前者更多是一个全球中产阶级学者、社会活动家、社会组织管理者和部分政治行动者所选择的观念，而后者才是市民社会原生且有持久生命力的组成部分，不能简单摒弃。据卡尔·波兰尼的说法，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其他右翼民粹价值的回归，正是“社会保护运动”周期出现的形式之一，不能简单看作是偶然的，或是邪恶愚蠢的。^②那么，这些运动和组织如何与右翼政治勾连？其内部通过何种网络组织？主导的意识形态为何有吸引力？这些是在全球政治逐渐进入保守主义周期后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苏东地区市民社会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实证经验和批判素材。

① 关于市民社会“自我限制”的概念，参见 Jean Cohen,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② [英]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 Abstract 】 Since the 1980s, liberal theory of “civil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global revival, of which the practices in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constituted a key found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e unique historical contexts, features of transition of this region has led to a serie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pplying liberal civil society theory, through reflecting on and synthesizing how 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and perception of this concept has evolved, and how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have changed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manda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ansition in this region. We further examine three processes: (1) the dynamic tens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society”, (2) professionalization of civil society after transition and its relations with social solidarity, and (3) the emergence of “uncivil” society. We then depict the dilemma civil society has to face as an ideal type and theoretical imagination in this region. In particular, special features of 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 has also led to uniqu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this region: civil society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the promoter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experiencing new political alienation in the “ordinary politics” of post-transition era; civil society has been captured by neoliberalism and right-wing conservatism, and has caused new social polarization.

【 Key Words 】 “civil society” theory, Soviet and Eastern European Transition, Political Society, Political Conservatism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1980-х годов теор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етерпел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в мире,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практик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с перех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стали важной основой для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эт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м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я и резюмируя взлёты и падения концепци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до и после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эволюцию понимания данн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а такж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форме и функциях сами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бъясняем особ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и переход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стран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который привёл к ряду неожидан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 практике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данном регионе,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либерализме. Анализируя динамическ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между «граждан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изацию и социальную солидарность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сл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а также появление «не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ы описываем парадоксы и дилеммы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как основанного на конкретной теории идеальной модели и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воображения, с которыми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столкнулись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В частности, специф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привнесла уникальные коннотации в развитие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регионе: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евратилось и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сторонника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тчуждение, проявленное посл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захваченное неолиберализмом и правыми консервативными силами,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стало стимулом дл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разделен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Теория «гражда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责任编辑 肖辉忠)

寡头干政何时了？ ——论乌克兰国家治理的困境及根源*

毕洪业 江博**

【内容提要】乌克兰自独立以来，寡头影响成为其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和国家治理困境的关键因素。伴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转轨，乌克兰寡头与政治精英建立起非正式的关系网络，并通过担任正式的政治职位和控制主要的大众媒体，操纵政治决策过程，以保持和扩大寻租机会。寡头政治作为乌克兰精英政治的一部分，是非正式的，也是国家寡头化的过程，不仅是危机的原因，更是危机的结果。乌克兰寡头对经济的垄断，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民主进程。政治权力转移没有对乌克兰寡头政治体制带来深刻影响，政府与寡头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寡头影响已经融入乌克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之中，打破寡头政治体系将是一项长期挑战。

【关键词】乌克兰国家治理 乌克兰寡头政治 乌克兰精英政治

【中图分类号】D871**【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136(29)

一、引言

一直以来，寡头与政治的关系都是政治学及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课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跨欧亚伙伴关系背景下的中俄两河流域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7BGJ032）、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乌克兰危机冲击下的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及中国的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5BGJ052）的阶段性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 毕洪业，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江博，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

题。一般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是指由少数人掌握政权的一种统治形式，即少数人自私自利的精英统治。国家权力属于一小部分人，他们通常是经济实力最强的阶层。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就有对寡头政体的种类、成因、变更及构建等问题的深入分析。寡头统治，意味着拥有社会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掌握着统治权，所使用的统治方式完全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利益；公民之间是不平等的，原因在于，公民地位由分配不均的财富决定，而不是公民对国家的贡献。^①亚里士多德提出和论证过的一些问题，仍然是现代政治理论发展所面临的。例如，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独裁及寡头政治执政者是否愿意让绝大多数人参与国家事务等。在西方政治学看来，现代政治统治的形式主要分为民主政体^②、极权政体^③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威权政体。威权主义与寡头政治直接相关。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方法，描述了寡头政治的不同类型，并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正在出现以绝对权威方式实现统治权的趋势，而这种统治形式既不是极权主义的政府，也缺乏民主政体的一些特征。^④胡安·林茨（Juan Linz）把这种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的统治形式称为“威权主义”，寡头政治大多可以归入此列。威权体制下的社会缺乏成熟思想体系的指导和深入广泛的政治动员，权力由领袖、有时是小集团在没有严格规定、但可以预见的范围内行使。^⑤威权政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领导者个人的成功及其支持者的拥护，其最终结果会像西班牙或韩国那样朝着更为民主的统治形式转变，还是会变得更加极权化，这也是许多东欧国家和后苏联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对此，安东尼·奥罗姆（Anthony M. Orum）认为，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显得有些草率，因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是一回事，但是

① 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姚仁权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四、五、六卷。

② 这里说的民主政体具有希腊城市国家的一些特征。

③ 这里说的极权政体近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僭主政体。

④ 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0, Vol.2, No.3, pp.265-292; Edward Shil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tes (II)",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60, Vol.2, No.4, pp.379-411.

⑤ Juan Linz, "Opposition to and Under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Case of Spain", in Robert A. Dahl (Ed.),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71-259.

完全被稳定的民主制度取代则是另外一回事，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①

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苏联解体后在该地区出现的各主权国家转轨，财富开始加速向私人手中集中，“寡头”一词再次流行起来。在乌克兰，私有化加快了财富的重新分配，为保障已有财产的合法性和不断扩张，财富很快与权力结合，形成寡头政治。与原苏联地区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乌克兰寡头对国家的影响最为突出，这已经成为政治体系运行中的核心因素，也是外界观察乌克兰的焦点。首先，有学者重点关注了寡头的商业利益，认为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中，改革初期从市场扭曲和政治关系中获利的“赢家”试图阻止改革进一步推进，以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但社会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②这种现象被定义为“国家俘获”（state capture）^③，通常是指政府决策受到经济中处于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利益集团通过给予那些规则制定者直接或间接的回报，使自己拥有不受明确游戏规则约束且在诸多领域控制国家政策的巨大权力。这样，国家管理权受到限制，总统为维护其个人权力而充当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者，从而使国家治理中的民主决策被限制在最低程度。^④在这种环境中，利益集团为当权者提供私人好处，同时敦促国家赋予他们一系列特权和豁免，而这些特权和豁免损害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和机构的利益，进而对国家的治理质量产生极大的负面

①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何俊志、孙嘉明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13-114页。

② Joel S. Hellman, “Winners Take all: The Politics of Partial Reform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s”, *World Politics*, 1998, Vol.50, No.2, pp.203-234.

③ 相关研究参见 Kevin A. Murphy,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Why Is Rent-seeking So Costly to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Vol.83, No.2, pp.409-414;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A Contribution to the Policy Debat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0; Joel S. Hellman, Geraint Jones,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Corruption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444, 2000; Cheryl Gray, Joel Hellman, Randi Ryterman, “Anti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2: Corruption in Enterprise-State Interactions i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1999-2002”,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4; Anders Aslund, “Are Ukraine’s Reforms Breaking its State Capture? An Agenda for Genuine Chang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16, Vol.57, No.6, pp.819-833.

④ Margarita M. Balmaceda, *Politics of Energy Dependency: Ukraine, Belarus, and Lithuania between Domestic Oligarchs and Russian Pressur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5, p.27.

影响。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国家俘获”程度相对较高的转型国家，企业更愿意选择与政府官员建立直接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与国家机构建立正式的官方联系。^①

其次，有学者从政治权力组织的视角出发，认为原苏联地区国家政治权力体系，主要由改革之初形成的地方权力机构、政治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及具有金融资源或强制力的国家机构等关系网络构成。而作为政权结构中可以变动的部分，这些寡头集团和权力机构网络能够定期安排和重新调整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权的“改变”。所以，相关研究重点应该从政权的更迭逻辑转向政权的动态调整。相应地，寡头就是这些关系网络的控制者，也是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而受其庇佑，总统们只能通过惩罚和奖励来协调国家这些最重要的网络，以保持其对权力网络的主导。^②

再次，还有学者提出了“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sm）这一新概念，用来分析拉美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寡头的政治角色，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原苏联地区国家，大都在转型过程中建立起了竞争性威权主义体系。在许多后共产主义政权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控制着国家及其经济命脉，这使得通过单一领导确立专权统治变得非常困难，进而形成一种默认的多元主义。^③竞争性威权体制中的当权者认可有意义的多党选举，但却严重滥用民主机制，将其作为获得权力的主要手段，使自己相对于竞争对手具有明显优势。就乌克兰而言，精英政治不仅阻碍了全面民主化，也破坏了巩固威权主义的努力。因为，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反对派领导人获得部分资源，进而决定了乌克兰的竞争性威权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下去。^④

关于乌克兰寡头体系，乌克兰政治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托门科（Николай Томенко）指出，“乌克兰寡头是一个独立的个人，借助自己的资本和个人特

① “Transition report 1999: Ten years of transi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the Baltic states and the CIS”, London: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99, pp.117-119.

② Henry E. Hale, *Patronal Politics: Eurasian Regime Dynamic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84.

③ Steven Levitsky, Lucan A.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2, Vol.13, No.2, pp.51-65.

④ Lucan Way, “Rapacious individualism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Ukraine 1992-2004”,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5, Vol.38, No.2, pp.191-205.

质创造了一个非正式的（未经乌克兰法律允许的）金融和工业结构、政治和公共机构、媒体的统一体。随着寡头制度的发展，权力必须建立‘政治控股’，而寡头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迫切需要这些控股。”^①当然，也有俄罗斯学者提出，寡头并不是俄罗斯或乌克兰的特产，他们曾出现在每个中等收入国家，甚至所有西方国家。因为，寡头是特定经济、法律和政治环境的自然产物。在不同时期，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都有自己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状况，客观上鼓励了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行为。对此，有学者提出，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人人平等的社会准则出发，有必要剥夺寡头们所享有的特权和地位，甚至可以要求他们为之前可疑的交易予以大量补偿，但也要综合考虑国家经济、政治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②

中国学者根据对乌克兰寡头政治问题的研究认为，这是国家转型失败和动荡的根源。寡头集团的存在和巨大影响，是乌克兰政治经济结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乌克兰寡头们先是控制了国家的经济资源，然后插手政治，寻找代理人或者干脆自己进入政府，成为议员和高官。寡头集团很好地适应了民主政治，建立了自己的政党，还操纵着媒体系统，有足够的资金资助并影响政治。^③精英不仅是政治转型的主导力量，也是决定转型速度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其中，经济精英对国家转型的影响最为突出。寡头政治是制约乌克兰政治转型质量的重要因素——寡头粗暴干政破坏了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导致严重政治腐败和频频出现的政治危机。2014年乌克兰的政权更迭，反映出寡头集团已经对民主政治制度合法性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④

综上所述，大多数既有研究成果都有类似这样的假设——在原苏联地区国家的转型中，为了促进商业利益，寡头与政治精英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利益交换关系，阻碍了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也就是说，原共产主义国家的

① Николай Вавил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вступил в схватку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6 декабря 2000г. https://www.ng.ru/cis/2000-12-06/1_oligarh.html

② Андерс Ослунд.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олигархия: Россия, Украина и США//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2005. №1. С.49-72.

③ 程东金：“乌克兰的寡头民主”，《文化纵横》，2014年第2期，第10-11页；李秀蛟：“浅析乌克兰寡头现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2期，第30-39页。

④ 张弘：“精英与乌克兰的政治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5期，第87-103页。

政治转型，基本被置于威权而非民主的环境中进行讨论，并假定寡头与政治腐败密切相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相关研究更多关注于寡头对原苏联地区转型国家民主和经济发展的阻碍，以及它与制度架构、政权性质之间的关系，而对乌克兰的专项研究还不多，尤其是对寡头特性及其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方面研究更少。转型以来，乌克兰政治制度的变动可以说是极为曲折的，期间发生的几次重大变化，为研究政治制度变迁与寡头政治角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本文尝试从寡头政治的视角，来观察乌克兰国家转型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在梳理和分析乌克兰寡头网络形成及其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乌克兰寡头与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以及寡头政治对乌克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影响。从而加深对乌克兰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认识。

二、乌克兰寡头网络概述

乌克兰的“寡头”，是指在 20 世纪 90 年代私有化过程中暴富的大资本家。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借助“权力寻租”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商业利益，居于国内市场的垄断地位。在苏联解体后的乌克兰，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的瞬间崩溃，这为私人通过投机快速盈利提供了温床，从而导致了资本的集中和寡头的出现。由于无法再走西方中世纪后期资本原始积累的老路，乌克兰寡头转而利用自己国家的领土、资源和人民的潜力，通过权力寻租和高利贷等方式来达到目的。推动乌克兰寡头出现的因素包括：原有计划经济的崩溃；以攫取利润为目的、懂得商业运作的经营者的出现；20 世纪 90 年代乌克兰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给投机者提供了空手套利的空间；法律制度的不协调和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腐败。^①

20 世纪 90 年代上半期，即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Леонид Кравчук）任总统时期（1991-1994 年），乌克兰当局建立了私有化主管机构——乌克兰国有资产基金会，确定了首批私有化项目，社会资本可以租赁或购买集体

^① Украина и олигархия. 23 декабря 2013г. https://revolution.allbest.ru/political/00342506_1.html

企业，这也被称为非竞争性私有化阶段。由此，乌克兰的新贵们（大多出身于原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政府官员）以改革之名，通过接管私有化的企业或成立新公司的方式，很快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的占有，并借此机会成为首批寡头。自然，乌克兰早期的寡头与原有的权力结构，有着直接关系。他们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于贸易和金融领域，只有在政治支持下才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而监管和检查部门对这些新企业家的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应地，国家银行为寡头们提供优惠信贷，国有企业成为他们的客户。1995年，新上台的列昂尼德·库奇马（Леонид Кучма）总统，将原来国家经营的天然气进口转移到私营公司，进而成为寡头财富增长的另一个主要来源。

库奇马总统认为，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只有建立“集团”共识才能保障国家统一，以避免波黑战争的悲剧。^①所以，需要建立一个国家精英阶层来应对全国范围内的问题，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领地”，而这可以通过财产分割和财政资源分配来实现。从1995年开始，乌克兰进入证券私有化阶段，也就是大规模私有化阶段，一直到1998年结束，共有5万多个工业、商贸及公共饮食企业改变了所有制形式。这期间，最突出的改革就是国家放弃了对天然气进口的垄断。乌克兰的经济支柱是以采矿冶金为主的高耗能重工业，所以各路寡头首先都觊觎垄断天然气、石油进口业务和电力领域。由于资源上的限制，相比俄罗斯寡头控制石油、金属、天然气等生产，乌克兰寡头在这一领域主要作为中间商从事贸易。1995年，库奇马当局将原国营天然气公司垄断的进口权转移到私营公司，为“天然气公主”尤利娅·季莫申科（Юлия Тимошенко）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一些人通过控制国内价格、利用政治关系，低买高卖，或以补贴汇率的形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来获利，率先成为能够影响国家政策的寡头。到1997年，尤利娅·季莫申科的统一能源公司成为俄天然气出口乌克兰的最大客户。她掌握了20多家大型企业、航空公司、银行以及媒体，对乌克兰全国经济的影响巨大。^②从尤利娅·季莫申科的统一能源公司，到德米特里·菲尔塔什（Дмитрий Фирташ）

① 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 28 декабря 2016г. <http://www.iarex.ru/articles/53440.html>

② Юлия Тимошенко - газовые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http://ruspravda.info/Yulya-Timoshenko-gazovie-shtrihi-k-portretu-3989.html>

的俄乌能源公司，寡头们为获取垄断收益而展开激烈争夺。同时，由于乌克兰国内市场狭小，商业活动依赖外部市场和高度专业化的本地资本市场，这样一来，金融领域就成了乌克兰寡头整个产业系统的输血中枢。所以，较大的乌克兰寡头大都有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为依靠。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和根纳季·博格留博夫（Геннадий Боголюбов）的普里瓦特银行（Приватбанк），就曾是乌克兰国内最大的私人商业银行。这些被寡头掌控的私人银行，积极参与民间和企业存贷款业务，并与乌克兰央行及国外金融机构保持紧密的业务联系。

在对垄断利益的生死争夺中，乌克兰寡头也完成了首次新老交替和势力分化，新一代年轻寡头迅速涌现，且势头逐渐盖过老一代寡头。帕维尔·拉扎连科（Павел Лазаренко）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失去靠山的季莫申科再也不能垄断乌俄之间的天然气生意，很快被菲尔塔什等其他寡头取而代之。1995年10月15日，顿涅茨克老寡头、乌克兰著名足球俱乐部顿涅茨克矿工队主席沙赫杰尔·布拉金（Шахтер Брагин），在自己俱乐部球场包厢观看比赛时，与6名保镖一起被炸身亡。后来，成为乌克兰首富的里纳特·艾哈迈托夫（Ринат Ахметов）接任顿涅茨克矿工队主席，并接手了布拉金留下的庞大金融资产。1996年10月3日，顿涅茨克老寡头、乌克兰大型金融公司“阿通”（АТОН）负责人、乌克兰议会议员叶甫根尼·谢尔班（Евгений Щербань），在顿涅茨克机场被枪杀。

从1999年起，乌克兰开始对大中型企业私有化进行国际招标。1999年12月29日，库齐马总统颁布了《关于加速乌克兰财产私有化紧急措施》总统令，责成乌克兰政府和国有资产基金会加速推进私有化，继续削减国家控股企业数量。^①由此，乌克兰寡头开始从能源贸易和金融领域，快速向冶金和机械制造、煤炭开采及食品部门扩张，资产配置趋于多元化。作为乌克兰工业基础的煤炭、矿石采掘、冶金和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领域重要企业，在被列入私有化项目后，大多成为寡头的私人财产。这些企业大量集中了乌克兰最好的原料和设备，以及技术精湛的专家和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截至2001

^①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ускорению приватизации имущества в Украине»//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вестник Украины. 1999. №.52.

年初，乌克兰非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已经占到企业总数的 86.1%，产值约占工业生产总值的 58.5%；其中，冶金行业非国有企业产值占全行业总产值的 77.9%，轻工业为 73.5%，食品工业为 70.9%。^①由于政治、经济局势动荡等原因，乌克兰私有化效果并不理想，完成私有化改造的企业中很大一部分仍处于亏损状态，生产效率低下和管理落后的状况普遍存在。库奇马当局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推动了乌克兰寡头的集体崛起，他们的触角从能源、金融和重化工业伸向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寡头们的财富快速增长，形成了自己的商业战略规划，加大了对全产业链和先进设备的投资。许多大寡头的资产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特别是加强了与欧盟的经济联系。2006 年，有乌克兰媒体估计，总资产在 2 亿美元以上的乌克兰富豪共 29 人，其中 7 人的资产超过了 10 亿美元。^②

20 世纪 90 年代末，寡头们完成了从单一经济角色向政治角色的转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寡头。特别值得关注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季莫申科在他的靠山拉扎连科被迫辞去总理职务后，开始向政治领域进军；二是，寡头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中右派政党，支持库奇马竞选连任，并取得了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这一时期的乌克兰寡头们形成了基辅、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顿涅茨克等非正式区域集团网络。基辅集团创建了社会民主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组建了工人党，顿涅茨克集团则创建了地区党。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网络在经济领域的代表，是维克多·平丘克（Виктор Пинчук）的冶金控股公司（Interpipe），以及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格留博夫的普里瓦特集团；政治领域的代表，是库奇马总统及拉扎连科总理。顿涅茨克网络联合了两家寡头控股公司：由谢尔盖·塔卢塔（Сергей Таруга）组建的顿巴斯钢铁工业联盟，和艾哈迈托夫组建的系统资本管理公司（СКМ）。顿涅茨克前州长维克多·亚努科维奇（Виктор Янукович）曾于 2002 年被任命为总理，后又当选总统。基辅网络在经济上得到了“迪那摩-基辅”（Динамо-Киев）的支持，政治领域的主要代表是维克多·梅德韦丘克（Виктор Медведчук），他曾任

① “乌克兰私有化概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官方网站，2002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mofcom.gov.cn/aarticle/bi/200210/20021000045156.html>

② “The 30 richest Ukrainians”, *Kyiv Post* (Special Insert), 29 June, 2006.

2002 年被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①实际上，非正式寡头网络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区范围，覆盖了寡头之间的利益连接，以及与自身关系密切的行政力量所负责的整个商业领域。

库奇马时期，以总统为首的政治阵营，被几个相互竞争的非正式寡头地区网络围绕着。虽然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网络影响最大，打着反寡头的旗号发动“橙色革命”^②，夺权成功，但是背后支持维克多·尤先科（Виктор Ющенко）的又是寡头谢尔盖·塔卢塔和维塔利·盖杜克（Віталій Гайдук）。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2005–2010 年），寡头们在经济战场和政治舞台上的斗争都极为激烈。许多寡头投奔了橙色阵营，原来的三个非正式区域寡头网络，只剩下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的地区党顿涅茨克网络。然而，该网络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却只能处于反对派地位。橙色阵营出现分裂时，东部地区党重掌议会，权力分配的不确定性也随之日益增加。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许多寡头开始对冲下注，个人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加剧（例如，科洛莫伊斯基的普里瓦特集团，曾向法院起诉艾哈迈托夫涉嫌第聂伯电力公司的违法交易）。接踵而来的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使乌克兰经济遭到重创，寡头们的企业也受到冲击。随着国家陷入深度衰退，许多寡头不得不削减政治支出，为自己的企业进行再度融资。但他们仍然认为，如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必须要把钱花在选举上。在 2010 年的大选中，亚努科维奇得到了艾哈迈托夫的支持，二者都来自东部的“钢铁带”。此外，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还包括天然气贸易寡头菲尔塔什。而季莫申科最主要的支持者是寡头塔卢塔和盖杜克，他们在 2004 年选举中是支持尤先科的。一同转投季莫申科麾下的还有曾与尤先科关系密切的糖果业巨头彼得·波罗申科（Петр Порошенко），和年轻寡头康斯坦丁·日瓦戈（Константин Жеваго）。值得注意的是，在 2004 年选举中默默无闻的科洛莫伊斯基和博格留博夫展开了对冲赌注，平丘克也

① Simon Pirani, “Ukraine’s Gas Sector”, Oxford Institute for Energy Studies, 2007, <http://www.oxfordenergy.org/pdfs/NG21.pdf>; J. Kuznir, “RosUkrErgo”, *Ukraine-Analysen*, 2006, No.2, <http://www.laender-analysen.de/ukraine/pdf/2006/UkraineAnalysen02.pdf>; 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

② “橙色革命”（Помаранчева революція），是指 2004 年底围绕乌克兰总统大选，以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为首的反对派，在全国发动号称 50 万人参加的一系列抗议选举结果的政治事件。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宣布重选，结果尤先科以 52% 的支持率获胜。

采取了类似的策略。最终，只剩下顿涅茨克一个大型非正式区域寡头网络，亚努科维奇赢得了总统之位。

政治领导层的更迭和大选后的经济复苏，标志着另一场寡头快速扩张的开始。许多老牌寡头重新获得了财富快速增长的机会。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寡头，主要集中在正处于自由化过程中的食品工业。艾哈迈托夫获得了冶金和能源的控制权，科洛莫伊斯基垄断了石油工业，菲尔塔什和谢尔盖·列沃奇金（Сергей Левочкин）控制着天然气、化工和钛行业。通过中间人资助亚努科维奇，科洛莫伊斯基实际上控制着乌克兰最大的石油运输公司（Укрнафта），尽管国家仍拥有大部分股份。亚努科维奇时期（2010-2014年），一方面，寡头们要围绕顿涅茨克网络这个政治权力中心；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着总统“家族”裙带关系网络的竞争和排挤。作为地区党和亚努科维奇的主要贡献者和支柱，尽管艾哈迈托夫与“家族”寡头没有发生直接冲突，但也对总统“家族”势力扩张速度过快而感到不满。并且，他还对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感兴趣。在独立广场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后，艾哈迈托夫和菲尔塔什抛弃了亚努科维奇，转而与亲欧洲的反对派暗中联系。一些乌克兰观察人士认为，受到总统贪婪欲望威胁的寡头们资助了“广场革命”^①，以此作为与新政府合作的筹码。^②摆脱了亚努科维奇家族的压制，寡头们也获得了扩大个人权力的机会。亚努科维奇被解职后，顿涅茨克网络和个别寡头加入了不同的政治阵营。

与橙色革命一样，寡头政治体系和地位并没有受到系统性的挑战，谢尔盖·库尔钦科（Сергей Курченко）是唯一被当局起诉的寡头，资产充公。^③菲尔塔什面临的是美国的刑事指控，而不是乌克兰的法律制裁。欧盟对18名代表旧政权的个人实施了制裁，名单中包括亚努科维奇本人、他的两个儿

① 2013年11月21日，亚努科维奇政府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活动的中心在基辅独立广场，一直持续到2014年2月，期间还爆发了流血冲突。最终，尽管在欧、俄的斡旋下反对派与亚努科维奇达成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协议，但反对派仍经议会通过了总统罢免议案，亚努科维奇被迫出走俄罗斯。

② “Rule by Oligarchs: Kiev Appoints Billionaires to Govern East”, 3 March 2014, <https://www.rt.com/news/ukraine-oligarch-rule-governors-512/>

③ Украинский олигарх Сергей Курченко опровергает все обвинения в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х. 6 марта 2014. <https://tass.ru/ekonomika/1026229>

子以及为其家族策划多项商业计划的库尔钦科。但是，那些在亚努科维奇统治期间积累了巨额财富、有重大影响力的寡头都没有出现在名单上。^①2014年，突发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给许多寡头的垄断地位带来沉重打击，也使他们名誉扫地。其中，东部工业区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对一些企业的打击尤其严重。2015年，乌克兰最富有之人的财富总额下降30%以上，跌至238亿美元。^②

表1 乌克兰主要寡头的基本情况

寡头	项目	在库奇马、尤先科、亚努科维奇、波罗申科任内的影响，“+”为有，“-”为没有	控制/母公司	主要商业领域	资产变化(10亿美元), 时间节点为 2006、2009、2012、2015、2020年6月 (“-”为不清楚)	寡头所属的地区网络
里纳特·艾哈迈托夫		+	SKM 系统资本管理公司(自2000年)	重工业、能源	11.8、3.7、15.4、6.9、2.8	顿涅茨克集团
弗拉基米尔·博伊科		+	Ihh 钢铁	钢铁工业	1.6、0.7、0.5、0.2、-	
瓦西里·赫连尼尼茨基		+	扎波罗热钢铁、基辅投资集团	钢铁、房地产及公用事业	0.7、0.2、0.3、0.1、0.26	敖德萨集团
伊戈尔·科洛莫伊斯基		+	普里瓦特集团(自1992年)	炼油、金属工业、金融	2.8、2.3、2.4、1.4、1.0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
维克多·平丘克		+	Interpipe 公司(自1990年)	钢铁工业	3.7、3.5、1.8、1.5、1.4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
谢尔盖·蒂季普科		+	从私人银行到 Interpipe 和 TAS 集团(自2004年)	金融、保险及机械制造	0.5、0.6、1.2、0.7、0.65	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集团
康斯坦丁·日瓦戈		+	财政与信贷银行	重工业、机械制造及化工	1.9、1.0、1.5、0.7、1.1	波尔塔集团
谢尔盖·布良科		+	布洛克商业银行(自1991年, 2014年破产)	金融	0.4、0.2、0.3、0.1、0.1	
德米特里·菲尔塔什		-	俄乌能源公司(自2004年) /DF 集团(自2007年), 2014年在奥地利被捕	天然气、化工	1.4、0.6、0.7、0.3、0.37	基辅集团
瓦·赫拉什科夫斯基		+	多元投资, 在2012年出售	金属工业、媒体	0.9、0.4、0.5、0.1、0.4	
彼得·波罗申科		+	Ukropinvest-Agro 集团(自1993年)	食品、汽车	0.5、0.6、1.6、0.8、1.4	基辅集团
塔里尔·瓦萨德洋		+	乌克兰汽车公司(自1992年)	汽车工业	0.4、0.3、0.2、0.1、0.1	
尼古拉·扬科夫斯基		+	施蒂罗尔氮肥厂(在2010年股份卖给了菲尔塔什)	化工	0.4、0.1、0.3、0.2、0.24	
亚历山大·菲里德曼		-	AVEK 公司(自1994年)	房地产	-、0.1、0.3、0.2、0.13	
瓦季姆·诺温斯基		-	斯玛特公司(自2006年)	金属、机械制造	-、0.7、1.9、0.8、0.8	顿涅茨克集团
维塔利·盖杜克		+	顿巴斯工业联盟(自1995年, 2009年底出售股份)	重工业	1.7、0.7、0.5、0.3、0.3	顿涅茨克集团
瓦列金·拉季科		+	诺德公司(自1989年)	轻工业	0.2、0.2 - - -	
安东·普利戈德斯基		-	MPS 公司(2001-2006年), Lemtrans 公司(-2012年), 卖给 SKM	重工业、运输业	-、0.1、0.3、0.2、0.12	顿涅茨克集团
费奥多尔·施比格		+	Aval 银行(直到2006年)	食品、金融	-、0.2、0.3、0.1、0.07	
安德烈·维列夫斯基		-	Kemel 集团(自1995年)	食品	-、0.2、1.0、0.7、0.7	波尔塔集团
亚·雅罗斯拉夫斯基		+	Ukrsib 集团	金融、机械、化工、建筑	0.7、1.0、1.0、0.8、0.7	顿涅茨克集团
谢尔盖·库尔钦科		-	VETEK 公司(2014年被没收)	能源		顿涅茨克集团
格里高利·苏尔斯基		+	多元投资, 职业足球联盟主席	食品、酒店、能源	-、0.3、0.1、0.1、-	
尤里·科林克		-	MPKh 公司	食品	-、-、1.3、1.1、1.1	顿涅茨克集团

资料来源: Heiko Pleines, “Dataset on Ukrainian oligarchs 2000-2016”, <http://www.forschungsstelle.uni-bremen.de/UserFiles/file/table-oligarchs-overview.xls>; Рейтинг Forbes Украина 2020: ТОП-100 богатейших людей страны. <https://inventure.com.ua/analytics/articles/rejting-forbes-ukraina-2020-top-100-bogatejshij-lyudej-strany>. 表中“寡头所属的地区网络”一栏系本文作者增加。

① Serhiy Leshchenko, “Sunset and/or Sunrise of the Ukrainian Oligarchs after the Euromaidan Revolution?” 2 June, 2015, <http://euromaidanpress.com/2015/06/02/sunset-and-or-sunrise-of-the-ukrainian-oligarchs-after-the-euromaidan-revolution/>

② “Fortune of richest Ukrainian residents declines three-fold for 2015”, <https://tass.com/world/872001>

乌克兰寡头及其资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寡头的资产聚集程度高。2014年，最富有的100名乌克兰寡头总资产占GDP的38%，几乎是俄罗斯同一比例的两倍。发达国家这一比例通常是10-11%。前10名寡头的资产又几乎占到了前50名的一半，艾哈迈托夫的资产更是超过前10名寡头的总和。^①第二，资产的地区及产业分布较为集中。总体而言，乌克兰寡头的资产与国家的产业结构、地区分布一致，具有地域性。乌克兰的经济基础主要集中在东部，寡头产业也大多分布在中东部重化工业地区，分为顿涅茨克帮、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帮、基辅帮、敖德萨帮和波尔塔帮等，主要集中于能源、采矿、冶金及机械制造领域。乌克兰的西部农业区很难产生大寡头，即便有，他们的实力和影响也无法与中东部寡头相提并论。第三，乌克兰大寡头大都多领域发展，钟情于媒体领域。他们认为，掌握了媒体就能把控舆论风向标和左右大选的民意基础。例如，乌克兰首富艾哈迈托夫的资产涉及采矿、冶金、能源及媒体；彼得·波罗申科涉及机械工程、农业综合企业、糖果工业及媒体；科洛莫伊斯基涉及采矿、石油加工、化工、冶金、航空运输及媒体；菲尔塔什涉及化工、钛工业、能源及媒体；平丘克涉及冶金、天然气开采及媒体；瓦季姆·诺温斯基（Вадим Новинский）涉及冶金、造船、天然气开采。尤里·科休克（Юрий Косюк）和谢尔盖·塔卢塔的产业相对比较单一，前者主要从事食品加工，垄断了乌克兰鸡肉市场，而后者则专注于冶金行业。^②第四，寡头商业的政治化程度高。出于保护和扩大自身商业利益的需要，乌克兰寡头有着极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强大的寡头集团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乌克兰寡头通过参加或组建政党、控制媒体，来操控和影响总统与议会选举，进而影响国家政策，以维护和扩大自身集团的利益。大部分政治人物在面临巨大利益诱惑时往往不可靠，因此，出于发展和保护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部分寡头选择了直接参与政治——通过担任国家高级职位及成为政府内阁成员，把权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

① Евгений Пожидаев. Украина, которую мы потеряли. 14 февраля 2014г. <http://www.rgnum.ru/news/polit/1767219.html>

② Денис Гаевский. Атлас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олигархата: кому реально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трана? 7 декабря 2017. <https://www.rubaltic.ru/article/politika-i-obshchestvo/07122017-atlas-ukrainskogo-oligarkhata-komu-prinadlezhit-strana/>

政治动荡导致寡头集团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但部分寡头们的财富仍在增长。“广场革命”后，在争取选票的过程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波罗申科和科洛莫伊斯基的寡头集团达成妥协，表明波罗申科在选举中承诺的去寡头化失败。在波罗申科的联盟内，千万以上资产的富翁就有 27 个。^①最初，波罗申科反寡头和放弃资产的意愿就遭到了怀疑。因为，事实上卸任时的波罗申科仍是上百家公司的实际拥有人。2018 年，他的收入增加了 82 倍，资产增加了 10%。^②他还被指控在任期内至少向国外转移了 80 亿美元的资产。^③实际上，乌克兰政局波动对寡头的影响程度有限。由于乌克兰新当局失去了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控制，依托重工业项目的艾哈迈托夫家族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因为这些地区构成了其政治和工业基础。虽然政局波动削弱了艾哈迈托夫家族的影响力，但他所拥有的资产依然使其有实力控制几十个地区的国会议员，并对一些国家机关的关键部门（其中包括国家垄断机构和监管机构）有影响。除此之外，凭借与时任总理亚采纽克（Арсений Яценюк）的关系，艾哈迈托夫的企业仍然得以继续在能源工业领域获益，包括成功地通过投标收购了两家热发电厂（Західенерго和Дніпроенерго），从而掌握了乌克兰 70% 的热能供应。

与此同时，寡头之间的博弈依然如故。亚努科维奇离任后，科洛莫伊斯基的策略是构建自己的政治权威。他成了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组建了自己的私人武装，在议会中渗透到各个派系，甚至不惜动用武力与当局争夺乌克兰石油运输公司的控制权。在被波罗申科赶出政坛后，科洛莫伊斯基把自己的关系网络转变为独立的权力中心，与前者展开权力斗争。^④科洛莫伊斯基参与成立了“人民公仆”党（在资本的推动下，几乎由电影《人民公仆》剧组原班人马改组而来），全力支持演员出身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① Kuzio Taras, “Impediments to the Emergence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Ukraine”, *Politics*, 2014, Vol.34, No.4, pp.309-323.

② Доход Порошенко за год вырос в 82 раза. 5 января 2019г. <https://ria.ru/20190105/1549039698.html>

③ Александр Саможнев. Порошенко обвинили в выводе с Украины 8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17 августа 2019г. <https://rg.ru/2019/08/17/poroshenko-obvinili-v-vyvode-s-ukrainy-8-milliardov-dollarov.html>

④ СМИ: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создает новую партию. 6 марта 2015г. <https://ria.ru/20150306/1051229181.html>

（Владимир Зеленский）竞选总统，并获得成功。科洛莫伊斯基的顾问、私人律师安德烈·博格丹（Андрей Богдан）担任泽连斯基竞选的法律顾问，随后出任总统办公厅主任，成为科洛莫伊斯基与新总统之间的重要纽带。

三、寡头干政对乌克兰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影响

考虑到产权的安全，寡头们多通过非正式政治操作来保护财富；而一旦产权得到保障，他们又会转而借助税收最小化的商业策略来进行收入保护。那么从长远来看，寡头将推动建立一种允许自己通过干预政治来保护财富的政治制度。^①虽然乌克兰已经实行了西方式的多党选举制度，但近 30 年以来，宪法几经修改，政治体制在总统议会制和议会总统制之间反复摇摆，基本保持了大总统和小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乌克兰的政治体制也被称为竞争性威权体制。寡头有机会在这样的体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利用自己的财力以及对媒体的控制，创造一个有利于执政政治精英的不平等竞争环境。^②而政党则被打造成依附于政治精英的竞选工具，不可能体现真正的民意。相关研究表明，在混合或半威权体制下，寡头们往往大范围使用非正式和非法手段来影响政治决策过程，以确保其寻租机会，进而滋生了寡头政治。^③就乌克兰的政治现实而言，寡头不仅掌握了国家经济资源，还组建了政党，通过亲自担任或“俘获”政府官员及最高拉达议员等方式，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竞争性威权主义”体系更趋向寡头化。

库奇马担任总统期间，乌克兰寡头政治体系得以确立，并表现出非常强的韧性。寡头企业不仅控制了主要的经济部门和大众传媒，而且组建了政党，从而更直接地干预国家决策，甚至操控“国家治理”。“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引发了寡头结构的洗牌，但寡头政治本身却没有改变，寡头的代表仍然对乌克兰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从而对国家治理和发展形成掣肘。

① Jeffrey A. Winters, *Olig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Steven Levitsky, Lucan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5.

③ Joel S.Hellman, Geraint Jones, Daniel Kaufmann, “Seize the State, Seize the Day: State Capture and Influence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3, Vol.31, No.4, pp.751-773.

（一）寡头政治与腐败问题直接相关

寡头政治是乌克兰国家治理和政治转型过程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腐败难除的根本原因。作为典型的寡头国家，寡头圈子往往可以决定国家利益，权力寻租被视为寡头集团与当权者之间“普遍而正常”的交易，腐败借此深入乌克兰政治的肌体。“国家在这个新资本主义机遇不断涌现、未经改革的体系中给予恩惠，但实际上却是在分配租金。”^①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估算，乌克兰亿万富翁的财富当中，只有10%来自不受寻租主导的经济领域。^②显然，乌克兰要摆脱腐败的困扰，就必须打破寡头与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但这一进程面临诸多挑战，过程也几经周折。

在“橙色革命”期间，尤先科曾承诺打击寡头，季莫申科也宣誓一定要把权力和资本这对连体双胞胎婴儿剥离开。然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寡头们转而拥护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乌克兰的寡头政治达到了顶峰。在“广场革命”中，地区党寡头们抛弃了困境中的亚努科维奇，支持独立广场活动，与前政权撇清关系，再次全身而退，得以继续经营和享受自己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寡头们依然遵循寻租优先于国家利益的观念。前总统波罗申科在巴拿马设立离岸账户的丑闻，以及陷入多起腐败与走私案件，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结果，乌克兰成为欧洲最腐败的国家，自独立以来大抵如此。基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2001-2019年腐败指标数据，乌克兰平均只有26分（满分100，分数越高腐败程度越低，全球平均水平约43分），最低的是2001年的21分，最高的是2018年的32分，2014-2019年（广场革命后）分别为26分、27分、29分、30分、32分、30分，每年都位于严重腐败国家之列。^③美国参议院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又名美国赫尔辛基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解释了乌克兰腐败猖獗的问题：寡头的韧性和影响力，是腐败难以去除的根本原因；寡头们占领了国家，驱逐了不腐败的政党，并在争夺乌克兰财富的斗争中相互竞争；寡头们与其说

① James Dean, “Ukraine: Europe’s Forgotten Economy”, *Challenge*, 2000, Vol.43, No.6, pp. 93-108.

② James Dean, “The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ly connected businessmen are most likely to prosper”, *The Economist*, 2014, Vol.410, No.8878, pp.57-58.

③ “Ukrain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https://www.theglobaleconomy.com/Ukraine/transparency_corruption/

是商人，不如说是经纪人，他们把政治和个人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家支持的垄断；如果说在 2013 年的时候，认为政府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选民有 80%，那么到了 2017 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 86%。^①

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曾因腐败问题而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贷款援助。“广场革命”后，乌克兰启动了调查腐败的计划，包括建立乌克兰国家反腐局（НАБУ）。然而，在起诉腐败个人以及追回被盗国家资产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重要成果。乌克兰经济及新兴市场长期观察员蒂姆·阿什（Tim Ash）失望地指出：“令人沮丧的是，助力乌克兰改革以及打破寡头掠夺、寻租循环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乌克兰独立 25 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下降至仅 2000 美元，是该地区的最低水平。”^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指出，乌克兰目前的生活水平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 20%，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和寡头经济的腐败；虽然建立了新的反腐败机构，但并没有产生“切实的结果”。^③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调查结果（2020 年 11 月），在评估泽连斯基就职一年来取得的成果时，只有 26% 的受访者认为他成功地减少了官员的腐败，66% 的受访者认为他没有成功；16% 的受访者认为总统成功地追究了前政府官员的腐败责任，73% 的受访者认为没有。^④所以，很难回答乌克兰何时能战胜腐败，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寡头资本统治国家，这一目标就难以达成。

（二）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受阻

在乌克兰寡头政治之下，为促进自己的商业利益，寡头与政治精英建立起了非正式网络，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利益关系，阻碍了市场导向和民主改革。关键经济部门的垄断限制了竞争，是乌克兰投资环境不佳的原因之一。大多数政治力量依赖大企业，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引导政府的是提供资助

① Хельсин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США: Олигархи захватили Украину. 18 октября 2017г. <https://ukraina.ru/news/20171018/1019394452.html>

② Taras Kuzio, “Analysis of Current Events: Structural Impediments to Reform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2, pp.131-138.

③ Украине не дали денег из-за олигархов и повальной коррупции. 27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lenta.ru/news/2019/09/27/no_money_for_ukraine/

④ Лидер Зеленский и неожиданный кандидат: кого украинцы поддержали бы на выборах. 27 ноября 2020. https://24tv.ua/ru/skolko-ukraincev-progolosovali-by-za-zelenskog-o-sejchas-rejting_n1326118

的寡头之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这往往导致乌克兰国家预算的巨额损失。在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政坛的寡头们形成了所谓的集团区域网络，将经济和政治行为体联合起来。在寡头非正式网络和政治之间，当权者支持寡头经济利益而获得的回报，就是选举支持和利益输送。亚努科维奇得以长期在乌克兰政坛呼风唤雨，主要依靠艾哈迈托夫等顿涅茨克网络大寡头的支持，而后者也借此掌握了国家绝大部分的煤炭和电力能源企业。国家执法者利用他们对税务警察或消防检查等监管机构的控制，对特定企业施加压力，同时忽视另一部分企业的不当行为。寡头们经常操纵政治决策过程，以保持和扩大寻租的机会，明显阻碍了私有化拍卖。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在乌克兰的私有化改革中，寡头们就曾阻碍了17项能源贸易、18项国家采购、19项国家援助等方面的改革。^①在与波罗申科的争斗中，科洛莫伊斯基就曾联合了70%以上代表的执政联盟，导致一项与自己利益冲突的法律议案未获通过（据报道，一张议员代表的选票价值1万美元）。^②

寡头们不仅从与政治精英的联系中获利，也受到这些精英的勒索，要对后者提供资金及选举支持。尤其是在竞选活动中。乌克兰寡头除选择正式的政治职位和议会席位外，一些大寡头还控制媒体控股公司，为他们提供在政治问题上影响公众舆论的机会。在乌克兰，媒体是左右政治舆论的重要工具，在总统大选和政治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寡头经常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舆论和政治活动。由于乌克兰消费者和广告商的需求，不足以让大型媒体公司盈利，所以规模较大的媒体公司基本都被大寡头所掌控。^③在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时期，政治反对派很难得到大众媒体的帮助。而随着拥有媒体的寡头改变立场或两头下注，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电视是乌克兰的主要新闻媒介之一，近80%的乌克兰公民选择电视新闻作为政治信息的主要来

① Keith Darden, "The Integrity of Corrupt States: Graft as an Informal State Institution", *Politics & Society*, 2008, Vol.36, No.1, pp.35-60.

② Heiko Pleines, "Oligarchs and Politic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1 pp.105-127.

③ 艾哈迈托夫控制着电视频道“乌克兰”、广播电台“柳克斯”、出版集团“今日”和《顿涅茨克晚报》。平丘克拥有6个电视频道和乌克兰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事实与评论》。科洛莫伊斯基是“1+1”电视台的幕后老板，这是乌克兰最大的私人电视台之一，他还拥有《主编》《基辅报》《UNIAN 通讯》等出版物。波罗申科是乌克兰第五电视频道和《记者》杂志的老板之一。

源。其中，51岁以上的受访者占到91%，36-50岁之间的占比为75%，18-35岁的年轻人（更信任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年龄段）占比也达到了60%。^①由于选择的有限性，很大一部分电视观众只能观看寡头们控制的电视台新闻节目。对于乌克兰寡头来说，媒体是塑造公众舆论的强大工具。媒体所有权的主要政治价值，就是能够支持特定政客的竞选活动，和营造自己所希望的舆论环境。例如，作为泽连斯基竞选造势的主场，科洛莫伊斯基旗下的“1+1”电视台在大选前夕，特意播放了关于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纪录片，这里的里根是由泽连斯基配音的，显然是一种直接的“暗示”。另外，泽连斯基参加的娱乐秀节目，也在大选前一天滚动播放。

至此，寡头们为保留和扩大寻租机会，助长了政治“暗箱”操作，从而严重损害了乌克兰代议民主制度。库奇马和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的乌克兰全球治理指标，都为负数（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先科执政时期和“广场革命”之后，民主质量虽有所提高（部分指标由负转正），但乌克兰仍被归为部分自由国家，公民社会建设任重道远。^②

（三）寡头利益博弈引发政局动荡

在威权政治体制中，寡头对政治体制通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新的统治者掌权，政治游戏规则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促使寡头调整政治策略。政治权力集团的突然变化，也会导致寡头的构成发生变化，一些人与新统治者发生争执，或者新商人通过与新统治者的关系被提升为寡头。独立后，乌克兰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寡头在其中并不是政治权力的掮客，而是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每一次总统更迭，都带来了宪法秩序的巨大变化，背后则是寡头之间的利益博弈。同时，乌克兰寡头精英政治的过度发展，直接导致中下层选民的政治边缘化，他们或者远离政治和投票，或者通过极端政治活动表达不满。^③

1996年，库奇马推动通过了乌克兰独立以来的首部宪法，确立了总统

① Почти 80% украинцев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нформации выбирают телевидение. 22 мая 2018г. <http://nikvesti.com/articles/131237>

② Heiko Pleines, “Oligarchs and Politics in Ukraine”, *Demokratizatsiya*, 2016, Vol.24, No.1 pp.105-127.

③ 张弘：“政党政治与乌克兰政治稳定”，《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27日。

议会制（半总统制）：总统是国家最高元首，内阁向总统负责，立法权归最高拉达。依靠寡头的支持，库奇马建立了一个竞争性威权主义政权，支持总统的力量在议会选举中成功获得多数席位，并获得了对媒体的非正式控制。议会反黑手党组织领导人格里戈里·奥梅利琴科（Григорий Омельченко）称“乌克兰是黑手党国家”。甚至库奇马总统在议会的代表也承认：“是领导者个人在系统地组织乌克兰政治。他们今天的活动影响了所领导组织的地位……因此，所有乌克兰政党、社会组织甚至国家机构都不过是装饰品，真正的政治是由十几个习惯于幕后交易之人的利益决定的。”^①对此，同样得到寡头支持的、以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为首的政治反对派，把寡头视为库奇马腐败和违规夺权的象征，要求政商分离并起诉寡头，发动了 50 万人上街的“橙色革命”，并夺权成功。相应地，乌克兰修改了宪法，实行议会总统制，总统权力被削弱。

在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干政仍然是乌克兰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突出体现在各方代理人在议会的激烈争夺，特别是在亚努科维奇和季莫申科之间，背后依然是寡头势力。^②尽管经营上面临困境，但大寡头们仍在 2010 年大选中一掷千金。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寡头开始两边下注。依靠顿涅茨克网络寡头的支持，亚努科维奇在赢得大选后，乌克兰重新回归总统议会制。亚努科维奇是超级寡头，在他之下是传统寡头，他们不得不与亚努科维奇家族分享利润。亚努科维奇通过政治支持来建立具有裙带关系的“家族”寡头集团，这对该集团之外的寡头地位和利益形成了挑战和挤压。作为地区党和亚努科维奇的主要支持者，艾哈迈托夫也对总统“家族”势力迅速扩张感到不满，并在独立广场事件后抛弃了亚努科维奇。

亚努科维奇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但政治反复仍在上演。2004 年的宪法得以恢复，乌克兰再次回归议会总统制，代议机构的作用得到强化。艾哈迈托夫极力在基辅当局和东部谋求独立的地区之间协调，既是为保护自己在顿巴斯的利益，也是在向新掌权者表示忠心。事实是，尽管亚努科维奇逃往俄

① Николай Вавилов.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ины вступил в схватку с олигархами. 6 декабря 2000г. https://www.ng.ru/cis/2000-12-06/1_oligarh.html

② Николай Томенко.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создается «совет олигархов Украины». 21 октября 2005г. <http://agrnews.com.ua/show/90059.html>

罗斯，但寡头们仍然是乌克兰政治的守护人。

（四）国家治理能力的匮乏与困境

独立以来的政治历史发展显示，乌克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一直存在国家治理能力匮乏的问题。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寡头手中，权力与资本高度融合，寡头政治成为国家治理模式，法律和立法权受到限制。乌克兰寡头集团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保持着自身的垄断地位，他们本质上不是政治家或商人，而是掌握资本的人，这是国家治理困境和动荡的根源。这主要是由寡头政治下的乌克兰缺乏社会资本和国家被食利者控制所决定的。一方面，乌克兰的政治精英相互缺乏信任，不仅是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同一政治力量内部也是如此。在这种气氛下，处理政治问题的强烈倾向更多是影响国内权力平衡，而不是促进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乌克兰政治摩擦的主要根源仍然是利益和权力，而不是思想和政策选择。由此，寻租被理解为利用政治职位谋取个人的物质利益，这已经成为乌克兰体制中十分普遍的现象。这样，主要的精英们经常互相怀疑对方无情地利用政治职务，来促进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他们断定自己别无选择，也只能这样做。^①这种低社会资本和寻租行为相结合，导致难以形成共识和有效决策，从而降低了乌克兰国家对内、外部冲击作出适当政策反应的能力。乌克兰寡头在对外关系上似乎也没有一个连贯的战略，出于个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往往对乌克兰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当大企业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寡头们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游说，而且通常情况下是成功的。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乌克兰独立以来的政治体制和外交政策一直处于摇摆之中。^②

乌克兰长期面临着系统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体制弱点和内部分歧，而这些分歧是由乌克兰社会各部分和它们各自依赖的东部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竞争导致的。^③结果是，国家错失了发展机遇，广大民众长期处于贫困之中，寡头依然沉迷于财富和权力的博弈。在乌克兰，精英

① Tor Bukkvoll, "East or West? Ukraine's Quandary", *Global Dialogue*, 2009, Vol.11, pp. 23-32.

② 葛汉文：“冷战后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思想”，《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5期。

③ Tatyana Malyarenko, Stefan Wolff, "The logic of competitive influence-seeking: Russia, Ukraine, and the conflict in Donbas", *Post-Soviet Affairs*, 2018, Vol.34, No.4, pp.191-212.

阶层正在重建卡尔·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亦即将大多数人置于贫困线以下，剥夺他们的权利和经济机会。^①在乌克兰寡头成为《福布斯》常客的同时，公共债务却使乌克兰成为一个没有未来的国家。到2012年，乌克兰国家转型已经整整20年，而实际GDP总量和人均GDP分别仅相当于1990年的70%和80%；截至“广场革命”爆发前的2013年底，乌克兰仅外债总额就高达1400亿美元，占到GDP的80%，而短期债务达650亿美元，是外汇储备的4倍，国家实际上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②“广场革命”后，乌克兰经济再暴跌1/5，通胀率在2015年甚至达到43.3%的灾难性水平（2016年通胀率为12.4%，2017年增至13.7%，2018年降为9.8%）^③，失业率达到11%（这只是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方法来统计的，还没有算上隐性失业）。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8年乌克兰经济比1991年降低了1/3，而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增长了2.5倍。^④大量的失业人群被“饥饿情绪”感染，他们很容易被动员起来，而动员工具就掌握在寡头手中。但是，即使在国家极端贫穷之时，乌克兰仍有3.5万个百万富翁和大约25个亿万富翁。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乌克兰最富有和最贫穷人口之间比例仍达1:35，而欧洲这一数字为1:6，俄罗斯是1:15（正式）和1:20（非正式）。^⑤乌克兰人期待的欧洲生活标准、养老金、工资和机会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自身经济仍在困境中挣扎。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度过了因货币贬值和经济萎缩而导致的财产缩水阶段后，寡头们又重新展开了对国家剩余财产的争夺。

（五）寡头干政仍在乌克兰持续

以倡导民粹主义起家的泽连斯基，迎合了民众对寡头集团的憎恨心理，多次表示要清除寡头对政治的干预，声称自己不是寡头手中的工具。在总统

① Karina V. Korostelina, “Ukraine Twenty Years after Independence: Concept Models of the Societ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13, Vol.46, No.1, pp.53-64.

② Динамика ВВП Украины с 1990 по 2019 годы. <https://seosait.com/dinamika-vvp-ukrainy-s-2002-po-2016-gody/>

③ “2018年乌克兰通货膨胀放缓至9.8%”，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经济商务处官网，2019年1月15日，<http://ua.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1/20190102827118.html>

④ Пять лет после Евромайдан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тоги. <https://ukraina.ru/exclusive/2018/1121/1021817148.html>

⑤ Константин Курылев.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ие кланы Украины: анатомия истории. <http://www.iarex.ru/articles/53440.html>

竞选辩论中，泽连斯基曾说道：“我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普通人，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打破这个现有体系。”^① 就任总统后，泽连斯基马上解除了 70 多个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其中包括 15 个州（乌克兰共有 24 个州）的州长，以及国家安全局的两名副局长。相应地，控制着国家重要基础设施、能源及重工业领域的寡头们，开始在政治上保持低调，转而积极赞助公益活动。^② 同时，泽连斯基表示已与寡头达成协议，后者愿意投资支持乌克兰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发展。平丘克同意为 24 名被俄罗斯拘留的乌克兰水手购买公寓。艾哈迈托夫准备投资建设医院及顿巴斯的道路和基础设施，为农村医院购买 200 辆救护车。^③ 2019 年 9 月 5 日，泽连斯基总统在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成立仪式上强调，该法院的任务是在惩罚腐败官员的同时，保护国家、社会和投资人的权益。^④

然而，事态的发展很快偏离了泽连斯基的预期，反对派抓住“录音门”事件^⑤，使泽连斯基最终在总理人选上让步。2020 年以来，在泽连斯基提拔的官员中，亚努科维奇、季莫申科与波罗申科时期的高官重新进入内阁。同时，新冠疫情使得泽连斯基被迫向寡头求援。2020 年 3 月 16 日，在抗击新冠疫情的会议上，曾誓言要取缔寡头政治的泽连斯基总统要求寡头们捐款 4.5 亿-5 亿美元，以创建一项独立基金用于对抗疫情，寡头们也承诺将向国家提供所有必要的支持。对此，泽连斯基在 ICTV 电视台的《言论自由》节目中說：“我对他们（指寡头们）非常坦率，我说这个国家喂你们吃了很长时间，现在是你们帮助这个国家的时候了。”^⑥ 相应地，寡头们还被划分了抗

① 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идет на выборы, чтобы сломать существующую систему. 20 апреля 2019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6355562>

②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Зеленского»: как олигархи борются за Украину. 25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9/09/25/12670705.html>

③ 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украинские олигархи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помочь стране. 20 июня 2019г. <https://ria.ru/20190620/1555751021.html>

④ В Украине наконец заработал Высший антикоррупционный суд: На открытии выступил Президент Зеленский. 5 сентября 2019г. <https://ua-reporter.com/news/v-ukraine-nakonec-zarabotal-vysshiy-antikorrupcionnyy-sud-na-otkrytii-vystupil-prezident>

⑤ 2019 年 12 月 16 日，在内阁经济和金融部门负责人研讨会上，总理贡恰鲁克（Алексей Гончарук）抨击泽连斯基不懂经济运行。录音流出后，乌克兰舆论哗然。

⑥ Зеленский попросил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выделить \$500 млн на борьбу с коронавирусом. 17 марта 2020г. <https://tass.ru/ekonomika/7997727>

疫责任区。^①这反映了当局对寡头能力和在乌克兰影响力的认可，也可以被看作是寡头干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表明乌克兰想要摆脱这种体系绝非易事。此外，在新冠疫情之下，2020年3月初被任命的新总理丹尼斯·什梅加利（Денис Шмыгаль）领导的政府通过决议：自4月15日起对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无烟煤和炼焦煤除外）征收65%的特别关税。这被认为是政府的爱国倡议，而事实上直接为寡头带来了巨大利益。毕竟，艾哈迈托夫公司的煤炭开采量占乌克兰全国的80%，其热电厂的运转大部分使用自己的煤，发电量占到了乌克兰电力市场的绝大部分。而自俄罗斯进口的煤炭，价格仅为艾哈迈托夫的一半。因此，乌克兰的电力成本可能是欧洲最高的——超过德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成本是欧洲的一半）。^②由此可以预见，艾哈迈托夫公司的利润将大幅增加。

相应地，《关于改善某些银行业监管机制的立法修正案》成为观察泽连斯基与寡头关系的重点。^③2019年11月中旬，曾资助反俄武装的亿万富翁科洛莫伊斯基突然接受《纽约时报》采访，表示与俄罗斯结盟是乌克兰的唯一选择。因为欧盟和北约永远不会接受乌克兰，而俄罗斯则希望与乌克兰重新结盟。科洛莫伊斯基的态度转变，似乎是不满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泽连斯基施压——向其追回从银行“窃取”的50多亿美元（泽连斯基本人不承认）。这应该也有为总统改善乌俄关系探路的意味，因为泽连斯基同时表态，

① 艾哈迈托夫的责任区有：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利沃夫州、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再加上他有较大影响的城市，如克里沃洛格。科洛莫伊斯基的责任区是扎波罗热州。伊戈尔·帕利察（Игорь Палица）的责任区是沃伦州和捷尔诺波尔州。平丘克的责任区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安德烈·维列夫斯基的责任区是波尔塔瓦州和基洛沃格勒州。科休克的责任区是文尼察州和切尔卡瑟州。斯塔夫尼采尔（Андрей Ставницер）的责任区是敖德萨州。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责任区是哈尔科夫州。参见 Татьяна Ивженко. Олигархи пробуют спасти Украин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6 марта 2020г.

② Оттепели с Москвой Киеву не видать Александр Артищенко. 19 марта 2020г. <https://versia.ru/zhadnost-novogo-pokrovitelya-vladimira-zelenskogo-oligarxa-rinata-axmetova-mesh-aet-naladit-otnosheniya-s-rossiej>

③ 2016年12月19日，波罗申科政府宣布对乌克兰最大商业银行普里瓦特银行实行国有化。理由是该银行面临巨额资金缺口，濒于破产，有可能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动荡。这不仅是关乎金融市场稳定的问题，也是寡头之间的争斗。2018年初，乌克兰央行公布了委托 Kroll 的调查结果，称该银行在国有化之前的至少10年里，遭受了大规模、配合默契的欺诈。但该指控被博格留博夫和科洛莫伊斯基否认。2019年4月，前总统波罗申科对普里瓦特银行的国有化改造被法院裁定为非法，欧盟支持依据 Kroll 报告进行起诉。

希望在没有西方国家出席的情况下，单独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纽约时报》评论道，无论科洛莫伊斯基改变亲西方的态度有何动机，他对乌克兰政坛乃至现总统泽连斯基的影响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尽管科洛莫伊斯基否认与总统泽连斯基有“特殊关系”，但他同时表示自己有能力推动形成这种亲密关系。^①2020年5月13日，乌克兰最高拉达二读通过了银行业法案，禁止将国有化银行返还给原来的所有者，并禁止已破产银行返回市场。总统泽连斯基亲自来到议会，提醒议员对国家和选民的责任，希望议员们支持这项旨在保护乌克兰经济的法案。^②事实是，基辅正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一项为期一年半的贷款计划，以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而该银行监管法案的通过是必要前提。^③有金融观察家警告说，法案的通过并不是对寡头的最终胜利，要不是这场新冠疫情危机和政府收入大幅下降，乌克兰当局永远不会与科洛莫伊斯基发生冲突。^④但科洛莫伊斯基的目标仍然是夺回对私人银行的控制权，当危机过去后，他仍可能会通过使用宪法法院来扭转局面。2020年5月20日，在执政一周年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总统表示，为了让乌克兰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里得到钱，该银行法案是必须通过的。同时，泽连斯基声称，他想与寡头建立“建设性和非游说关系”，并在面对某些金融集团时，给予反垄断委员会充分的独立性。他说：“我不是他们的说客，我和他们的关系应该很简单。我准备保护就业和保护乌克兰人，为他们的企业工作。”^⑤但他也无奈地指出，在乌克兰，很难找到一个不受某些寡头圈子影响的专业人士，“我找不到很多既专业又干净的人。”^⑥实际情况是，寡头仍然控制着媒体，并利用各种策略来干涉政治：自己领导或资助政党，或站在幕后，控制相当数量的议会议员，保持对乌克兰政治进程的影响。

① Украинский миллиардер боролся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и. Теперь он готов принять ее в свои объятия. 14 ноября 2019г. <https://inosmi.ru/politic/20191114/246225879.html>

② 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теряет «Приват». Верховная рада принял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законопроект». 13 мая 2020г.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343254>

③ Рад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запрет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Приватбанка Коломойскому. 13 мая 2020г. <https://ria.ru/20200513/1571374532.html>

④ Игорь Коломойский теряет «Приват».

⑤ Зеленский заявил, что олигархи не могут надавить на него, и пошутил о СМИ. 20 мая 2020г. <https://www.pravda.com.ua/rus/news/2020/05/20/7252419/>

⑥ Зеленский дал 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ю 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вого года работы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Украины. 20 мая 2020г. <https://tass.ru/mezhdunarodnaya-panorama/8521877>

（六）《联系国协议》的影响

2016年1月1日，乌克兰与欧盟自由贸易区协定（DCFTA）正式生效。2017年9月1日，乌克兰与欧盟《联系国协议》生效。2019年2月，乌克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加入欧盟和北约作为国家基本方针。修正案生效后，乌克兰总统、最高拉达和内阁，都必须按照与欧盟和北约一体化的固定路线采取行动，改革进程必须符合相关标准。

《联系国协议》取代了以前的合作框架（例如“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东部伙伴关系”），成为乌克兰和欧盟发展更深的政治联系、更强的经济关系和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工具。乌欧《联系国协议》文件有1000余页，要求乌克兰按照欧洲标准进行改革，涉及人权、安全、军控和消除贸易壁垒。^①协议为双方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自由和安全（包括移民）、科学与技术、教育、信息、税收和公共财政管理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新动力。欧盟以《联系国协议》为主要工具，全面介入乌克兰内部事务，还要求乌方就协议执行情况每年报告一次。作为《联系国协议》的一部分，自由贸易区协定有利于改善乌克兰的整体商业环境，包括遏制腐败。欧盟尤其重视乌克兰中小企业与欧盟规则的接轨。为帮助乌克兰小企业成长，欧盟利用DCFTA提供的机会，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小企业旗舰计划”。^②在这项计划框架下，欧盟委员会联合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为乌克兰建立了“中小企业DCFTA基金”^③。为中小企业创造有利的运营环境，不仅有利于增强经济活力和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打破寡头垄断和减少寻租行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加快与欧盟深化合作，泽连斯基政府计划将至少80%的欧盟法案纳入乌克兰法律。^④欧盟与乌克兰达成的《联系国协议》，将迫使后者的统治精英改变短期寻租前景，进行痛苦的、不受欢迎的改革。

① 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ассоциации между ЕС и Украиной. <https://meget.kiev.ua/soglasheniye-es-ukraina/>

② “中小企业旗舰计划”是欧盟实施的一项广泛的区域倡议，旨在为东部伙伴关系中的中小企业提供支持，以应对阻碍它们充分发挥潜力的挑战。

③ “中小企业DCFTA基金”是中小企业旗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的中小企业。“The DCFTA Facilities for SMEs”, 21 May, 201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5_5013

④ Украина решила для начал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интегрироваться в ЕС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15 октября 2019. <https://regnum.ru/news/polit/2748841.html>

四、结语

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乌克兰政治局势动荡不定，政治体制在总统议会制与议会总统制之间不断摆动，而寡头干政是其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寡头政治作为乌克兰精英政治的一部分，是非正式的，也是国家寡头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危机的原因，更是危机的结果。寡头们推动的是一种允许他们通过不定期干预政治来保护自己财富的政治制度。在库奇马当政时期，伴随着私有化的高速推进，乌克兰的未来寡头们迅速聚敛起个人财富，并很快与权力融合而形成寡头政治。尽管反对寡头政治成为发动“橙色革命”的核心诉求之一，但尤先科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干政仍然是乌克兰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亚努科维奇本人就具有深厚的寡头背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寡头在乌克兰经济、政治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广场革命”后，尽管亚努科维奇被逼出走俄罗斯，但寡头们仍担任了重要的政治职务。波罗申科本身就是寡头出身，而新总统泽连斯基能够当选也是依靠寡头的强大支持。

在乌克兰，伴随独立而来的是计划经济的瞬间崩溃，代之以巨额租金的形式，为私人盈利创造了机会。一些通过控制国内价格或是利用政治关系低买高卖，或是以补贴汇率形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和石油获利的人，成为可以操控乌克兰政府的各种寡头，致使政府与企业之间纠缠不清，陷入一种相互获取不当利益的恶性循环。乌克兰寡头不仅掌握国家的经济资源，还通过亲自担任或“俘获”政府官员及最高拉达议员等方式，进行权力寻租。库奇马的长期统治得到了寡头的支持，也使具有经济实力和对决策有影响力的寡头集团得以巩固。尽管这种情况在原苏联地区并不罕见，但与其他具有强大中央集权和威权色彩的后苏联政权不同，库奇马的领导层还是给反对派力量和民间社会的动员留有一定的空间。^①这也是“橙色革命”和“广场革命”能够连续上演的重要原因，而不仅仅是国家政治文化分裂的表现。同时，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广大民众无法通过合法渠道表达意愿，很难影响政府决策。于是，更多的人选择用街头政治的方式表达诉求。但所谓的革命并没有改变

^① María Raquel Freire, “Ukraine’s Multi-vectorial Foreign Policy: Looking West while not Overlooking Its Eastern Neighbour”,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2009, No.20, <https://www.ucm.es/data/cont/media/www/pag-72509/UNISCI%20DP%2020-%20FREIRE.pdf>

乌克兰寡头政治的实质。亚努科维奇和波罗申科的上台有赖于寡头的支持或本身就是寡头，而新总统泽连斯基的背后是科洛莫伊斯基。乌克兰的寡头政治体制并没有实质性地受到政治权力变迁的影响，改变的只是哪个寡头集团对政权的影响力更大而已。

寡头们已经深深融入乌克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之中。乌克兰许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剔除寡头影响。乌克兰需要降低寡头无所不在的影响，否则政府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就无从谈起。新总统泽连斯基主张通过公平规则，渐进、理性地解决乌克兰寡头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但乌克兰的政治、经济发展又表明，依靠内部的改革和革命已经难以彻底剔除寡头的影响。乌克兰的寡头干政已经成了一种持久的现象，无论是“橙色革命”还是“广场革命”，政府与寡头之间密切联系的性质，都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广场革命”后，随着乌克兰与欧盟快速走近，为借助外力倒逼内部改革、为乌克兰摆脱寡头政治，提供了可能的前景。通过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乌克兰政治与经济改革被纳入了欧盟的标准和轨道。但乌克兰所面临的市场和地缘政治风险、国内政治阻力也是显而易见的，打破寡头政治体系是一项长期挑战。

【Abstract】 Since Ukrainian independence referendum in 1991, influences of oligarchs have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feature and key factor of its political regime. With the overall transition in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some Ukrainian oligarchs have gradually established informal networks with political elites. They held formal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controlled major mass media, manipulating the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o maintain and expand their rent-seeking room. As part of Ukrainian elite politics, oligarch politics is informal, which is both the cause and result of the crisis. Oligarchs' monopoly in economy has hindered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of Ukraine. Power transfer in politics has had few impacts on Ukrainian oligarchy. And there are no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oligarchs as well. Actually, oligarchs' influenc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Ukraine's economy, politics and society. It will be a long-term challenge for

Ukraine to break away from its oligarch politics.

【 Key Words 】 Ukrainian Governance, Ukrainian Oligarch Politics, Ukrainian Elite Politics

【 Аннотация 】 С момента обретения Украино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лияние олигархии стало важной чертой и ключевым фактор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ей экономики, полит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в целом украинские олигархи установили неформальную сеть отношений с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и элитами и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ли процессом приня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занимая форм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олжности и контролируя основ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ля сохранен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извлечения ренты. Олигархия как часть украинской элитарной политики---неформальный процесс, процесс олигархи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оторый являе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причиной кризиса, но даже больше его результат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монопол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олигархов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развитию страны 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м процессам. Передач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ласти не оказала большого влияния на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ую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Украины, 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и олигархией не претерпе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изменений. Влияние олигархии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о в экономику, политику и общество Украины, и сл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олигархии будет долгосрочной проблемой.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Укра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украинская олигарх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ская элит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责任编辑 宋羽竹)

从议会选举到政治变局 ——吉尔吉斯斯坦西式民主的危机*

王林兵 雷琳**

【内容提要】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如期举行了议会制时代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在疫情与选情的交叠冲击下，败选的对立派政党挑起了一场以选举不公为口实、以疫情下部分选民为力量、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街头政治，最终推翻了热恩别科夫政权。这次政治变局，缘由两任总统之间权力斗争的激化，其在瓦解了吉尔吉斯斯坦过去十年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将改变各政治派系的行为模式。反对派政党或将更多地以暴力夺权的方式进行政治抗争。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极力推进宪法改革，也有可能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体制推回到总统制的框架下。这次政治变局，清楚地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中再度遭遇挫折，也预示着仅靠变更政治体制无法解决吉国的政局不稳问题。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局 西式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D736**【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2020)06-0165(36)

2020年10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如期举行议会制时代以来的第三次议会选举。在此次选举中，共有44个政党宣布参加竞选，最终只有16个政党

* 本文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指向性课题“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亚与中国西北边疆政治经济研究中心招标课题“议会制政体下吉尔吉斯斯坦政党政治研究”（项目批准号：XJEDU040316C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俄罗斯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议！

** 王林兵，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雷琳，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

符合相关要求，得以在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功登记注册。议会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亲总统政党大获全胜，反对派政党近乎全盘陷落，这直接激起了反对派政党及其支持者的强烈不满。在持续不降的疫情与跌宕起伏的选情叠加冲击下，选举进程被突如其来的政权更迭所中断。在政治变局发展进程中，选举结果被取消，国家权力机关被占领，部分领导人被迫辞职。反对派一些政治精英不仅夺取了关键部门的领导权，还积极谋求成立“临时政府”，以图取代执政当局。最终，在反对派的持续施压下，总统热恩别科夫宣布辞职。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央政权发生了自独立以来的第三次非正常更迭。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何以在“二次革命”阴影尚未完全退却之时，突然再次生变？政治精英们以两次“革命”为代价换来的议会制政体，又将何去何从？本文立足于对本次议会选举前后进程的考察，试图对上述两个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一、研究回顾与分析框架

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发生政权更迭后，关注中亚地区政治发展的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新政治事件做出了分析。

吉尔吉斯斯坦区域安全与国际关系专家马萨迪科夫（Т. Масадыхов）以政策策略为视角，在审思吉国家机构应对此次街头政治的方式后指出，“在 2020 年 10 月 4 日的选举中，人们只是出来表达抗议，如果政府能够通过专门的途径与这些政党对话，讨论他们的要求和诉求，并取消选举结果，那么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当局势在抗议中持续恶化时，政府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无力解决危机中的任何问题，最终出现了非暴力夺权。”^①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克尼亚泽夫（А. Князев）从国家机构的能力出发，指出了类似的问题，“议会虽然相对合法，但总体上没有能力，作为权力机构是虚幻的。”^②塔吉克斯坦民主党主席乌斯蒙佐达（Саиджафар Усмонзода）在考察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作模态后，强调民主模式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是导致吉政局

① Таалатбек Масадых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 близок к определению failed state. 16.11.2020. <https://cabar.asia/ru/taalatbek-masadykov-kyrgyzstan-blizok-k-opredeleniyu-failed-state>

② [俄]维多利亚·潘菲洛娃：“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中，俄罗斯扮演着什么角色？”2020 年 10 月 17 日，<https://new.qq.com/omn/20201017/20201017A0CRRB00.html>

持续动荡的深层原因。“这些事件已多次重演：举行新选举，出现新总统，但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这也表明，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模式与中亚人民的心态不符。议会制没有产生良好的效果，‘革命’永远不会结束。”^①

在我国中亚研究领域，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事件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兰州大学曾向红从“抗争政治”视角出发，认为权力分配格局失衡、南北地域政治斗争、政治精英腐败，是导致吉政局频繁动荡的体制性因素；而传统的部族主义、西化的民众政治心理、宽松的非政府组织政策，则有助于提高反对派动员抗议民众的能力。这两个方面因素持续相互作用，使吉尔吉斯斯坦相较于其他中亚国家更容易发生政治动荡。^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许涛从民族传统、公民观等角度出发，认为“吉尔吉斯斯坦以南北方集团的利益博弈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部族政治，以及建立在对社会民主和个人权利误读基础上的畸形公民观，使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近 30 年的政治发展，仍走不出政治死循环。”^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所景晓玉在分析了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政治事件与以往政治危机的差异后指出，“地域矛盾和部族矛盾是此次吉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疫情及疫情下的经济则起到了催化加速的作用。”^④除此之外，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还进一步指出，“吉此次议会选举危机的直接引信是反对派对选举不公强烈不满，但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吉迄今仍未能找到一条符合本国国情民意的发展道路。南北矛盾、经济贫困、失业率高企、政治腐败等都使吉尔吉斯斯坦政局隐患重重，险象环生。”^⑤

由以上观点可以看到，在对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发生政权更迭的原因进行分析时，中亚及俄罗斯的一些学者，更加关注的是政治体制、国家机构、民主模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国学者则更加关注部族政治、南北斗争、疫

① 刘若玮编译：“‘错误的民主’还是‘和平的激情’？专家再评吉尔吉斯斯坦事件”，2020 年 10 月 11 日，转引自<https://new.qq.com/omn/20201011/20201011A0A9QR00.html>

② 曾向红：“中亚‘民主岛’将出现第三次‘革命’？”2020 年 10 月 6 日，<https://new.qq.com/omn/20201006/20201006A0C7AJ00.html>

③ 许涛：“为什么又是吉尔吉斯斯坦”，2020 年 10 月 7 日，<https://new.qq.com/omn/20201007/20201007A0B7QC00.html>

④ 景晓玉：“吉尔吉斯斯坦动荡不休原因何在”，《工人日报》，2020 年 10 月 16 日。

⑤ 邓浩：“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危机透视”，《大众日报》，2020 年 10 月 11 日。

情与经济等因素在政权更迭中的作用，分析理路或多或少借用了“部族-区域主义”分析范式。

“部族-区域主义”分析范式的解释效力，建立在“一个前提”和“三个假设”同时成立的基础上。“一个前提”，是指非正式的部族互惠关系广泛存在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作中，并且部族间的利益争斗是推动吉政治变迁的核心动力，而南北区域间的矛盾对立是部族斗争的外化。“三个假设”，第一，确保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区域间政治势力的平衡以及“轮流坐庄”，是维护开放的“部族治理体系”^①、确保各部族公平共享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在于巩固开放的部族治理体系，使其对专制独裁的威权政治更具反应性；第三，政治精英和社会民众都有维护开放的部族治理体系的强烈动机，以便在执政者试图利用“家族专制”挑战该体系时，将其推翻以确保国家内部的权力平衡。以此理论范式解释吉尔吉斯斯坦的前两次政权更迭，不难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执政后期的“家族专制”，以及加剧南北对立的“党同伐异”做派，使开放的部族治理体系走向封闭，破坏了各部族共享国家资源的机会，因而招致广泛的政治反对，最终导致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但是，用此理论范式观察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的政权更迭，就陷入了解释力不足的困境。热恩别科夫执政以来，其延续了“二次革命”后在政府人事任命中“去部族化”的做法，并积极采用有利于缓解南北矛盾的话语进行政治叙事。^②在没有谋求“家族专制”复辟、鼓噪“南北对立”的背景下，热恩别科夫政权为何被推翻？在过去的政权更迭中，要么是“北方反对南方”，要么是“南方反对北方”，但为何此次变局却形成了“南方反对南方”的格局？推翻热恩别科夫政权的领导力量，为何却是同样来自南方的政党？这些都是“部族-区域主义”分析范式无法有力回应的现实问题。因此，要客观地分析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超越“部族-区域主义”分析范式来审视在吉政治体制之下，政党

① “部族治理体系”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各部族及其代理人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层级化的部族治国体系；二是政权在运作中，围绕在各部族间进行权力调节、资源整合、利益分配所形成的治理体系。

② 王林兵、雷琳：“吉尔吉斯斯坦现代精英政治对部族政治传统的消解——部族主义分析范式的局限性”，《西伯利亚研究》，2018年第6期。

间、政治精英间的博弈，以及它们与选民间的互动关系。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独联体国家是否出现政权更迭，“不是反对派或政府一方的原因，而是受到两者间互动关系的影响。”^①

任何政治变局的出现，都不可能是由某一种特定因素（如部族）催生的，而是由多重因素持续互构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②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局，正是由来自国家体制、政治派系、社会大众等多方面的多重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在三权分立原则下，无论吉尔吉斯斯坦采用何种政体形式，国家政权的巩固或更迭，始终由政治体制、政党结构、政治精英、选民群体四大力量共同塑造。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民主政治模式不是从本土社会内部生长起来的，而是移植于西方，因此其“政权-社会”互动关系总体是自上而下的，即政治体制塑造着政党结构，政党结构强化着精英偏好，精英偏好左右着其选民的政治取向。纵观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三次政权更迭，无一不是肇端于政治体制无力规制权力斗争，导致中央政权失衡。在这种失衡的权力格局下，政党之间充满了冲突性竞争，极易使议会选举的平台成为政党相互倾轧的“战场”。吉诸政党大多是由政治精英自上而下建构起来的，如果政治精英普遍具有较强的国家意识，那么政党间斗争的边界，往往会被限定在政治体制的张力范围内；反之，如果政党间的斗争裹挟着政治精英的利益私斗，则极有可能打破政权的稳定。当然，政治精英作为“关键少数”，脱离了社会性力量的支持，既不可能组建政党，更不可能在选举中影响政治进程。

综上所述，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发展态势的四大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结果，可简化为图 1 所示内容。在四个自变量中，政治体制能否有效规制权力斗争，对国家政权的发展态势起着主导作用。只有当政治体制、政党结构、精英偏好、选民取向，同时处在不利于国家政权稳定的状态时，政权

① 曾向红、连小倩：“从反对派与政府互动差异看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3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5-606页。

更迭才有可能发生。当政治体制能够有效制衡权力博弈时，即使政党结构表现出竞争性、精英群体偏好于个体利益、部分选民不认同政府，国家政权也大概率不会发生更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图示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仅仅揭示了吉政权更迭的一般性机制，而第三次政权更迭与前两次政权更迭之间的差异性，仍需要回归到政治变局的导火索——议会选举的前后进程中去具体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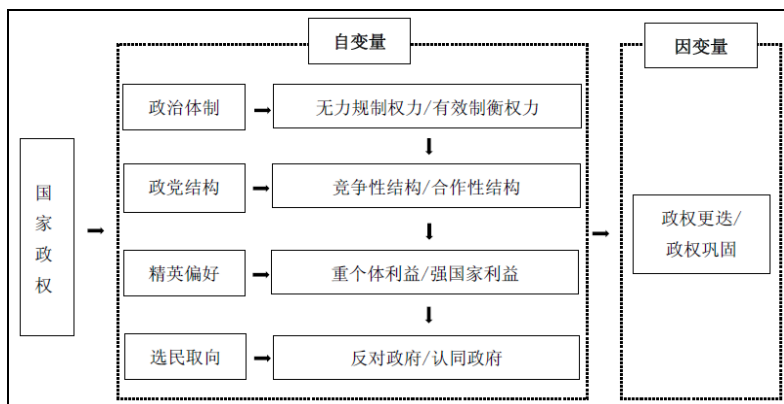


图 1 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或巩固的一般性机制

二、2020 年吉议会的选前博弈与选后斗争

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 10 月的议会选举，是在 2010 年颁布、又于 2015 年和 2016 年两度修订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宪法》，以及于 2011 年颁布后经 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三度修订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与议会选举法》的框架下举行的。频繁修订法律的初衷在于使政治运作更加精细化和制度化，并以制度力量建构更加团结的议会和更加稳定的政治局面。然而，过于急切的法律变革不仅加剧了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斗争，也为议会选举中出现政治变局埋下了祸根。

（一）规则调整与议会分歧

修改宪法和一般性法律，是吉执政精英推进政治变革的重要手段。2016 年 10 月，时任总统阿塔姆巴耶夫违背“二次革命”后人民公投做出的决定，

即“不得于2020年9月1日前修宪”，强行推进宪法改革。这一举动引起了议会中反对派政党以及社会民主党一些议员的强烈反对，而此次由修宪引发的议会内部分歧，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及时疏解。热恩别科夫执政后，为弥合议会内部因修宪产生的分歧与矛盾，开诚布公地强调，“回想2010年的事件，在尊重人民意志的同时，我认为没有必要再修改宪法。”^①与此同时，阿塔姆巴耶夫在执政末期所做的一些政治安排，如通过修改《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与议会选举法》，将政党进入议会的“双线门槛”分别提高到9%和0.9%^②，也在2020年议会选举前引发议会内部的激烈争论。这一“双线门槛”在2015年选举法中的规定，是政党进入议会须“在全国赢得不少于7%选票，在各州及比什凯克、奥什市赢得不少于0.7%选票”。^③围绕这一争论，议会内部分化为两大阵营，支持前总统政治安排的一派认为，提高议会选举门槛的初衷在于促进各个政党积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低选举门槛不利于政党进一步扩大以及形成成熟的政党体系，影响政治稳定。高选举门槛则能将小党排除在外，促进进入议会的政党不断发展壮大，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吉尔吉斯斯坦议会制的发展。”^④意见相左的一派认为，“如此之高的选举门槛根本不适应如今的政治现实，如果吉国拥有发达的政党体系，那么高选举门槛完全可以接受；但在我们国家，政党是利益伙伴的俱乐部，这是试图让寡头集团掌权并对新人关上议会的大门，是寡头集团对权力的垄断。”^⑤最终，在热恩别科夫的支持下，议会将选举门槛从9%降为7%。^⑥热恩别科夫在议会选举前夕再次表态：“我希望有5个或6个政党进入议会……，因此，我

① “没有必要对宪法做出修改——热恩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2018年12月21日，<http://cn.kabar.kg/news/lu1080/>

②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Закон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17), статьи 30.

③ О выборах Президент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депута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2015), статьи 64(2).

④ “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未选先热，议员建议政党进入议会的9%门槛降为5%”，《文汇报》，2019年10月30日，<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10/30/297949.html>

⑤ “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议会选举时间确定 寡头将保留谁？”《丝路新观察报》，2019年10月22日。

⑥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снизить избирательный барьер для прохожд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й 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 с 9 до 7 процентов//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 18.06.2020.

支持 7%而不是 9%的门槛，参加议会的政党越多，对国家越有利。”^①这次议会内部的博弈，并非围绕着总统与议会的权力分割，而是以议会选举为契机，就是否有必要对前任总统设立的选举规则进行变革而展开。阿塔姆巴耶夫将议会门槛提高至 9%，一个重要的考量是，在 2020 年议会选举中率领社会民主党继续成为绝对多数派，进而主导议会，发挥政治影响力。热恩别科夫否定了阿塔姆巴耶夫卸任前留下的政治安排，这不仅招致阿塔姆巴耶夫及其议会中追随者的不满，也加剧了两任总统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二）权力斗争与政党分裂

尽管阿塔姆巴耶夫卸任前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会再出任政治高层职务，也不会干涉新总统的工作，但在热恩别科夫接任总统后，其不仅未顺利地交权，还积极在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中安插亲信。热恩别科夫主政后，开始大刀阔斧地推进政治、经济和司法改革，其中包括加强地方行政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推进数字化转型、打击贪污腐败、改善营商环境等。尤其是强力打击腐败的举措，使两任总统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和公开化。在热恩别科夫授权下，吉检察机关对“过去十年中有关侵害国家财产的职务和经济犯罪进行重新审查，近 1700 起暂停审理或终止审理的案件被重新研究，450 多起案件被重新调查。”^②在这一过程中，阿塔姆巴耶夫时期上任的总检察长焦尔杜巴耶娃（Индира Джолдубаева）、前总理伊萨科夫（Сапар Исаков）、海关总署署长库尔马托夫（Кубанычбек Кулматов）、比什凯克前市长伊布拉伊莫夫（Албек Ибраимов）、第一副总理沙季耶夫（Аскарбек Шадиев）等高官纷纷因涉及贪腐而被解职。在反腐重拳下，阿塔姆巴耶夫留下的重要人事安排近乎被彻底轮换。其中前总理伊萨科夫的贪腐案件直接涉及阿塔姆巴耶夫本人，吉检察机关在热恩别科夫的支持下开始对其展开调查。阿塔姆巴耶夫也公开“炮轰”执政当局，并将相关反腐行动指认为“针对我和我家人的谎言及诽谤”。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开始全面走向公开化。2019 年 6 月，

① Президент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парламент должны пройти пять-шесть партий. 18.06.2020. https://24.kg/vlast/166529_vyiboryi-2020_prezident_schitaet_chno_vparlament_doljniy_proyti_pyat-shest_partiy/

② “吉尔吉斯总统承认反腐斗争遇到阻力”，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18 年 7 月 13 日，<http://sputniknews.cn/society/201807131025875036/>

吉尔吉斯斯坦最高议会通过表决剥夺了阿塔姆巴耶夫的“前总统”地位和司法豁免权，及至8月，吉强力部门将其逮捕。此后，为了安抚其他反对派政治精英以稳定政局，执政当局允许曾被阿塔姆巴耶夫政府指控“以暴力手段改变宪法秩序罪”和“煽动国家、民族以及宗教仇恨罪”的奥穆尔别克·巴巴诺夫（Омурбек Бабанов）从莫斯科返回吉尔吉斯斯坦，并释放了曾因贪污腐败罪被阿塔姆巴耶夫政府投入监狱的奥穆尔别克·捷克巴耶夫（Омурбек Текебаев）。此举也使吉尔吉斯斯坦并未因前总统被逮捕而立刻陷入动荡。由于两任总统均出身于社会民主党，二者之间的权力斗争直接导致了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派由支持热恩别科夫总统的萨金别克·阿卜杜拉赫曼诺夫（Сагынбек Абдрахманов）领导，名为“没有阿塔姆巴耶夫的社会民主党”；另一派由支持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的安瓦尔·阿尔特科夫（Анвар Артыков）领导，继续沿用“社会民主党”的名称，并退出议会以反对派自居。^①在议会选前登记注册和提名候选人阶段，两派相互攻讦，最终阿卜杜拉赫曼诺夫领导的一派宣布退出议会选举，而阿尔特科夫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在阿塔姆巴耶夫长子赛义德（Сеид Агамбаев）等人的参与下，更名为“吉尔吉斯斯坦社会民主党人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ы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СДК），继续参加议会选举。至此，在两任总统的权力斗争中，曾经赢得六届议会选举的社会民主党彻底走向了分裂。其他政党也出现了分化重组，如共和国-故乡党因矛盾而分裂，阿塔·梅肯祖国党与白鹰党先合后分，吉尔吉斯斯坦党与伟大的国家党、清洁社会党合并等等。^②经过分化重组，有的政党实力大增，有的政党却走向没落。

（三）新党崛起与选纲竞争

在议会选举之前，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政治呈现出“新党崛起、老党衰落”的图景，这是吉议会选举政治中的常态。纵观竞争历届议会席位的政党，无外乎三类：具有一定议会工作经验的政党、多次参加议会选举但未能成功的政党以及首次参加议会选举的政党。在2020年首次竞选最高议会席位的

① Топ-5 скандалов на старте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ампании. 14.09.2020. https://24.kg/obschestvo/163934_vyiboryi-2020_top-5_skandalov_nanbspstarte_izbiratelnoy_kampanii/

② 忽中瑞：“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形势及特点分析”，2020年9月18日，<http://www.easdro.org.cn/newsinfo/2249090.html>

新生政党^①中，团结党和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最受关注。团结党成立于 2014 年，其在热恩别科夫任职奥什市长时，还是一个青年运动组织，因与奥什当局共同致力于促进南部地区乌吉民族和解进程而受到关注。^②在此次议会选举中因吸收了来自共同党、社会民主党等的 28 名议员以及一些政府成员而声势大增，尤其是总统热恩别科夫弟弟的加入，一度使团结党被视为“准政权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成立于 2015 年，吸收了第六届议会的 13 名议员、6 名政府高官以及大批知名企业家^③，外加该党受热恩别科夫政府班底人物前海关总署副署长赖姆别克·马特拉伊莫夫（Раимбек Матраимов）家族的支持，因而也被视为“热门政党”。正是由于这些政治资本的加持，团结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以及亲总统的吉尔吉斯斯坦党，被认为最有可能跨过“双线门槛”成为议会党。^④

“新党崛起、老党衰落”这一常态现象，在 2020 年议会选举中又表现出一些新特性，即新老政党间有着明显的选纲竞争。新党趋向推行渐进改革，以促进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老党则趋向激进求变，力主对政治体制进行重大变革。前者主要包括上述三个“热门政党”；后者主要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共同党、爱国者党、阿塔·梅肯祖国党。参加此次议会选举的其他政党，几乎也都以“改革”为优先方向，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不过，大多数并未清晰地阐释如何将政策落实到位，因此未能在选前宣传中获得足够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将政治关注从候选人转移到了政党的施政纲领上。根据吉议会选举前的一项研究结果，31% 的选民表示将以政党的施政纲领内容为主要考量因素而作投票决定，只有 24% 的选民表示将根据各政党的候选人名单做出选择。^⑤

① 这些新近组建的政党，包括团结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正义发展党、远征党、改革党、社会民主党人党、部落党、爱国者党。

② A. Matveeva, I. Savin, B. Faizullaev, “Kyrgyzstan, Tragedy in the South”, *Ethnopolitics Papers*, 2012, No.17.

③ “Parties i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yrgyzstan-what are their chances”, 09.08.2020, <http://en.kabar.kg/news/parties-in-parliamentary-elections-in-kyrgyzstan-what-are-their-chances/>

④ Выборы-2020. О партиях власти. 03.02.2020. <https://elgezit.kg/2020/02/03/vybory-2020-o-partiyah-vlasti/>

⑤ N. Kasmalieva, “What do Kyrgyz parties propose in their pre-election programs”, 30.09.2020, <http://en.kabar.kg/news/what-do-kyrgyz-parties-propose-in-their-pre-election-programs/>

表 1 2020 年 10 月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主要政党的政策取向

新党		老党	
政党	政策取向	政党	政策取向
团结党	保护吉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加强族裔间的友谊； 优先考虑反腐败； 改革司法制度促进公平正义； 建立逐步消除贫困的体制系统； 引入免费医疗制度，建立高质量 医疗保健系统	共同党	国家不应干预商业； 总理由得票最多的政党提名并对其负责； 提高政党组织、国家机构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阿塔·梅肯 祖国党	严打腐败，腐败和贿赂应被视为叛国罪； 总理必须由议会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任命； 建立社会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型
		社会民主 党人党	从 2023 年起取消总统职位或将其权力降低为仪 礼地位； 建立一个没有总统实权的议会制共和国； 加强执法机构和司法机关改革
我的祖国- 吉尔吉斯党	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的机会； 将议员人数减半、精简政府机构； 建立现代化的医院，引入健全的 医疗保健系统； 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在议会中的代 表性； 保护居住在吉的各民族公民的权 利，鼓励支持发展各民族的语言、 文化传统； 根据各地区优势，因地制宜制定 发展政策	共和国党	取消总统职位，完全实行议会制，并授权总理全 权负责内政外交； 将议会代表人数减至 75 人，并将政府各部委由 16 个减至 7 个； 降低贷款税率并对医药、教育、旅游和新技术行 业实行免税； 清算所有国有企业和公司，并将资金用于支持中 小企业的发展

注：以上各政党的政策取向是根据它们公开的部分竞选纲领整理而来，内容来源于吉尔吉斯斯坦 24 小时新闻网：<https://24.kg/>

据表 1，由团结党和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为代表的新政党，在政策上聚焦“低政治”领域问题，以改善社会民生、增进国民福祉为目标，提出了保护公民权利、创造平等机会、逐步消除贫困、引入免费医疗、促进民族团结、发展地区优势产业等政策主张。这些政策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当前失业率高企、民族关系紧张、区域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滞后等尖锐的社会民生问题而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既为未来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也使这些政党迅速吸引了大量选民的认同。由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等为代表的老牌反对派政党，在政策上仍然聚焦于大多数民众日益漠不关心的“高政治”领域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改革，要么政策过激，如共和国党要求全面清算国有企业和公司，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么缺乏针对性，如“以激进主义而为人所知”的改革党，主张“立即对所有领域进行基本改革”。^①一般而言，竞选纲领内容的差异化，有助于各个政党按照不同的路线来吸引选民支

^① Nurzhan Kasmaliev, “What do Kyrgyz parties propose in their pre-election programs”.

持。但在此次议会竞选中，这种差异不仅未能促进两派政党公平竞争，反而导致彼此相互拆台、恶意攻讦。

（四）选举结果与街头斗争

为避免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以及方便流动选民在就近选站投票，吉中央选举委员会全面引入了电子自动计票系统，并大规模启用了“第二表格”临时投票方案。^①为杜绝一些政党利用“第二表格”非法组织选民投票，吉还出台了相关法律，对利用“第二表格”破坏公平选举的行为人，处以最高 26 万索姆的罚款、最长 3 年的劳动惩戒或最高 2 年的监禁。^②此外还规定禁止选民拍摄选票，对违反规定的选民，在处以 1 万索姆罚款的同时，取消其选票效力。然而，这些严厉的法律措施并没有真正杜绝选前舞弊行为。截至议会选举前夕，总检察长办公室累计收到了 83 份关于贿选和伪造选举文件的材料。^③鉴于吉尔吉斯斯坦过去几乎每次选举中都出现过一系列干扰选举进程的不稳定因素，执政当局加强了各个选站的安保力量。与此同时，吉尔吉斯斯坦新闻工作者独立联盟（IUJ）也宣布将在议会选举进程中，利用新媒体技术监测和分析在线出版物、社交网络中的仇恨言论，以帮助有关部门提前对不法行为进行干预。^④2020 年 10 月 4 日，吉尔吉斯斯坦正式进入选民投票阶段。在投票日，媒体报道了一些异常情况，如有些选民戴的口罩上印有某些政党的名字，但由于检察机关和中央选举委员会都无法判断这些行为是否与贿选有关，最终未对相关政党采取措施。下午 8 点，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投票结束。独联体选举观察团团长古明斯基（Viktor Guminskiy）高度评价了此次选举“在独联体地区是首屈一指的”。^⑤

① 所谓“第二表格”投票方案，是指吉尔吉斯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为方便那些身处外地且无法返回户籍地进行投票的流动选民，规定他们可以利用带有指纹生物识别的申请表变更投票地址。

② Правозащитники просят проверить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х по форме №.2// 24.kg. 28.09.2020.

③ Генпрокуратура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ла 83 материала по подкупу голосов// 24.kg. 30.09.2020.

④ Журналисты промониторят соцсети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языка вражды// 24.kg. 01.10.2020.

⑤ “Such voting complex as in Kyrgyzstan is first in CIS region-Head of Election Observation Mission”, AKIpress, 04.10.2020.

表 2 2020 年 10 月 4 日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 (%)

政党名称 \ 得票率	比什凯克市	奥什市	纳伦州	贾拉拉巴德州	塔拉斯州	伊塞克湖州	楚河州	巴特肯州	奥什州
团结党	16.49	51.81	23.12	24.63	18.89	14.41	19.74	22.92	30.31
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	16.45	17.59	15.29	30.50	21.43	21.42	24.05	22.53	32.71
吉尔吉斯斯坦党	3.55	6.73	12.74	8.38	12.26	6.47	13.28	6.56	7.71
统一—吉尔吉斯党	6.12	4.25	2.02	8.38	1.29	1.52	4.41	22.16	8.72
爱国者党	5.71	4.26	5.61	11.67	5.26	11.09	3.69	7.47	5.28
共和国党	10.45	2.26	5.76	2.79	18.91	9.14	5.57	3.32	2.23
阿塔·梅肯祖国党	5.49	4.51	5.66	2.00	5.74	7.03	5.32	3.27	2.32
正义发展党	4.88	1.89	6.60	2.54	5.33	4.71	3.49	3.00	1.81
共同党	2.25	2.06	2.36	3.79	1.58	1.49	1.76	4.50	4.00
远征党	4.89	0.28	4.05	0.39	1.28	8.16	3.59	0.22	0.19
现代人党	2.18	1.18	7.44	1.51	1.01	2.20	1.56	0.89	3.13
社会民主党人党	6.95	0.13	3.47	0.20	0.45	3.08	3.78	0.31	0.08
改革党	6.49	0.53	0.82	0.34	1.00	1.75	1.93	0.33	0.25
祖国团结党	1.04	0.08	0.74	0.21	1.63	2.81	0.52	0.25	0.06
“部落”党	0.33	0.03	0.25	0.11	0.38	0.29	0.51	0.18	0.04
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党	0.42	0.05	0.16	0.07	0.07	0.11	0.29	0.09	0.07
反对所有者	4.52	0.94	2.44	0.70	1.46	2.69	2.63	0.59	0.41

资料来源:根据吉尔吉斯斯坦 24 小时新闻网 2020 年 10 月 4 日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来。

当晚 10 时左右,吉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了国内 2430 个投票站的部分计票结果(表 2),团结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吉尔吉斯斯坦党、统一吉尔吉斯党等以大比分优胜于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等老牌政党,提前突破了议会选举的“双线门槛”。然而,这一选举结果不仅未能保证“优胜党”进入议会,反而招致“败选党”的激烈抗争,将吉政局推入动荡的涡流之中。改革党率先公开抨击这是“最肮脏、最不诚实的选举”,并宣称“我们党不会承认投票结果,我们将继续战斗”。^①随后,质疑选举结果的情绪迅速扩散,共同党、共和国党、社会民主党人党以及以微弱优势“跨过”选举门槛的统一吉尔吉斯党等选票落后方,集体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社会民主党人党带领部分支持者在议会大楼外短暂集会,呼吁吉尔吉斯斯坦人民不要接受选举结果,并宣称将联合其他政党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②

① В партии «Реформа» заявили о продолж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орьбы// 24.kg. 04.10.2020.

② Аида Джумашова. Члены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ы» разошлись. Обещают выйти завтра// 24.kg. 04.10.2020.

10月5日，在反对派势力的施压下，中央选举委员会开始对国内各个选站进行人工计票，之后宣布统一吉尔吉斯党与爱国者党跨过了7%的选举门槛。^①这一结果不仅没有平息抗议浪潮，反而激起了反对派势力对选举公正性的更大质疑，并要求政府在给定时间内宣布选举结果无效。由于当局未加回应，抗议人群开始打砸抢并冲击议会大楼，试图“抓捕”总统热恩别科夫，但被安全部队驱散。为避免政治骚乱，热恩别科夫宣布于6日上午与各政党见面。及至6日凌晨，示威人群高喊“热恩别科夫辞职”的口号，再次冲击议会大楼和其他政府机构，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前总理伊萨科夫、反对派议员萨迪尔·扎帕罗夫（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等被释放。当日，吉政治局势迅速恶化，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纳伦州、比什凯克市等州市政府被反对派政党的支持者占领，总理和议长等一些高官被迫宣布辞职。热恩别科夫发表全国讲话，谴责“一些政治力量试图非法夺取国家政权”。^②随后，南部奥什市爆发了支持总统热恩别科夫的游行活动，并引发了小规模冲突。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危机与疫情危机在动荡中持续加剧。控制议会和政府后，反对派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围绕着任命总理和成立“临时政府”等问题，分歧双方先后成立了两个并立的“协调委员会”。^③随后几天中，反对派一方面忙于内部缠斗，另一方面就总统辞职等问题向执政当局持续施压。

9日上午，总统热恩别科夫再次发表全国讲话，他表示，“对我来说，没有哪个职位比国家的完整、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宁静更高……，在行政机构的合法首长获得议会批准并且国家重回法治道路以后，我将辞去总统职位。”^④同日下午，热恩别科夫签署总统令，宣布比什凯克市进入紧急状态，

① 结果为：团结党 25.98%、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 24.56%、吉尔吉斯斯坦党 8.96%、统一吉尔吉斯党 7.62%、爱国者党 7.26%、共和国党 5.18%、阿塔·梅肯祖国党 3.71%、正义发展党 3.22%、共同党 3.21%、现代人党 2.25%、远征党 1.91%、社会民主党人党 1.38%、改革党 0.96%、祖国团结党 0.59%、“部落”党 0.17%、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党 0.13%。

② Заявление Сооронбая Жээнбек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пытались незаконно захватить власть// 24.kg. 06.10.2020.

③ 注：两个并立的协调委员会是指由共同党、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阿塔·梅肯祖国党、现代人党、统一吉尔吉斯党、爱国者党等政党领袖组成的“协调委员会”，以及由其他反对派政党领导人组成的“人民协调委员会”。

④ Дарья Подольская. Президент Сооронбай Жээнбеков готов уйти в отставку. При каких условиях// 24.kg. 09.10.2020.

实行宵禁并禁止游行、罢工等大规模集会活动。12 日，政府当局夺回了被反对派占领的议会大楼，并宣布比什凯克市再次进入紧急状态。此时，继欧盟之后，哈萨克斯坦、英国、联合国等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开始公开支持热恩别科夫总统地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同时呼吁各方势力回归到宪法框架下和平谈判。然而，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未改变反对派政党及其支持者的态度。14 日，在热恩别科夫签署总统令任命扎帕罗夫为总理之后，扎帕罗夫的支持者再次上街集会，要求热恩别科夫辞职。15 日，他们又一次举行集会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索隆拜·热恩别科夫在下午三点之前不辞职，那么萨迪尔·扎帕罗夫总理的支持者将前往阿拉·阿尔恰总统官邸。”^①在反对派力量的步步紧逼之下，为避免出现流血事件，热恩别科夫随后就社会政治形势发表全国讲话，呼吁和平并宣布辞职。^②16 日，由于议长拒绝出任代理总统，根据宪法规定，由新上任的总理扎帕罗夫代行总统职务。至此，这场由议会选举引发的政治变局，以总统辞职、反对派政党掌权而落下帷幕。然而，危机并未结束，正如政治分析家梅迪特·秋列根诺夫(Медет Тюлегенов)所指出的，对反对派政党而言，这“不能算是一次彻底的胜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尽管现在所有正式的权力机构已经恢复并正常运作，但各个政治集团间仍然存在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③

在反对派政党掌握政权后，重新进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了摆在执政当局面前的两大紧迫任务。在确定新的选举日期过程中，吉尔吉斯斯坦各党派间产生了激烈分歧。在各方势力的争论中，吉中央选举委员会于 10 月 21 日宣布，将新的议会选举日期定在 2020 年 12 月 20 日，新的总统选举日期定为 2021 年 1 月 10 日，并将第六届议会的任期延长至新议会产生。10 月 22 日，扎帕罗夫在议会的支持下签署总统令，暂停了选举法中若干条款的行使，同时宣布将议会选举日期推迟到宪法改革之后、2021 年 6 月 1 日之前。24 日，吉最高法院也裁定中央选举委员会关于新议会选举日期的决

① Юрий Копытин. Митинг в Бишкеке. Странник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выставили очередной ультиматум// 24.kg. 15.10.2020.

② Президент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ушел в отставку// 24.kg. 15.10.2020.

③ Timur Toktonaliev, “Fragile Compromise Calms Kyrgyz Crisis”, 15.10.2020, <https://cabar.asia/en/fragile-compromise-calms-kyrgyz-crisis>

议无效。^①时隔一周之后，萨迪尔·扎帕罗夫辞去代总统职务，并宣布参加新一届总统选举。^②为给未来执掌政权铺平道路，扎帕罗夫及其支持者积极推动修改宪法。11月17日，支持扎帕罗夫的80名议员呼吁举行全民公投，以通过新的宪法草案。根据该草案，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行政首长，任期5年，不超过两个任期；在职权上，总统的自由裁量权获得实质性的扩大，如总统负责确定国家内政外交的主要方向，并有权自行任免，或者根据人民库尔特建议任免国家委员会的各部委主席以及中央和地方行政长官；政府的结构和组成由总统决定，并且总统有权主持政府会议。^③扎帕罗夫推进修宪的举措招致了激烈批评，如改革党人表示，“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统治整个国家，那个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企图篡夺权力的人，总是以人民推翻篡夺者而告终。”^④除此之外，新宪法草案也被视为“反人民的”“是建立威权国家的尝试”。^⑤吉驻马来西亚大使别克纳扎罗夫（Азимбек Бекназаров）指出，“新宪法草案是企图篡夺政权，应当撤回，现政府没有从过去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如果不及时纠正，吉将爆发真正的民众骚乱。”^⑥“二次革命”后过渡时期代总统奥通巴耶娃（Роза Отунбаева）也呼吁扎帕罗夫三思而后行，应该把精力用于建设上，而不是与宪法做斗争。^⑦面对广泛的批评和政治压力，扎帕罗夫妥协并同意推迟宪法改革。^⑧目前关于宪法草案的争论仍在继续，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扎帕罗夫赢得2021年初的总统选举，新版宪法在经妥协修改后，将很快颁布施行。

① Верховный суд вернул жалобу ЦИК об отмен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24.kg. 29.10.2020.

②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сложил полномочия и. 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24.kg. 14.11.2020.

③ 80 депутатов инициировали закон о референдуме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и// 24.kg. 17.11.2020.

④ Руслан Харизов. Новый проект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 стане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24.kg. 18.11.2020.

⑤ 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В основе проекта лежит антинародная цель// 24.kg. 18.11.2020.

⑥ Азимбек Бекназаров. 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 это попытка узурпировать власть// 24.kg. 19.11.2020.

⑦ 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Роза Отунбаева обратилась к Садыру Жапарову// 24.kg. 20.11.2020.

⑧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согласен отодвинуть срок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24.kg. 24.11.2020.

三、吉政局生变的多维因素分析

反对派政党以选举为契机，鼓噪街头政治进而夺权，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民主政治难以破解的症结。在此次政局生变后，各类媒体不约而同地用“革命”来描述这一政治进程，而吉官方则将其定性为非法夺权的“政变”。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选举中的一个“政治事件”，例如哈萨克斯坦政治分析家鲍尔然·托列格诺夫（Бауржан Толегенов）就指出，“如果 2005 年和 2010 年的事件被明确公认为‘革命’的话，那现在则出现了分歧——革命或政变。一些政治分析家更倾向于使用具有中立性的词汇——吉尔吉斯斯坦事件。”^①但无论是“革命”“政变”，还是“事件”，都无法否认吉政权发生了更迭的事实，因此用更具描述性的词汇——“变局”似乎较为妥当，即 2020 年吉议会选举中的政权更迭，是一场由部分反对派政治精英以议会选举为契机，通过否认选举结果拉拢其他政党，并利用疫情下部分情绪消极的选民，以夺取政权、维护既得利益为目标而制造的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在保持了十年的政治稳定后，突然发生政权更迭，是体制性弊病与社会性问题双重叠加的结果。其中，政治体制无力规制权力斗争是政权更迭的根源，新旧总统势力之间的斗争是直接动因，党争民主失序引发混乱，政治共识破裂是“引爆器”，疫情下选民群体极化效应是“催化剂”。

（一）政治体制无力规制权力斗争

吉尔吉斯斯坦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塑造出了议会与总统并且各掌握一定实权的“二元中心”权力格局。在过去，这种权力格局使吉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之争始终贯穿于其他的派系斗争之中。并且由于政治体制无力规制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因而“南北斗争”“家族专制”构成了吉尔吉斯斯坦历次街头政治以及前两次政权更迭的直接动因。“二次革命”后，吉不断削弱总统权力、提高议会权能，有效缓解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同时为了避免“家族专制”的复辟，吉议会制时代以来的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同一个人当选总统的次数作了严格规定。但百密一疏的是，宪法和法律却

^① Эрмек Байсалов. Как 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оценивают события,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19.10.2020. <https://cabar.asia/ru/kak-sobytiya-v-kyrgyzstan-e-mogut-povliyat-na-strany-tsentralnoj-azii>

并没有对前任总统或代总统通过赢得议会选举，继续影响政权予以限制。这就为 2017 年总统权力交接后，热恩别科夫和阿塔姆巴耶夫两任总统之间出现权争，提供了体制性基础。正如华东师范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陆钢在“第二届中亚研究青年论坛”上所言，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前政治体制下，权力斗争开始出现一些新特征，即从“空间”转向“时间”，也就是从“南北区域之争”转向“新旧总统权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选举结果的不满取代了部族主义，成为反对派进行动员的根基；新旧总统间权力斗争的激化，取代了南北区域间的斗争，成为政权更迭的动力基础。

具体来看，选后各政治派系之间的政治斗争虽然带有南北之争的烙印，但反对派政党以及执政当局的支持者，都没有在相互对抗中鼓噪带有部族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政治对立话语。在前两次“革命”进程中，无论政治高层，还是社会内部，都充斥着对专制腐败的家族政治的强烈不满情绪。但热恩别科夫任职以来，除了在两任总统斗争初期，社会内部对“家族政治”有过短暂讨论外^①，无论是反对派政党还是独立媒体，都没有以“家族政治、贪污腐败、任人唯亲、裙带庇护”等为由，激烈地批评和抨击总统执政的合法性。或可以说，部族问题或家族政治，并未构成此次议会选举中街头政治的诱因。纵观参与选后斗争的反对派政党，既有来自北方的，也有来自南方的，它们因要求取消议会选举结果而相互靠拢。尤其是在斗争进程中逐渐取得领导权的南方政党统一吉尔吉斯党和爱国者党，在已经跨过议会选举门槛的情况下，仍强烈抨击执政当局，并积极与其他反对派政党共同采取行动对总统施压。而亲总统的政治精英在声援执政当局时，则极力保持克制，避免煽动区域仇恨。如政局动荡发生后，为避免南北撕裂，总统弟弟阿瑟尔别克·热恩别科夫第一时间回到南部重镇奥什，在劝解疏导示威人群时，强烈呼吁“我们不必将国家分为北方和南方……分裂国家只会使外部敌人受益。”^②总之，南北问题并非引发此次政治动荡的诱因。

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中，对选举结果不满并不必然造成政权更迭，

① [吉]努尔克孜·萨贝洛娃：“热恩别科夫谈近亲属是做什么的”，2018年12月20日，<http://cn.kabar.kg/news/lu1071/>

② “Assemblyman Asylbek Jeenbekov addressed the crowd”, AKIpress, 06.10.2020.

但在政治体制无力调和政治势力间的矛盾时，权力斗争的激化则会将弥漫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政治稳定的解构力量。“索隆拜·热恩别科夫的执政危机，始于他和他曾经最亲密的战友——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之间的分歧和争执。”^①阿塔姆巴耶夫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中，积极推动修宪的核心目的，是加速向议会制过渡，为社会民主党赢得 2020 年议会选举创造制度条件。然而，选举前，两任总统之间权力斗争的尖锐化和公开化，使阿塔姆巴耶夫及其追随者通过赢得 2020 年议会选举，继续掌控国家政权的希望彻底破灭，也激化了其支持者与热恩别科夫之间的矛盾。在议会选举前几个月，阿塔姆巴耶夫长子赛义德集结了同一立场的议员和党内成员组党参选，并试图通过选后挑起街头抗议向政府施压，进而释放阿塔姆巴耶夫及其支持者以重新掌握政权。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赛义德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党从一开始就注定与议会席位无缘，但推波助澜借势救出自己获刑的父亲和前总理伊萨科夫，恐怕是蓄谋已久的行动了。”^②为达到这一目的，在议会选举初步结果公布后，该党率先集结其支持者进行街头抗议。在社会民主党人党的鼓噪下，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政治诉求，也开始由要求取消选举结果，转变为要求总统下台。反对派政党在控制议会之后，迅速另立政府与总统对抗。在统一吉尔吉斯党领袖马杜罗夫和爱国者党领袖塔西耶夫等领导的“协调委员会”斡旋下，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爱国者党成员扎帕罗夫迅速被推向总理职位。而在政治变局中被释放的阿塔姆巴耶夫，却又遭逮捕和软禁。再次掌权的愿景化为泡影后，阿塔姆巴耶夫一方公开谴责“革命果实被窃取了”。^③吉尔吉斯斯坦中亚问题专家伊戈尔·舍斯塔科夫指出，“这次事件并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内容……总体情况表明，与 2005 年和 2010 年革命不同，现在没有理由以武力进行政权更迭……这更像是选举结束后针对某些政治势力的暴动。”^④由上可见，新旧势力之间权力斗争的激化是政权更迭的直接动因，

① Татьяна Кудрявцева. Плюсы и минусы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Сооронбая Жээнбекова// 24.kg. 17.10.2020.

② 许涛：“为什么又是吉尔吉斯斯坦”，2020 年 10 月 7 日。

③ “Revolution was stolen. MP Elvira Surabaldieva apologizes to protesters”, AKIpress, 13.10.2020.

④ [吉]叶甫盖尼·巴格列布尼亚克：“中亚‘民主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2020 年 10 月 19 日，刘若玮编译，<https://new.qq.com/omn/20201019/20201019A0F0DN00.html>

而这又根源于政治体制无力规制权力斗争，最终导致政治和平被撕裂。

（二）“党争民主”的失序

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选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党争民主”为主要模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所谓“党争民主”，是指在实行多党政治的代议制国家中，在选民一人一票制原则下，政党通过竞争选票赢得选举，进而参与国家政权的一种西式民主形式。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政党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仅能在选举期间得以维持，一旦选举进程结束，二者之间的关系将不复存在。无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党争民主”往往导致“否决型政治”的形成，即不同派系的政党彼此对对方的纲领、方针、政策持否定态度。在“党争民主”模式下，胜选的政党一旦获得政权，其目标不是要发展人民福祉，而是要利益分肥；而败选的政党对选举结果往往采取质疑、否定的态度。如果国家的法治化水平较低，那么败选的政党极有可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在高度异质化的社会中，“党争民主”模式往往会加剧社会内部的分裂和选民间的敌意，导致出现“为反对而反对的政党政治”。吉尔吉斯斯坦的宪法和法律，并不反对选民在选举结束后通过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政治意见，同时也不限制各个政党通过合法途径与方式展开谈判和斗争。然而，由于吉法治不成熟，“党争民主”模式中的抗争政治往往偏离法治轨道，造成“合法反对”让位于“暴力抗争”。

在过去相当长时期内，盛行于国家政权内部的部族政治、区域政治和恩庇政治，使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政党与执政政党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恶性竞争状态中。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都伴随着激烈的选后斗争。尤其是反对派政党，通过选后街头斗争来实现政治诉求，已成为它们最为熟悉、也最常用的手段。吉尔吉斯斯坦相对开放的议会制政体通过宪法确立后，各个政党都曾试图寻找新的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合作来共同影响政权。但由于吉议会制政体尚处于建构阶段，民主法治文化发展迟滞，政党间的利益协调也不充分，在此背景下，热恩别科夫执政当局持续推进的政治改革和反腐斗争，让诸多反对派政治精英忧虑总统是在“借反腐之名清除异己”。“人人自危”的反对派政治精英，对执政当局的不信任感和派系斗争思维，也再次被迅速激活。在 2020 年议会选举中，尽管选举投票进程受到国际观察团的认

可和赞誉，但选举结果预示着该国将出现一个几乎没有反对派政党的议会，这直接触及反对派政党最为敏感的神经。于是，在败选政党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党争民主”模式下的竞争性选举恶化成敌对性政治，议会斗争变成了街头斗争，压力机制变为暴力机制。一切“合法反对”的途径与手段都被弃置一旁，选后抗争滑向了暴力夺权。由此可见，如果说对选举结果的不满构成了2020年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的动员基础，那么“党争民主”失序则是这种政治动员的结果。正是失序的“党争民主”使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在经历了十年的和平进程后，似乎又吊诡地回到了“起点”，再次陷入“民主-混乱-政权更迭”的怪圈。

（三）政党政治的共识危机

尽管历次政治动荡都有大量选民参与，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政治，仍旧是一种精英政治。所谓精英政治，是指在一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政治精英，通过权力继承或民主选举进入政权内部，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国家机构进行政治统治、社会治理和价值分配的一种政治运行模式。2020年吉议会选举中出现的街头政治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统治精英内部的对抗。这种对抗既包括现任与前任两位总统势力间的纷争，也包括支持总统制与支持议会制统治精英间的博弈。他们之间的对抗以“党争民主”的方式呈现，以政党政治共识破裂为“引爆器”，最终肢解了热恩别科夫政权的合法性。在多党制国家中，“党争民主”意味着竞争性权力共享。“党争民主”模式下的竞争性权力共享，又往往以一定的政治共识为基础。阿伦·利普哈特认为，“共识民主模式的核心理念在于代表‘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它以包容、交易和妥协为特征。”^①因此，政治共识是“党争民主”有序运作的必要前提。当共识是“党争民主”过程中的主导性条件时，不会带来严重的党际分裂和冲突，诸政党倾向于承认和维护彼此之间参与、接触政权的权利；当对抗冲突充斥于“党争民主”选举中时，诸政党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政治分裂，这一分裂如果得不到遏制和修复，最终会导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被瓦解。政治共识可粗分为三大层次，即政策共识、政体

^① [美]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陈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共识和国家共识。“政党正是因其曾经承担的代表功能、表达功能和组织功能等基本功能，才被视为‘好东西’”^①，但也“由于政党的‘派系’天性、‘寡头统治’倾向以及‘经济人’行为，政党竞争往往会诱发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所谓政党政治共识危机，是指各个政党在有关政党政治生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准则等方面未能享有共同认同。”^②政党政治共识的破裂，会直接导致政党对政府政策、政治体制甚至国家政权的认同危机。在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后发展国家中，虽然民主政治规则被建构起来了，但这些规则在政治运作中时常因政治共识破裂而被破坏。尤其是在权力斗争中，包容性共识的“终结”，往往会引发反对派势力的强烈抗争，甚至通过革命或改变的方式，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

“党争民主”模式下政党政治的有序运行，依赖于以寻求共识为取向的政治文化。吉尔吉斯斯坦高度分裂的社会结构，使其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碎片化的政治文化。形态各异的部族主义、区域主义、民族主义等政治文化，在加剧社会分裂的同时，也导致政党政治缺乏统一且稳定的意识形态基础。在2020年议会选举中，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提出了“欧亚主义”意识形态，试图以这种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来塑造出更具包容性的新政治文化，但并未得到其他政党的认同和共鸣。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进程中，政治精英结构由最初的苏共党化结构，经技术官僚结构和家族寡头结构的演化，已进入政治共识型结构的建构阶段。^③在经历了两次“革命”后，政治精英间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共识，如多党联合执政以抗拒独裁专制，南北轮流坐庄以规避政治分裂，严惩腐败以消除家族政治，促进民族和解以维护社会稳定等。政党政治也在这种政治共识基础上运作。不过，由于吉政治精英普遍缺乏国家利益意识，过于强调小团体和政党的得失，因而这些建立在共同“革命记忆”和利益分配基础上的政党政治共识，根基显得十分薄弱。

① 叶麒麟：“共识危机：政党政治危机研究中一个被遗漏的议题”，《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9期。

② 叶麒麟：《社会分裂、弱政党政治与民主巩固——以乌克兰和泰国为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3-37页。

③ 王林兵、雷琳：“吉尔吉斯斯坦的现代政治精英研究——起源、特点、变迁与影响”，《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6期。

即使各政党都在努力改变政治观念和行为习惯，但任何打破权力平衡的国家政策和政治进程，都可能瓦解这种脆弱的政治共识。在议会选举过程中，不同派系的政党分别提出了两种内容迥异的施政纲领，这无形中造成了新老政党派系间的利益对立。在新旧政治势力的矛盾尚未走向和解、选举结果又不符合反对派政党利益的情况下，建立在避免分裂和维护稳定基础上的政治共识，便迅速在街头政治中被肢解。反对派政党对总统反腐政策的敌视、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亲总统政党施政纲领的不认同等相互交织，不断加剧着吉政党政治的共识危机，最终导致热恩别科夫政权的合法性也被彻底否定。

（四）选民的群体极化效应

由于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为6年，且同一人不能两次当选总统。急于改变国家政治经济现状的热恩别科夫，在执政后即大力推行政治经济“双轨并行”的改革路线。通过三年努力，吉尔吉斯斯坦全国贫困发生率从2017年的25.6%降至2019年的20.1%，极端贫困人口比重从0.8%降至0.5%。

然而，受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改革的政策红利被经济衰退所吞噬，侨汇收入也迅速锐减，这无疑加剧了人民的贫困状况。不过，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侨汇收入对南部地区的影响远大于北方，尤其是将劳务移民收入从消费成本中扣除后，南部地区的贫困率大幅提高，而北部地区则几乎没有明显变化。

此外，从地域看，2017年至2019年三年间，吉北部地区贫困率总体下降幅度要好于南部地区（表3）。

可吊诡的是，在吉尔吉斯斯坦2020年的政治变局进程中，深陷贫困境遇的南部民众，并没有积极响应来自南部地区反对派政党的号召，去激进地攻击政府；而攻占中央政府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力量，主要来自北方。尽管许多学者认为贫困是导致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但2017年以来的贫困率数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贫困并非导致政治变局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困问题助推了反对派的力量和势头，正如热恩别科夫在评论引发政权更迭的选举时所言，“消除贿赂，有必要改善人民的经济状况。我们正在为此而努力，对我们来说这是主要的任务和目标。”^①

①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изнал, что подкуп избирателей стал проблемой// 24.kg. 05.10.2020.

表3 吉尔吉斯斯坦 2017-2019 年全国及各地区的贫困率 (%)

地区 \ 年份	2017		2018		2019	
	实际贫困率	不计侨汇收入的贫困率	实际贫困率	不计侨汇收入的贫困率	实际贫困率	不计侨汇收入的贫困率
全国	25.6	34.0	22.4	32.2	20.1	31.2
巴特肯州 (南)	40.5	60.2	33.8	54.6	32.6	53.7
贾拉拉巴德州 (南)	32.6	43.0	32.2	44.9	26.9	42.4
奥什州 (南)	14.3	32.5	14.8	36.1	14.0	37.7
奥什市 (南)	33.5	41.5	35.5	42.1	20.7	26.9
伊塞克湖州 (北)	24.2	25.3	21.5	24.4	24.4	26.8
纳伦州 (北)	29.2	29.2	30.6	30.6	28.1	28.5
塔拉斯州 (北)	20.7	21.6	22.1	24.0	13.3	16.5
楚河州 (北)	33.3	36.7	15.6	19.5	19.1	24.9
比什凯克市 (北)	15.9	15.9	15.4	15.6	11.9	11.9

数据来源: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Уровень бедности 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2020.06.

在欠发达国家中,经济社会现代化迟滞、政治制度不巩固、民主法治不健全等,是导致政治动荡的普遍性原因,但并非存在这些问题的国家就一定会发生政权更迭。在一些情况下,社会分化和选民分裂更容易将社会运动推向政治动荡。由于民族关系紧张、经济状况低下、政治动荡频发等多种因素影响,吉社会内部一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沮丧情绪。但在这种氛围中,大多数民众选择忍耐并积极寻求新的生活出路,并对政治漠不关心。此次议会选举的历史最低投票率(仅 53.74%^①)便是例证。只有少数群体,把这种沮丧情绪转化为激进的政治态度。不同的政治心理,使吉尔吉斯斯坦选民分化为两类,一类政治态度保守,在行使投票权利后,并不热衷于其他政治活动;另一类政治态度激进,在选举前后以积极行动表达政见。选举后的政治运动,只是一部分社会群体或政治集团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它的形成并不代表普遍民意。正如政治分析家巴克蒂古洛夫(Шерадил Бактыгулов)所指出的,

① Выборы-2020. Талас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отдала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Мекеним Кыргызстану». 04.10.2020. https://24.kg/vlast/167471_vyiboryi-2020_talasskaya_oblast_otdala_predpochtenie_mekenim_kyrgyzstanu/

“在吉尔吉斯斯坦，尽管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且政治意识模糊，但他们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遗憾的是，当人民真正想要改变时，现实却朝着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①

从选举的地理视角看，尽管吉各政党都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但它们的选民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一些南方政党在北方也能拥有可观的选票，北方政党亦是如此。由于民众普遍对民主制度的认知与理解程度不高，在选举前后政治斗争失控时，群体极化效应会进一步加速事态的恶化。所谓“群体极化”，是指拥有共同立场偏向的大众群体，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下，逐渐达成意见统一并积极采取行动，直至偏离理性轨道走向极端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激烈的议会选举竞争中，群体极化效应往往导致保守的选民更加缄默，激进的选民更加活跃。在“党争民主”模式下，态度激进的选民通常视自身与其政党为一体。当其支持的政党失利后，他们往往把囿于内心的社会沮丧感和政治不满情绪，以极端的方式表达出来，甚至不惜以暴力的途径瓦解政治秩序。在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议会选举中，疫情与选情的双重叠加，不断强化着部分选民的激进态度和立场。正是这些激进选民的群体极化效应，助推着选后政治精英间斗争的白热化，最终以夺权的方式推翻了热恩别科夫总统。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在疫情与选情双重叠加下，选民的群体极化效应在政治变局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但变局中的政治斗争，仍然是政治精英间围绕着争夺政权而展开的。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变局主要以政治精英相互斗争的形式持续推进，并以政权的非暴力更迭、而不是“暴力革命”为终结。

四、吉政治变局后议会民主政治的发展态势

“在很多人看来，吉尔吉斯斯坦正在失去其中亚民主岛的形象，并开始被认为是一个正在经历制度危机的国家。无论如何，社会中的抗议部分是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事件的，而这种支持更像是对精英阶层的教训，也是对特权

^① Мехриниса Сулайманова. Подкуп избирателя – одна из основных проблем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выбор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28.09.2020. <https://cabar.asia/ru/podkup-izbiratelya-odna-iz-osnovnyh-problem-parlamentskih-vyborov-kyrgyzstana>

阶层疲倦的表现。”^①在过去两次“革命”和数次修宪斗争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体制几经流变，但都未能走出制度危机，2020年政权更迭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夺权上台的政治精英，或许对制度危机同样束手无策，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变革。

（一）政治体制改革充满变数

“由于曾受到威权主义社会化的影响，新民主国家的民众往往将政治甚至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理想。”^②为了把这种理想转变为现实，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精英在独立后近三十年来，始终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与其他一些中东欧国家相似，吉尔吉斯斯坦以开放党禁、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来重构政体，试图“从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领导体制转变为注重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加强不同力量的政治参与。”^③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制度却比一些中东欧国家更容易崩溃。有些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所处区域里或其邻国中，民主国家的比例越大，该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可能性就越高，崩溃的可能性也越低，正是由于受到周边国家威权主义政治外溢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制度才始终难以得到巩固。

相较于这些外部因素，吉政治精英则更认为，是总统权力过大导致了民主制度的崩溃。围绕着削弱总统权力，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建构起了总统制、总统-议会制、议会-总统制和议会制。由于前三种政治体制在吉都已宣告失败，现行的议会制政体又陷于制度危机中，反对派政治精英们刚上台就在如何变革政治体制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代总统扎帕罗夫一派认为，应立即修宪，扩大总统权力，由总统领导政府，并且主张副总统从人民库尔泰中产生。^④意见相左的一派认为，应该废除总统，由总理统摄内政外交。受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家长制”心理固化的大多数吉尔吉斯斯坦民

① Эрмек Байсалов. Как обще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вашей стране оценивают события,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19.10.2020.

② [英]安雅·诺伊恩多夫：“转型中的民主：看待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变革的微观视角”，《国外社会科学》，王文娥编译，2011年第4期，第21页。

③ 杨友孙：“冷战结束后中东欧政体转轨及其得失”，《俄罗斯研究》，2018年第2期，第161-162页。

④ Кыргызстан: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ующие стороны нащупали хрупкий компромисс. 15.10.2020. <https://cabar.asia/en/fragile-compromise-calms-kyrgyz-crisis>

众，或许不会认同没有总统的政治安排，这从吉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关注远高于议会选举便可窥见。^①在经历了两任总统“家族专制”统治后，吉民众也不太可能接受不断扩大总统权力的政治安排，如在扎帕罗夫支持下，吉最高议会新修订的旨在扩大总统权力的宪法草案，就遭到了民众的集会反对，并将修宪视为“非法行为”。^②面对舆论压力，扎帕罗夫不得不做出妥协，但其并没有放弃扩大总统权力的诉求，“议会已经收到了关于将《宪法》草案^③付诸全民公投的提案，这些提案建议应由人民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政体形式……让我先问问人民，你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宪法》草案提供了两种政体选择——总统制或议会制，但是我想引入一种新的混合政体即‘总统-议会制’。”^④由此可见，在吉尔吉斯斯坦未来的政治体制框架中，总统与议会并存的权力格局，仍将持续下去。

在政治变局发生之初，吉政治分析家若罗耶夫（Эмил Жороев）认为，支持扎帕罗夫的人并不会同意立刻修宪，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要在现行宪法框架内赢得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但议会选举后，他们将会积极推动这项改革。^⑤然而，现实情况是，扎帕罗夫及其支持者们并不打算为修宪改革提供足够长的政治冷静期，而是迫不及待地企图利用变局后的政治余波，助推扩充总统权力的修宪进程，建构起“强总统-弱议会”的政治体制。未来，如果当权派通过修宪扩大了总统权力，那么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将会愈演愈烈，未有穷期。过去近三十年的政治发展表明，“吉尔吉斯斯坦无论从法理还是从权力运作实践上，都不能容忍‘双头政治’的基本现实。”^⑥

① 关于历次选举投票率之比较，参见拙文“吉尔吉斯斯坦‘低态化’政党政治形成的制度性因素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② В Бишкеке проходит митинг против нового проекта Конституции. 22.11.2020. <https://ru.sputnik.kg/news/20201122/1050520145/bishkek-miting-zashchita-konstituciya.html>

③ 新《宪法》草案以巴基耶夫时期的2006年《宪法》为蓝本，而2006年《宪法》建构起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正是“总统-议会制”，在这种体制之下，总统与议会之间陷入了无休止的权力争夺。Новая редакц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За основу взят проект 2006 года// 24.kg. 19.11.2020.

④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согласен отодвинуть сроки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реформы.

⑤ Кыргызстан: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ующие стороны нащупали хрупкий компромисс. 15.10.2020. <https://cabar.asia/en/fragile-compromise-calms-kyrgyz-crisis>

⑥ 杨进：“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被抓捕：权力规则已改变”，《世界知识》，2019年第17期，第39页。

无论是阿卡耶夫还是巴基耶夫，他们修宪扩权的政治行为，都招致了激烈的批评和反对，并且他们的政府最终也都被推翻了。在 2020 年 10 月的议会选举中，主张以宪法改革推进议会制政体发展的政党，几乎都是由参与过“革命”的政治精英组建或领导的，但它们的政治诉求和政党利益在新的政治安排中，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些政党实力不俗且政治斗争经验丰富，扎帕罗夫等当权派几乎很难限制它们的发展壮大。这些政党一旦赢得议会选举，它们将利用议会与总统展开较量；如果不能进入议会，它们则极有可能在选后挑起街头政治，再次推翻集权总统的统治。

（二）党争民主弊病难改

吉议会选举制度，在过去总统与议会的斗争中，几经变革。多数代表制、混合代表制、政党比例代表制等，在不同时期都曾被引入议会选举中，目前实行的是政党比例代表制。2020 年政权更迭后，各党派围绕着减少议会席位、变革计票方式、限制议员任期、降低选举门槛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在议会席位数量设置上，一些政党主张将席位减少至当前的一半即 60 个，也有政党主张降至 75 个，扎帕罗夫等当权派主张降至 50 个。尽管在席位数量设置上莫衷一是，但在减少议席这一问题上则达成了共识。在计票方式上，大多数政党仍主张实行政党比例代表制，因为这样不会剥夺小党进入议会的权利，显得更加公平；但其他政党则主张实行多数代表制，因为在政党比例代表制下，政党编制候选人名单的过程缺乏透明度，削弱了公众对政党政治的信任。针对这一争论，吉国的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应该采用多数代表制。“如果在下次选举中，我们按照混合代表制或完全按照多数代表制进行投票的话，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社会对此有需求，在社交网络中，已经有很多人呼吁现在是时候放弃比例代表制了。”^①在议员任期及当选次数的问题上，主张采取限制措施的一派认为，这有助于政治精英队伍更新，避免垄断特权和贪污腐败；而意见相左的一派认为，限制议员任期和任职次数，违背了政治民主，也剥夺了选民为他所支持人物投票的权利。^②

① Мария Орло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 может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аж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е// 24.kg. 05.10.2020.

② Тамерлан Ибраимов. Люстрация для Жогорку Кенеша. Пора ограничить количество депутатских сроков// 24.kg. 05.10.2020.

在选举门槛设定上，各政党都主张降低门槛限制。在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议会选举之前，“双线门槛”已从 9%和 0.9%降至 7%和 0.7%。在政局生变后，一些政党主张恢复到 5%和 0.5%。最终吉宪法委员会将选举门槛调整为 3%和 0.3%，并把政党必须缴纳的竞选基金从 500 万索姆减少至 100 万索姆。^①据表 4，在吉议会制时代以来的三次议会选举中，议会选举门槛越高，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就越少，反之就越多。

表 4 2010-2020 年吉尔吉斯斯坦不同选举门槛下议会党数量（单位：个）

双线门槛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3% / 0.3%	6	7	9
4% / 0.4%	6	7	7
5% / 0.5%	5	7	6
6% / 0.6%	4	7	5
7% / 0.7%	3	6	4
8% / 0.8%	1	5	3
9% / 0.9%	0	4	2

注：表中数值依据吉尔吉斯斯坦三次议会选举中官方公布的各政党得票率计算而来。

在 2010-2020 年三次议会选举中，每次都有 20 个以上的政党打算参加竞选，但其中的大多数因无法筹集 500 万索姆的竞选基金而不得不退出选举。即便如此，在这三次议会选举中，也有 4-6 个政党成为议会党。在议会选举“双线门槛”和竞选基金都降低的情况下，将有 10 个以上政党进入最高议会。但并非进入议会的政党数量越多，就越有利于政治发展，相反，议会内“有效政党的数量越多，政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就越低”。^②如 2010-2015 年间，尽管只有 5 个议会党，但由它们组建的执政联盟却流变了 6 次。吉国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吉尔吉斯斯坦各政党很不成熟，每个政党都认为自己是一支积极力量，以至于他们很难相互妥协；议会最好由 5 个左右的政党组成，最少的政党数目将减少政治回旋的范围，避免无休止的讨价还价。”^③

① “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 Committee passes amendments reducing election threshold to 3% in 1st reading”, 06.10.2020, https://akipress.com/news:649775:Constitutional_Legislation_Committee_passes_amendments_reducing_election_threshold_to_3_in_1st_reading

② Arend Lijphart, *Democracies: Pa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25.

③ Мария Орлова. Кыргызстан может вернуться к мажоритарной системе.

降低议会选举门槛，虽然有助于减少选后街头政治的风险，但并不能解决竞争民主模式下的派系斗争问题，反而会加剧议会的松散性和软弱性。尤其是在当权派意图修宪扩充总统权力的情况下，议会的松散和软弱会导致权力制约失衡，造成有竞争而无民主的政治生态，最坏的情况可能是重现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时期政权内部混乱的斗争局面。

（三）政党派系斗争持续升温

议会制政体确立以来，虽然执政联盟是由多个议会党组成，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政党结构并非合作性政党结构，而是竞争性政党结构。所谓竞争性政党结构，是指在没有明确执政党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中，各政党以宪法和法律为基本框架，通过既定的程序和规则，参加代议机构的席位竞争，进而以轮流执政的方式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党际关系类型。竞争性政党结构的形成，与其引入西方的竞争性选举模式相关。但在这种选举模式中，人民不过是提供选票的工具，其使命不是进行国家管理，而是选举出政党。如此，政党取代了人民进行政治统治，“民主政治就成了政治家的统治”。^①政党参加选举的根本目标，也不再是推进公共福利，而是“在竞争性选举的民主过程中战胜对手，取得或保持政权”。^②正是受这种竞争性选举模式的影响，吉尔吉斯斯坦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往往对其他政党抱有深刻的敌意。当这种敌意具体化为选举后的政治安排时，政治斗争将会持续升温，党际关系也将从“民主竞争”滑向“相互倾轧”。

“党争民主”下的派系斗争，在固化吉竞争性政党结构的同时，也不断加剧着议会内部的分裂。根据政治立场不同，可以把参加吉 2020 年 10 月议会选举的主要政党划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团结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吉尔吉斯斯坦党为主，它们拥护总统热恩别科夫，主张维护“热氏”政权的稳定；第二类，以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等为主，它们追从前总统阿塔姆巴耶夫，主张全面向议会制过渡；第三类，以爱国者党、统一-吉尔吉斯党等为主，政党领袖均为巴基耶夫时期执政班底的人物，一直以来极力主张恢

①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415 页。

② 陈炳辉：“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江淮论坛》，2013 第 5 期，第 75 页。

复总统制。^①在政权更迭后，塔西耶夫拉拢马杜马罗夫，拥护扎帕罗夫出任总统^②，而塔西耶夫本人则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们不仅控制了政权，还极力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取消拥护“热氏”政权的三个政党参加12月议会选举的资格，但遭到了激烈反对。与爱国者党一起夺权的社会民主党人党、共和国党等，几乎都不在政权更迭后的政治安排之中，而其他一些政党的领袖，则被安排进各级政府中。如远征党马梅特卡诺夫（Максат Мамытканов）被任命为副总理，来自爱国者党的阿申巴耶夫（Сабыркул Ашимбаев）、瑟尔加巴耶夫（Абсатгар Сыргабаев）分别被任命为纳伦州和贾拉拉巴德州州长，“部落”党领袖米尔别克（Мияров Мирбек）被任命为楚河州州长，来自统一吉尔吉斯党的扎哈洛夫（Занибек Захалов）被任命为巴特肯州州长。在一些人事任命上，扎帕罗夫不仅没积极兑现“把年轻人带到内阁里去”^③的承诺，甚至还无视人民“不要让那些曾陷入腐败丑闻的人统治国家”的政治诉求。如洛格巴耶夫（Балбак Тулобаев）出任比什凯克市代理市长后，部分民众迅速在市政厅外组织集会，反对扎帕罗夫任命“不纯洁、不顾人民意见的人”担任要职。^④在中央政府的人事变动中，仅有8名任职于上届政府的官员被留下，其余都被替换，大量新上任官员都曾是巴基耶夫的追随者^⑤，并且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犯罪前科而被广泛质疑和批评。^⑥如前副总理埃尔金·阿斯兰季耶夫（Эркин Асрандиев）就拒绝在扎帕罗夫批准的新政府中工作，他解释道：“我无法在那些我对其声誉存有质疑之人的指导下工作。”^⑦当权派上台后，不仅没有通过政治妥协来寻找各党派间新的政治共识，

① Базарбаев К, Жумагулов Б.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Фридриха Эберга. 2012. С.95.

② 马杜马罗夫、塔西耶夫和扎帕罗夫，不仅政治立场统一，而且三者之间还有重要的商业合作利益。参见 A. Momunova, “Party and Clan Politics in Kyrgyzstan: Is the Clan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se Studies of the Three Parties in Power”,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2012, p.37.

③ Садыр Жапаров обеща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власти молодежь// 24.kg. 10.10.2020.

④ Активисты теперь требуют отставки Балбака Тулобаева. Он заявил, что готов уйти. Sputnik.kg. 27.10.2020.

⑤ «Новые» кадры Садыра Жапарова. Кто вернулся в чиновники со времен Бакиева// 24.kg. 22.10.2020.

⑥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адыра Жапарова. Кто пришел в состав кабинета// 24.kg. 15.10.2020.

⑦ Эркин Асрандиев рассказал, почему отказался работать с Садыром Жапаровым// 24.kg. 15.10.2020.

反而通过政治安排，打压立场不同的派系，这无疑会激化党派之间的矛盾，加剧本就紧张的党际关系。

（四）“亲总统党”无力长久控局

在实行多党制国家的议会选举中，出现“亲政权党”或“亲政府党”，是政党政治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在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都曾授意一些政治人物组建“亲总统”政党。在当前的政治生态中，无论总统是否授意他人组建政党，“亲总统党”现象都将成为一种常态。这主要是由吉尔吉斯斯坦的权力分置、政党特征、法律规制、政治斗争等因素所塑造的。在权力分置上，“二元权力中心”结构为“亲总统党”现象的常态化提供了制度基础。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的政治体制建构中，同时借鉴了“总统制”和“议会制”两种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理念，以致其中央政权在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下，还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权力中心”结构，即总统与议会并存且各自掌握着一定的实权。由于议会和政府时常解散或解体，一些政党不得不积极融入总统的权力场，以稳定地实现自身利益。在政党特征上，“自上而下”的建党方式，决定了政党必须依赖一定的政治资源才能赢得选举和获得执政机会。吉政党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既缺乏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根基，也缺乏广泛且稳定的选民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便显得极为重要。有些政党在议会选举前，除了吸纳一些在任议员、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其他知名人物外，还积极标榜自己“亲总统”的政治立场，为胜选积累更多的政治声望和政治资本。在法律规制上，宪法和选举法中的相关规定，为“亲总统党”现象的常态化制造了法理漏洞。受吉议会制时代以来的宪法和选举法规制，议会内部难以形成一党执政的政党政治格局。政党能够进入议会，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进入执政联盟。宪法规定执政联盟必须由总统指定某一个政党牵头组建，这就促使一些政党积极向总统靠拢，以获取更大的执政机会。而政党派系间的斗争、议会与总统间的缠斗，为“亲总统党”现象的常态化提供了动力基础。在吉尔吉斯斯坦，形形色色的政党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之间的斗争推动着一些政党试图借助总统权势，以求在斗争中获得优势。与此同时，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争斗，也迫使总统不得不依赖于“亲总统”立场的政党，来平

衡议会中的反对派力量，进而巩固政权。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不断推动着“亲总统党”现象的常态化。

尽管“亲总统党”现象将会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中持续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有效地帮助总统控制政权，甚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动荡。吉尔吉斯斯坦宪法规定，总统在任职期间必须中止党员身份和禁止参与党派活动。但无论总统是否加入“亲总统”的政党，二者在政治运作中非正式地相互支持，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打破了该国本就脆弱的政治平衡。热恩别科夫在议会选举前夕表示，“以前的总统试图组建忠诚于他们的政党，以便在政治活动中依靠它们。但是，这些政党从未将前总统们从错误中拯救出来，当然，也无法挽救他们……我当选总统是为全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任何党服务。”^①并且，“在我看来，以任何方式去提名一些政党，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那是公开的鼓动。”^②但是热恩别科夫的表态，并未改变反对派政党对团结党、我的祖国-吉尔吉斯党等党派“亲总统”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它们参与议会选举的敌意。当“亲总统”的政党在议会选举或议会内部占据绝对优势时，反对派政党就极有可能发起高强度的政治挑战，甚至危及政权稳定。吉尔吉斯斯坦 2020 年议会选举之所以会引发政权更迭，与“亲总统”政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导致政治平衡破裂，有着极大的关系，至少为政治变局的发生提供了导火索。未来，“亲总统”政党仍然会上政治舞台，但它们很可能同先前的政党一样，难以持久地控制政治局势，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和热恩别科夫政权的倒台，都是充分的例证。

五、结语

在过去十年中，吉尔吉斯斯坦通过修宪改革，在政治体制上重新调整了总统与议会间的权力分配，极力规避“家族专制”的复辟；在选举制度上，适时调整选举门槛，并引入生物指纹识别技术等，致力于创造更加公正的选

① Прeжних президентов лояльные им партии не спасли, заявил Жээнбеков. 22.08.2020. <https://ru.sputnik.kg/politics/20200822/1049390798/kyrgyzstan-provlastnye-partii.html>

② Президент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 парламент должны пройти пять-шесть партий// 24.kg. 18.06.2020.

举规则；在政党政治上，以和平、稳定与发展为着力点，建构了新的政治共识。凡此种种，都使吉“二次革命”后的政治局势日趋稳定、有序，也使吉的政治生态相较以往更加宽松自由。然而，正当吉尔吉斯斯坦全面向议会制过渡之时，阿塔姆巴耶夫和热恩别科夫两任总统的权力之争，引发了政治变局，也打破了维持近十年的政治稳定。这次政权更迭是吉独立以来第一次在没有外部势力介入的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与之前的两次“革命”也有诸多不同之处。其一，政治成果并没有由参与夺权的各政党共享，而是被个别政党垄断，社会民主党人党和共和国党几乎被排除在政治安排之外。其二，政权更迭并不代表吉尔吉斯斯坦主流的政治共识，因而遭到了大量的批评和质疑。其三，在政治变局中上台的政府，并未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俄罗斯总统普京把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变局称之为“一场灾难”，并强调“我们并没有对个别政治势力提供建议、指导和支持。我非常希望吉尔吉斯共和国的一切都能正常化，一切都回到自己的轨道上。”^①其四，政权更迭后吉政坛内部充斥着种种不满情绪，但当权派并未积极构建新的政治共识来加以疏导，而是采取威胁恫吓的方式加以压制。其五，本次变局或将改变吉各政治派系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反对派政党或将更多地以暴力夺权方式来表达政治不满情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次政治变局极有可能终结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制政体建构实践，将政治体制推回到总统制框架。

这场政治变局造成的危机，也为未来出现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尤其是在总统与议会并立格局仍将持续存在的条件下，以扎帕罗夫为代表的当权派极力坚持修改宪法、扩大总统权力，这在未来势必会再次激起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使吉中央政权各机构陷入相互掣肘、互不信任的状态中。加上吉民众既不太可能接受没有总统的政治体制，也不会接受总统权力过大的政治安排，一旦中央政权因总统扩权而严重失衡时，议会中的反对派政党以及社会上要求限制总统权力的选民，将会像以往一样，以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为契机，联合起来向总统发起政治挑战，甚至不惜再次祭起“政治革命”或“逼宫夺权”的“法宝”。尽管无法预测吉尔吉斯斯坦新的政治动荡何时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назвал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события бедой. 23.10.2020. https://24.kg/vlast/170426_vladimir_putin_nazval_proishodyaschie_vkyrgyzystane_sobyitiya_bedoy/

会出现，但如果当权派持续推进总统扩权，那么以政权更迭为标志的政治动荡，在议会与总统、反对党与亲总统党相互斗争的动力机制作用下，迟早还会到来。吉政治精英只有吸取过去政权更迭中的教训，改变泛化的民主观念和极端的行为模式，回归政治理性，才可能使吉尔吉斯斯坦避免陷入“政权更迭-矛盾缓和-政治抗争-政权更迭”的循环之中。

这次政权更迭，在瓦解了吉尔吉斯斯坦过去十年民主政治建设所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也再一次证明了放任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与当前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发展状况并不完全匹配。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精英阶层极不成熟，普遍缺乏国家意识和政治妥协思维；官僚体系乏善可陈，任人唯亲、裙带攀附盛行；政党法治意识淡薄，更谈不上有什么“民主自制”；选民的政治激情高于政治理性。这些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仅在西式民主框架内轮番变更政治体制，并不足以解决政局不稳的痼疾。吉这次政权的非正常更迭也表明，在经历了两次“革命”后，吉尔吉斯斯坦仍处于寻找符合国情民意政治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期。

【Abstract】 As scheduled, on October 4, 2020, Kyrgyzstan held its thir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since its parliamentar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Under overlapping impact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e defeated opposition parties provoked street politics with excuses for unfair election, supported by some voters and aiming to seize power, which finally overthrew the government of Sooronbai Jeenbekov. This political change is caused by 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wer struggle between Almazbek Atambayev and Sooronbai Jeenbekov. It will not only disrupt achievements of Kyrgyzstan's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decade, but also change behavior patterns of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The opposition parties might prefer to fight for power through violence.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moted by new ruling elites, is likely to push Kyrgyzstan's political regime back to the framework of presidential system. This political change clearly indicates that the western democratic system has encountered setbacks again during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Kyrgyzstan. Meanwhile,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of Kyrgyzstan cannot be solved only by chang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 Key words 】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n Kyrgyzstan, Political Change in Kyrgyzstan, Western-style Democracy

【 Аннотация 】 4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как и было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прошли третьи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с начала парламентской эры в стране.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совпадающего влияния пандемии COVID-19 и выборов побеждённая оппозиционная партия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ла улич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которая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ь на выборах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едлога, некоторых избирателей в период пандемии в качестве силы, стремясь захватить власть и, наконец, свергла режим Жээнбекова. Э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связано с обострением борьбы за власть между двумя президентами. Хотя это подорвало позитив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за последне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это также может изменить модели поведе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фракций.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е партии могут с большей вероятностью бороться за власть с помощью насил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продвигаемая новыми правящими элитами, вероятно, вернёт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в рамк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Э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чётко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запад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снова столкнулась с неудачами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а также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то, ч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решена только путём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выборы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Кыргызстане, демократия западного образца

(责任编辑 肖辉忠)